

史大林

托羅茨基

莫索里尼

希脫拉

匹

變亂與革命技術

27

馬刺帕爾脫著

變亂與革命技術

古有成譯

目錄

序言	一—四
第一章 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和托羅茨基的策路	一—四二
第二章 托羅茨基對史大林革命的失敗	四三—七四
第三章 一九二〇年波蘭的經驗：華沙秩序良好	七五—一〇二
第四章 卡普或戰神與馬克思	一〇三—一二四
第五章 拿破崙——或第一個近代的革命	一二五—一三四
第六章 里哇拉及匹爾蘇茨奇，一個朝臣和一個社會主義將軍	一三五—一四六
第七章 莫索里尼	一四七—一九〇
第八章 一個冒牌的迪克推多——希脫拉	一九一—二一〇
尾聲	二一一—二二六

目錄

變亂與革命技術

序言

著者的計畫雖在闡明奮取和防護近代國家的方法，這個方法，多少是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所論述過的題目，本書決不是馬氏名著『君王』（The Prince）的一個模倣——連近代式的模倣也不是，這樣模倣出來的東西，定要和馬氏隔得很遠。在馬氏所藉以演繹其論辯，取得其例證和思考事件的時代當中，公私的自由，市民的尊嚴和人們的自尊，都已降到這麼低的田地，我如果把馬氏名著中的任何教訓，應用到現代歐洲急待解決的問題上來，恐怕要開罪於讀者吧。

一眼看去，過去十年間的全部政治史，也許似乎是凡爾賽和約的運用，大戰的經濟結果，各國政府企圖確保歐洲和平，這一類的故事。然而，其真正的解釋却不是這樣，其真正解釋，應找之於自由，民主和議會政治的擁護者，及其反對者的互相奮鬥中。各種政黨的態度，便是這種奮鬥的政治形態。為了解近年來的許許多大事，預測歐

洲各國政治的前途起見，必須從這個觀點，及僅只從這個觀點，來把各政黨行為考察。差不多在個個國家內都一樣，一方面有在野黨，擁護議會政府，應用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方法來保持國內權力的平衡。這樣的政黨，我把種種的保守派，由右翼的自由黨；以至左翼的社會黨，都算在內。別方面有對於國家抱一種革命觀點的黨，極左和極右的黨，法西斯黨和共產黨，近代的叛變的黨。極右黨注意於秩序的保持。他們指摘軟弱，無能，不負責任的政府。他們宣言必需一個強健組織的國家，對於政治，社會，和經濟等生活作嚴厲的控制。他們是國家的崇拜者，專制國家的擁護者。他們看到，在一個國家內只有反對共產主義危險，才可保障秩序和自由，這樣的國家必須從中心點取得控制權，必須是有威權的，反自由的，反民主的。莫索里尼的信條是，『萬物歸於國家，無物可外國家，無物可反國家。』極左黨宗旨在奪取國家以實施工農迪克推多制。『有自由便無國家』是列寧的信條。

莫索里尼和列寧，在極右極左兩黨的叛變者和自由及民主國家的防禦者之間的鬥爭發展上，是極佔重要的例子。

自然，法西斯黨的策畧是一種，共產黨的策畧又是一種。然而，國家的奪取者和防護者，似乎都還沒有認識那些策畧是什麼，或把牠們解釋，使人明白其異同之點，假如有任何異同之點的話。貝拉孔(Bela Kun)的策畧，完全和俄國布爾塞維克的不同。卡普(Kapp)，里哇拉(Primo de Rivera)，匹爾蘇茨基，似乎所計畫的企圖，原則上完全不同於意大利法西斯黨的策畧。也許貝拉孔所表現的是最近代的策畧，他在國家的爭奪上比其他三個更是專精，是一個更危險的人物。

然而他在着手奪取國家之時，也證明其不僅完全不懂叛變的近代策畧，兼且不明瞭奪取國家的近代方法。

貝拉孔以爲自己是模倣托羅茨基。他並沒注意到，他所行的只是馬克思依巴黎公社結果而定下的原則。卡普打算依拿破崙「二月十八」(eighteenth Brumaire)的路線，把威瑪爾的國會結果。里哇拉和匹爾蘇茨基，以爲克服近代國家，只要表現一下暴力，把立憲政府廢棄便夠。

這應多是明白的了：不論政府，或叛變者都不會認真研究過，究竟有沒有革命的一種近代科學，或革命的一般原則是什麼。一方面叛變者追求其革命策畧，政府却繼續採用防禦的警察手段來反對他們，這樣表示他們對於進攻和防守近代國家的基本原則，都絕無所知。這樣的蒙昧是危險的，著者乃立意援引親眼看見過，多少親自參與過的事變，來表明始於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迄今歐洲境內還沒有完結的革命時代的大事。

第一章

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和 托羅茨基的策畧

第一章 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和 的策略



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的戰畧 (strategy)，肇始於列寧，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策畧家 (tactician) 却是托羅茨基。

一九二九年初，我在俄國時候，我有機會和各界的許多人士，談及托羅茨基對於十月革命的貢獻。關於這層，有官方的理論，這是史大林所主張。可是無論什麼地方，尤其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托羅茨基派比旁的處所更強的地方，我聽見過人們對於托羅茨基的判斷，和史大林所發表的完全不同。我問而不管的，只有盧那車爾斯基 (Lunacharsky)，給我以史大林理論的客觀辯明的，只有卡美尼夫太太 (Madame Kamenev)，這是不足為異的，卡美尼夫太太原是托羅茨基的姊妹。

關於史大林列寧對於『永久革命』，及其對於托羅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貢獻；這兩個题目的爭論，我們此處不能詳細探討。史大林否認十月革命爲托羅茨基所組織；史氏歸十月革命之功於五人組織的委員會，此五人便是斯哇德羅夫（Sverdlov），史大林，保布羅夫（Borbov），奧麗茨基（Orizki），和達進斯基（Dzerzhinski）。這個委員會，列寧和托羅茨基都不在內，是以托羅茨基爲主席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一個主要部分。但是史大林和主張『永久革命』說者的爭論，總改不了十月革命的歷史，這個革命，依列寧所說，是托羅茨基所組織指揮的。列寧是十月革命的『軍官』（Strategus），理想家，感興者，危難之際不期而來的救護者，可是創造布爾塞維克革命的技術的人，還是托羅茨基。

近代歐洲政府所要提防的共產黨的危險，不在於列寧的戰略，而在於托羅茨基的策畧。離開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一般景況，不易設想出列寧的戰畧。反之，托羅茨基的策畧，是離却國家一般情況而獨立的；其實際應用，無需依靠爲列寧戰畧所必不可缺

的景况的任一件。共產革命常可發生於歐洲任何國家的緣故，就在於托羅茨基策畧的運用。換句話說，列寧的戰術不能用於任何西歐的國家，除非那個地方準備得好，情況完全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一樣。列寧在所著『共產主義的幼稚病』一書上，自己注意到，一九一七年俄國政治情況的奇特，『在於四個特殊的情況，這四個情況，現在在西歐決然得不到，將來也無疑決不會朝同一或類似的路線展開』。這四個情況在此地無關，不必解釋。誰都知道組成一九一七年俄國政治狀況的奇特的是什麼。是以列寧的戰畧，對於歐洲各國政府，並無馬上的危險。現在而且常常給予牠們以恫嚇的，還是由於托羅茨基的策畧。

史大林批評『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策畧』一書寫道，無論誰願把一九二三年秋德國所發生的事變評價的，切勿忘記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特殊情況。他加上說：『這個特殊情況，托羅茨基同志應該記起，因為他發見十月革命和德國革命之間，有一完全類似，而責難德國共產黨所患之真正的或假想的大錯。』於史大林看來，一九二三年

秋德國革命企圖的失敗，由於實施列寧戰畧所必需的特殊情況的缺乏。他發見托羅茨基責備德國共黨，而覺着詫異。可是由托羅茨基看來，革命企圖成功，並不依靠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相類的情況。一九二三年秋德國革命失敗的理由，並非因為那時不能把列寧的戰畧實施。德國共黨方面無可饒恕的錯誤，在於他們忽視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策畧。順利情況的缺乏，和國家的一般狀況，決不影響托羅茨基策畧的實施。事實上，德共黨之不能達到目的，確沒有充分理由可為辯護。

列寧死後，托羅茨基的偉大的異說，給予了列寧主義的統一性以威脅。托羅茨基是一個處境不利的改造家。他現在是流放中的一個路德（Luther），他的黨徒，不是鹵莽而改悔太遲的，都連忙公式的改悔，改悔得太快了。然而，我在俄仍常可遇持異說者，他們並沒有失掉批評的嗜好，還要從史大林的論辯中抽出最出人意料之結論。史氏的論辯的結論說：沒有克倫斯基，不能有列寧，因為克倫斯基造成一九一七年俄國特殊情況主要原素之一。但是托羅茨基却不承認克倫斯基有什麼需要；不需要克

倫斯基，就不需要史脫列斯曼(Strosemann)，傍卡累(Poinare)，魯意佐治(Loyd George)，佐力第(Giolitti)，或麥克唐納一樣，他們的存在，和克倫斯基的存在一樣，對於托羅茨基策畧的實施，並沒有利或不利的影響。讓傍卡累處於克倫斯基的地位，一九一七年的布爾塞維克革命，將見其一樣成功。在莫斯科，和在列寧格勒一樣，我有時會碰見過擁護「永久革命」的異說的人們，他們真的主張說，托羅茨基沒有列寧也幹得來，托羅茨基沒有列寧也能存在；這無異說，托羅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也許當了權，假如列寧會是居留瑞士，完全不參加俄國革命的話。

上句斷語，是冒險的斷語，可是只有太過誇張戰畧在革命上的重要的人們，才會認為武斷。頂重要的是變亂的策畧，革命的技術。在共產革命上，列寧的戰畧，並不是使用變亂策畧上一個必需的準備。戰畧本身，並不能達於奪取政權之路。在意大利，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內，列寧的戰畧已被完全應用了，那時的意大利，也確是所

有歐洲國家中最成熟而適於共產革命的一個。事事都準備着革命的到來。但是意大利共產黨相信：意國的革命狀況，無產階級大眾的作亂熱情，總罷工的流行，經濟及政治生活的痿痺狀況，工人強佔工廠，農民強佔土地，軍隊，警察，和文官的瓦解，判事的軟弱，中產階級的屈服，和政府的無能，是容許政權移於工人身上的充分條件。國會受制於左翼政黨，實際上做了工會革命活動的後盾。奪取政權的決心，並不缺乏，所缺的只是革命策略的知識。革命漸漸消磨於戰畧中。這個戰畧便是作一個決定的攻擊的預備，可是沒人知道怎樣去領導這個攻擊。君主政體（這個當時常被稱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君主政體）被實際談論為對於革命攻擊的一個嚴重障礙。國會內佔大多數的左黨，極其關心於工會的活動，這就是使國會不能不害怕牠本身範圍外將有新權力崛起，或且向牠進攻的理由。工會懷疑國會，或將努力把無產階級革命變為內閣的改變，以謀下中階級的利益。這個革命怎能組織起來呢？這就是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兩年間的問題；不僅在意大利如此，幾乎西歐所有國家都是如此。托羅茨基說，共產

黨並不知道怎樣去利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訓，這並非指革命戰略的教訓，却是指叛變策畧的教訓。

托羅茨基的這個說話，非常重要，要記住牠，才能了解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所用的策略，即是，共產黨革命的技術。

我們可以說，變亂的策畧，是革命戰畧的一部，是革命戰畧的宗旨和目標。托羅茨基關於這點的概念，是很明顯的。我們已經知道，他認到變亂策畧為無關國家一般狀況，無關適於叛變的革命形勢的東西。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策略的實施上，克倫斯基的俄國，並不比荷蘭和瑞士，發生更多的問題。列寧在「共產主義的幼稚病」上所解釋的四個特殊情況（這便是，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和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束，兩者有合併的可能；有從兩組國家的戰爭，取得短時期的利益的機會，這兩組國家如不是正在戰爭，也許已聯合一致來撲滅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由於俄國領土的遼廓，及其交通方法的可憐，能把內戰支持到相當長的時間；農民大眾中，有民主的中產階級革命運動的

存在），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形勢的特徵，可是牠們對於共產革命的成功結果，並非必需。假如布爾塞維克策略，要靠列寧戰畧所依靠的同樣情況，才能實施，那麼，在現在所有歐洲國家內，是決不會有共產黨的危險了。

列寧在他的戰畧觀念上，決有一種真實意味，兼缺乏準確和比例。他論及戰畧時，脫不了克勞則維次（Clausewitz註一）的思想，認戰畧為哲學，比認戰畧為一個藝術或科學的多。在他死後，他床畔的書籍中，找得了一本克勞則維次的「關於戰爭」，他曾親筆加以註釋；又從他對馬克思『法蘭西的內戰』一書的邊註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托羅茨基對於他的政敵戰畧天才的挑戰，是多麼的有憑有據。蘇俄官方對於列寧的革命戰畧如此重視，理由何在，我們很難明白，唯一理由大概是立意要藉以形容托羅茨基的渺小吧。列寧在十月革命上所担歷史任務，實足使我們無需認他為一個偉大的戰畧家。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寧充滿希望而不能耐。托羅茨基當選為彼得格勒（Petro-

的(С)蘇維埃的主席，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以及獲得了莫斯科蘇維埃的大半數，最後使列寧對於蘇維埃的大多數問題的焦慮，安靜下來了，關於這個問題，他從七月起就念念不忘。然而，他還一樣憂慮着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這個大會十月尾就開。

「我們無需獲得大多數，」托羅茨基說，「不是大多數，才可奪得政權。」托羅茨基的說話並沒有錯。『等候確定的大多數，』列寧同意說，「簡直是稚氣。」他寧可鼓動大眾起來反對克倫斯基政府；他要把俄羅斯隱沒於無產階級之下；他要給俄國全民以叛變的信號；他要參加蘇維埃大會，把孟塞維克少數派的两个領袖澹(Д)及史科柏羅夫(Скобелов)壓倒；他要宣布克倫斯基政府的沒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降臨。叛變的策略並沒有跑進他的心中，他只想及革命的戰畧。『不錯，』托羅茨基說；『可是第一，你必須佔據城市，奪得戰畧的地點，推翻政府。爲做到這層起見，一種叛變必須組織起來，暴動隊伍必須加以訓練。只要少數的人；大眾無所用之；一個小隊伍便夠了。』

「可是：由列寧看來，布爾塞維克革命，決不要指摘爲是一種投機。他說過『革命決不要靠一個陰謀，或一個黨，要靠社會的進步的部分，』這是第一點。革命必須由全民的革命衝動支持，這是第二點。革命必須在革命潮高漲時爆發，這是第三點。這三點爲馬克思主義和光是投機的差別。」

「很好，」托羅茨基說，「可是全民太過笨重，實不適用於革命。只要有一個小隊伍，冷靜而強烈，受過革命策畧的充分訓練，便夠。」

列寧認可了：「我們必須把所有我們的個體拋入工廠和兵營中。他們在那兒必須站穩，因爲那兒是決定的地點，革命的錨；就是在那兒，我們必須用如火如荼的熱誠的言詞，解釋宣布我們的計畫，并向他們，挑動說：完全接受這個計畫，否則革命去！」

「好極，」托羅茨基說，「可是我們的計畫被大眾接受以後，革命還須加以組織。我們必須招致工廠兵營中的可靠而勇猛的黨徒。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衆多的工人

，逃兵 亡命之徒，只是衝鋒的軍隊。」

「假如我們要依馬克思主義的辦法來實行革命，這就是說，把革命當作一個藝術，」列寧同意說，「我們又必須，沒有一刻的遲延，組織革命軍的參謀本部，分配我們的軍隊，把我們忠勇的軍隊去突擊最顯著的地位，包圍亞歷山大戲院，佔領彼得和保羅砲台，拘捕參謀本部及政府要人，用決死隊去攻擊軍校學生和戈薩克騎兵，決不讓敵軍有深入市區中心的機會。我們必須把武裝工人動員，使他們去作有權力以制勝的交戰，把電話和電報總局同時奪過來，設我們的革命的參謀本部於電話總局，用電話和所有工廠、革命軍團，和正在交戰中的地點，聯絡起來。」

「很好，」托羅茨基說，「可是……」

「那一切不過近乎正確罷了，」列寧承認說，「可是我的意思無非要證明在這個階段，如果不認革命爲一個藝術，便不能對馬克思保持忠實。你知道馬克思所寫下的關於這個藝術的主要原則的。應用於俄國現在的情況時，這些原則包含以下各項：向

彼得格勒作一儘可能的迅速突然的總攻擊；作塞外夾攻，從芬蘭的工人區，從勒法爾（Reval），從喀琅斯塔得（Kronstadt），一齊攻擊；用全部艦隊攻擊；把人數遠超乎政府軍隊的軍隊集中起來，政府軍隊不過二萬（軍校學生和戈薩克騎兵）。我們必須集合我們的三枝主力，艦隊，工人，和軍隊，奪得電話電報局，站所，橋梁，而死守之。我們必須在衝鋒隊中選得最堅強的隊伍，來担任佔領所有重要橋梁，和參加所有決定的戰爭的任務。我們又必須組成工人的隊伍，以來復槍及手榴彈為武器，向敵軍陣地，士官訓練學校，電話及電報總局進攻，把牠們包圍。俄國和世界革命的勝利，都靠一場兩三天的奮鬥。」

「那是通通十分合理的，」托羅茨基說，「但那也太複雜了，計畫太大了，而且這個戰畧所包含的地方和人民，都屬太多。這再也不是一個革命，而是一個戰爭了，為佔領彼得格勒起見，無需趁芬蘭的火車。起程於太遠的人們，常要中途停止。從勒法爾或喀琅斯塔得召集兩萬進攻的軍隊，以奪取亞歷山大戲院，實在很不必要；這不

僅是一個進攻了。單就戰畧方面來說，馬克思本人可被科尼羅夫（Kornilov）打败。一個人必須集中於策畧上，用少數的人在小小的空間上行動，集中所有力量於主要的目的物上，猛烈正確地打去。我決不以為革命是這麼複雜的。危險的事物常是極其簡單。為得到成功起見，必不好向不順利的情况挑戰，也不好信託一個順利的情况。打中敵人的腹部，打擊使將無聲。革命是一架無聲的機器。你的戰畧需要太多順利情况了。革命什麼都不需要。革命是自足的。」

「你的第畧誠極簡單，」列寧說：「只有一個原則：成功，你寧要拿破崙，不要克倫斯基，可不是？」

我派給列寧的說話，並非杜撰的。上面的話，一字不易，可見於他寫給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函中。

人們讀過所有列寧的著作，尤其讀過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代關於莫斯科十二月事變革命技術的筆記的，一定要頗為駭異地發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將爆發之際

，他的關於革命策畧和技術的觀念，是多麼坦白拙劣。然而我們仍切不要忘記：只有他和托羅茨基，在七月的企圖失敗以後，能不忘記革命戰畧的第一個目的爲政變。經某種搖動（七月間布爾塞維克黨只有一個目的，這目的是屬於議會性質的，就是在，在蘇維埃中佔大多數）以後，革命的觀念，像盧那車爾斯基所說，已成列寧一切活動的推動力。但是他居留於芬蘭時——他在七月事變以後，爲避免克倫斯基的逮捕——即居於芬蘭——所有他的活動，都集中於理論上的革命準備。他的向彼得格勒作軍事進攻以城內紅軍爲內應的計畫的拙劣，似乎只能作此解釋：這個進攻也許結果不幸。列寧的戰畧一受挫，革命的策畧也許便要失敗，赤衛軍使要被屠殺於彼得格勒的街心。因爲他不得不在遠處追隨事變的路線，他不能理解形勢上一切周詳之點。然而他還一樣想像得出革命的主要趨勢，比黨內反對馬上起事的一些中央委員，遠爲明白。「等候便是罪惡！」他寫給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布爾塞維克委員會的信說。

中央委員會開會於十月十日，列寧剛由芬蘭回來，也參加了，雖然差不多大家都

一致贊成起事（只有卡美尼夫和晉諾威夫反對），委員會的委員中，祕密反對的究還有人。卡美尼夫和晉諾威夫是公然抗議馬上舉事的僅有的兩個，但是他們的反對理由，和許多其他暗中反對的人們的理由，完全一樣。暗中不贊成列寧的決斷的人們，把他們所有恨惡之情降於托羅茨基身上，他們稱他爲「討厭的托羅茨基」，以他爲布爾塞維克主義陣營中的一個新兵，這個新兵的驕傲，開始在列寧於老衛兵當中，惹起許多嫉妬和注意。

在那個時候；列寧匿居彼得格勒的一個郊外，仍然和整個局勢繼續發生關係，他小心注視着托羅茨基的敵人的陰謀。像這樣的一個時刻，任何方式的遲疑，便是制革命的死命。在一封給中央委員的十月十七日的信上，列寧對於卡美尼夫和晉諾威夫的反對，反對最力，他們的論辯是立意暴露托羅茨基的錯誤的。他們說：「沒有大眾的合作，沒有總罷工的支持，舉事將只是向暗中的一跳，定歸失敗。托羅茨基的策畧是一種賭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不能把一個舉事的問題和一個軍事謀叛的問題聯

在一起。』

在他十月十七日的信上，列寧辯護托羅茨基的策畧說：「托羅茨基並不是和布浪葵（Blanqui）的觀念開玩笑」，他說。「一個軍事謀叛在下列條件之下才純是那種賭博，一、牠不是由一定階級的人們的政黨組織，二、組織者忽視了一般的政治形勢，尤其是國際形勢。在一個從個個觀點看來都是可哀的軍事謀叛和武裝革命之間，有一個大大的差別。」卡羊尼夫和普韋威夫也許會辯說：「托羅茨基不常常說，一個革命必須不顧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嗎？他不常常說，一個總罷工為一個共產革命主要原素之一嗎？工會的協作和總罷工的宣布，怎能靠得住呢，如果工會不和我們一起，却還在敵人的營中？他們將對我們罷工。我們就對鐵路工人也還沒有直接交涉過。鐵路工會的執行委員當中，布爾塞維克只有兩個，其他却有四十個。沒有工會的幫助，沒有總罷工的撐持，我們怎能勝利呢？」

這些反對是嚴重的：列寧只能以其不可搖動的決斷答覆牠們。但是托羅茨基微笑

了：他泰然自若。「革命，」他說，「並不是一種藝術，是一個機器。只要專門技術的專家把牠發動，發動之後也只有他們能把牠停止。」

托羅茨基的衝鋒隊，有工人，有士兵，有水手，數共一千。這個隊伍的精銳，選自溥狄羅夫(Putilov)和威博格(Wiborg)工廠的工人，波羅的海艦隊的水手，和拉威安(Latvian)軍隊的士兵。這些赤衛軍，在安妥諾夫·奧夫塞安可(Antonov-Ovarenko)命令之下，以十日的時光，在城市中心，以全身心作一整個聯貫的「看不見的演習」(invisible manoeuvres)。在擠擁街頭的逃兵羣衆當中，在支配着下述諸地的混亂狀態中，像政府建築物 and 辦公室，總司令部，郵政局，電話電報總局，站所，兵營，和城中專門技術事業的總局，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便裝實習起事的技術。他們三人或四人的小隊伍，去來沒人注意。

『看不見的演習』的策畧，和舉事行動的實習，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托羅茨

基所第一次表明過的，現在已成第三國際革命戰略的一部。托羅茨基所實用的原則，通通在第三國際的小冊子中有敘述和闡明。莫斯科中國大學所教的科目中，有『看不見的演習』的策略，這個策畧，卡拉坎（Karakán）以托羅茨基的經驗為指導，曾在上海實用而成功。在莫斯科孫文大學內，中國學生所學習的原則，和德國共產黨組織個個禮拜日所實習，以獲得舉事策畧的訓練的一樣；他們這個實習，是在大白天，當着柏林，德勒斯頓（Dresden）和漢堡（Hamburg）的警察和清醒市民的面，進行的。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快起以前若干天，反動派，自由派，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的報紙，不停地把關於布爾塞維克黨公然預備舉事的活動，提醒輿論。又攻擊列寧和托羅茨基，陰謀推翻民主共和國，以設立一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度。中產階級的報紙說，他們並不努力掩飾其犯罪的意向，無產的階級革命是正在大白天下組織了。當布爾塞維克領袖，對聚於工廠和兵營的工人士兵大眾演說時候，他們大聲宣布一

切事件都準備好了，革命的日子愈來愈近了。政府在幹什麼呢？中央委員會的列寧，托羅茨基，及其他分子，爲什麼還沒有被捕呢？政府究採了什麼手段保護俄國使免於布爾塞維克的危險呢？

說克倫斯基的政府並不採防護政權所需要的手段，這是不正確的。克倫斯基在盡權力所及以防止革命發生的工作上，我們必須給予他以相當稱許。假如傍卡累，魯意佐治，麥克唐納，佐力第，或史脫列斯曼，處於他的地位，他們也不能有別種辦法。克倫斯基的防護制度，寓於警衛方法的使用，這個方法，常爲專制和自由政府過去所依靠，現在也仍然依靠着的。可是這些警衛方法，再也不能充分防護政權，使免於近代叛變技術的推翻了。克倫斯基的錯誤是所有政府的錯誤，即認防護政權的問題爲一個警衛問題。

指摘克倫斯基爲缺乏遠見和無能的人們，忘記了克氏在七月事變中制裁工人和逃兵的反叛，以及八月間制裁科尼羅夫的反動危險，所表現的技巧和勇氣。八月間他並

不遲疑地援於布爾塞維克，以防止科尼羅夫的戈薩克騎兵，把二月革命的民主的勝利破壞。在這個機緣上，他使列寧驚奇了：『我們定要提防克倫斯基。』他說，『他並非傻子。』我們必須給予克倫斯基以公平：在十月，他是沒有辦法不像他那樣子幹去的。托羅茨基說過，防護政權是一個關於方法的事件。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只有一個方法是知道的，只有一個方法能給克倫斯基，魯意佐活，傍卡累，或諾斯克（Noske）應用的，這便是信賴警察的古典法子。

克倫斯基為應付革命的危險起見，對於冬宮，陶賴德宮（Tauride Palace），政府辦事處，電話電報總局，及總司令部，都小心地用軍校學生和忠心的戈薩克兵防守着。京城內所能依靠的二萬人，就這樣動員保護着國家政治官僚的機關的戰略上要點。（這個錯誤是托羅茨基可藉以從中取利的。）其他可靠的軍隊，駐於察戈愛塞羅（Tsarkoiseselo），戈爾平諾（Kolpino），加奇那（Gatchino），奧報克呵窩（Oboukhovo），浦爾柯窩（Pulkovo）等地附近——把國都彷彿用鉄環保護着一般布爾塞維

克的舉事，如果要不被封鎖，必須先把這個鐵環打斷。所有可以保護政府的手段，都使用了，軍校生的連隊，日夜巡邏城市、十字路口，屋頂上，納夫斯巨大馬路(Nev. ski Prospect)一帶，主要街道的各端，都設有機關槍隊，使敵人不能跑進廣場去。十兵巡察隊，在羣衆中跑來跑去；鉄甲車慢慢行駛，以其氣筒的長號開路。景像混亂可怖。『那兒便是我的總罷工，』托羅茨基指着納夫斯巨大馬路的滾滾羣衆，向安安納夫與夫塞安可說。

當其時，克倫斯基並不滿足於光只警備的手段，他把全部政治機器運動起來。他不僅要整理右派，還要和左派妥協，以作雙重的保險。他最關心工會。他知道工會領袖並不和布爾塞維克黨一致。這個事實，就是卡美尼夫晉諾威夫用以批評托羅茨基的叛變觀念的。總罷工是叛變的一個必需的元素。沒有這個要素，布爾塞維克不能感到安穩，他們的攻擊定歸失敗。托羅茨基描寫革命，爲「打擊一個癱瘓的人」一樣。要叛變成功，彼得格勒的生活必須以總罷工使牠癱瘓不靈。工會領袖不和布爾塞維克表

同情，可是牠們的有組織的全體工人，却傾向列寧。假如工人大衆得不過來，那麼，克倫斯基覺得能有工會領袖站在他這邊來也好；他和工會領袖交涉，最後，經過一場奮鬥，得到了他們的中立。列寧聽見這個消息時，他對托羅茨基說：「卡美尼夫是對的。沒有一個總罷工來撐持你，你的策畧只有失敗的一途。」「有利於我這方面的是混亂，」托羅茨基說，「這比一個總罷工還好。」

爲理解托羅茨基的計畫起見，我們必須明白那時彼得格勒的情況。有大羣的逃兵，在二月革命之初離開戰壕，傾入都城來，就在城內安住着，彷彿他們要把自由的廟宇毀滅的一般。在過去六個月內，他們已屯駐在街道和廣場中間，像他們那壓衣服襪，骯髒，潦倒，醉酒或餓得半死，胆怯或兇如豺狼，一樣地準備着反叛或逃亡，他們的心燃燒着報仇或和平的渴望。他們坐在那兒，作無窮的一行，在納夫斯巨馬路的鋪道上，緩慢地擾攘地流去的人流的旁邊。他們售賣武器，小宣傳品，和向日葵種子。莫斯科火車站前的茲拉孟斯卡亞廣場(Zramenskaia)上，混亂狀況，難以描寫：

羣衆向牆壁衝打，後退，又以新的力量前進，直至像一個泡沫的大浪打在一堆形形色色的貨車上爲止；電車在亞歷山大第三像前堆起，發出一種震耳欲聾的聲音，遠處聽來，就像一場屠殺的叫喊。

納夫斯巨和李體尼 (Lisevni) 兩大馬路交叉處的豐坦卡 (Fontanka) 橋上，有賣報童子賣報；他們把新聞高聲叫喊出來，像克倫斯基所探的戒慎手段，軍事革命委員會，蘇維埃，和市議會所出的布告，玻爾柯夫尼柯夫 (Polkovnikov) 上校所發的命令，玻氏是管領着廣場，恫嚇逃兵要把他們通通關起來，和禁止示威遊行，開會，及爭吵的。工人，士兵，學生，店夥，及水手，張大喉嚨，指手畫腳，在街頭巷角辯論。在處處咖啡店，和飯店裏，人們都譏笑玻爾柯夫尼柯夫上校的布告，說什麼在彼得格勒的二十萬逃兵，他可以羈起來，和爭吵可以禁止。在冬宮前面，架有兩枝七十五生的大砲，大砲的後面便是穿着長大衣的軍校生，雄糾糾地在跑上跑下。在參謀本部建築物前面，排着兩列軍用汽車。海軍部附近，亞歷山大園中，有一營的娘子軍，環繞着搭起的槍架，在地上坐着。

馬林斯卡亞(Mariniskaia)廣場上，滿布着衣服襤褸形容憔悴的工人，水手，逃兵。做共和評議會(Republican Council)會所的瑪麗亞宮，大門口有一支隊戈薩克兵守衛，他們又高又黑的帽子，掩蓋着一隻耳朵。他們高聲談着，笑着，和吸煙。一個旁觀者爬上伊塞大禮拜堂(Isaac Cathedral)屋頂，將望見濃重的煙雲，蓋着浦特羅夫的工廠，在這些工廠內，人們正實彈荷槍在工作；再望遠些，便是芬蘭海灣；在洛太(Rohtine)島後，便是名爲「紅砲臺」的喀琅斯塔得，那兒碧眼的水手等候戴朋柯(Dybanko)的暗號一舉，便前進去幫助托羅茨基，把軍校生屠殺。在城之另一邊，一朵紅雲籠罩着威堡格郊原的無數的煙囪，那個郊原，便是列寧在其中匿身，頗爲臉色蒼白而情緒狂熱，帶着假髮使他看來像一個小小的地方戲子的地方。沒有人能夠瞧出這個剃了鬚，額際好好貼着假髮的男子，便是那能夠使俄羅斯震動的列寧。托羅茨基的赤衛軍，就是在那威堡格工廠裏，等候着安妥諾夫與夫塞安柯的信號。郊原的女人們，臉孔都是憂鬱的，眼睛却變爲無情的。傍晚時分，黑暗一掃蕩過街道，一隊隊的

武裝女人，便向市中心區移動。這是無產階級移民的時代：大羣的民衆，從彼得格勒的此端跑到那端，在參加大會，示威游行，和暴動，花了許多鐘頭以後，又跑回他們原來所駐的地方。在兵營和工廠內，會議開了一場又一場。「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演說者的粗厲的聲音，隱沒於紅旗的縐褶中。克倫斯基的士兵，在屋頂上掌管着機關槍，一面聽着下面的粗厲的聲音，一面在吃向日葵種子，把向日葵殼向擠滿街道的羣衆拋去。

黑暗下降於此地，像一塊烏雲。在納夫斯巨大馬路上，逃兵像一條河流，向海軍部流去。在喀山 (Kazan) 大禮拜堂前面，有千百個士兵、女人，和工人，直挺地睡在地上。全城都在恐怖、混亂，和瘋狂的痛苦中。猝然間，這羣衆中，有的人會跳起來，以失眠而瘋狂，持着小刀，向軍校生的巡邏隊，和守衛冬宮的娘子軍攻擊。又有的人會闖入資產階級屋內，去拉出資本家來，把他們從睡夢中驚醒。全城以叛變的狂熱而驚眼。像沙翁戲劇中的麥伯斯女士 (Lady Macbeth) 一樣，彼得格勒再也睡不着。

了。牠的夜晚已給血腥氣息縈繞着。

托羅茨基的赤衛軍，在前十天，已在市區中心演習過了。組織這些策畧上的練習的，便是安妥諾夫與夫塞安柯。這種革命的準備的演習，在光天化日之下，擾攘擠擁的街道上，政府和政治的堡壘中戰畧上最佔重要的建築物的四周進行。警察和軍事長官，因為被無產大眾突然叛變的觀念所困，及太關心於此種危險的對付了，他們竟沒有覺察到安妥諾夫與夫塞安柯的隊伍正在工作。在這麼廣播的混亂當中，誰還注意小羣的便裝工人，士兵，和水手，游蕩於電話電報局的走廊上，中央郵局裏，政府機關和總司令部裏，注意機關的排列，視察電話電燈如何裝置麼？他們想像着記憶着這些建築物的圖形，研究接到通告馬上跑進去的方法。他們考量着他們成功的機緣，估計着對方，找尋國家的技術，軍事，和公事機關的最少抵抗的地方，最弱而最易受損的地方。在一般混亂狀況之下，誰還注意三四個水手，一對士兵，或一個離羣的工人，在某建築物四周游蕩，和進去，上樓，以及他們相遇時彼此看都不看的人們？沒人會

梅羅到，這些人們，是遵守着精確詳細的命令，在實施一種計畫，或在實際演習對於政府防禦戰略上要點的攻擊的。後來赤衛軍能作有效力的攻擊，都因他們會即在戰爭快要起來的地方，實施過其看不出的演習。

托羅茨基把彼得格勒的技術機關圖形，完全抓住了。戴朋柯的水手們，以兩個工程師和若干機房巧工的協助，把地下的瓦斯管和水管，電力線，和電話電報系統，完全弄明白了。其中兩人，探檢參謀本部的總部的下面的溝渠。因把一整個區域，或僅只一羣房屋隔絕之事，應便能於幾分鐘內做到；托羅茨基便把全城分為若干區，決定那幾個為戰畧上的要點，把工作按區分配給各隊的士兵和巧工。

具專門技術的專家，和士兵一樣需要。莫斯科車站的奪取，交給兩小隊辦理，此兩小隊包含二十五個拉脫威亞的士兵，二個水手，和十個鐵路工人。三隊的水手，工人，和鐵路職員，合共一百六十人，却受命去奪取華沙（Warsaw）車站。至於其他車站的奪取，戴朋柯却指定許多小隊担任，每小隊二十人。個個支配鐵路路線上的運

動的小隊，均附以一個電報生。十月二十一日，在安妥諾夫與夫塞安柯命令之下——他和總演習是密切相關着的——所有的小隊，演習奪取車站；總演習完全井然有序，種種節目都準確無訛。同日，三個水手跑到港口附近的電氣總廠去；這個總廠，由首都的技術機關管理，連守衛也沒有。該經理問水手，他們是不是廣場司令所派遣的人。在過去五天，他已感覺需要衛兵，他曾要求派遣。他們便把電氣廠的防衛責任承接過來，說是以妨變亂。此外幾小隊的機器房工匠，也用同樣方式，把另三個市營工廠接防過來。

克斯倫基向警察和軍事長官，特別關心於國家官廳和政治機關；政府辦事處，共和評議會所在地的瑪麗亞宮，國會會場的陶賴德宮，冬宮，和總司令部。托羅茨基發見了這種錯誤時候，他決意單攻圍市政府的技術機關。變亂對於他，只是一個專門技術的問題。『爲推翻現代政府起見，』他說，『你只需要一個衝鋒隊，若干技術專家，和若干隊的士兵，以若干工程師爲領導。』

托羅茨基正把政變組織在一個合理基礎上時候，布爾塞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正忙着在組織無產階級革命。史大林，斯哇德羅夫，保布羅夫，奧麗茨基，和達進斯基，是這個委員會中擬具總叛變計畫的委員，他們幾乎通通公開的反對托羅茨基。他們五人不信任托羅茨基所計畫的叛變，十年以後，史大林把十月革命的功勞通通歸給他們。

托羅茨基的一千人有什麼用處呢？軍校生能夠很容易便把他們解決。革命工作定然是要化無產階級大眾，浦迪羅夫和威保格兩地工廠的萬千的雇工，大羣的逃兵，和彼得格勒駐防軍中的布黨同情者，鼓動起來，也就是這些人，才應該去鼓動起來反對政府。一個大叛變必須掀起。托羅茨基，以及其衝鋒隊，似乎是一枝無用而且具危險性的聯軍。

這五人組織的委員會，對於革命的認識，很和克倫斯基相像，都認為是一件大概

關乎警察的事件。而且，夠奇怪的是，後來創造布黨警察（此項警察後來名為G.P.U.）的人，屬於這個委員會。達進斯基，面色蒼白，中心憂急，研究克倫斯基政府的防衛，決定攻擊的計畫。他是所有托羅茨基的批評者當中最可怖最奸詐的人，他在熱狂時候是和一個女人一樣的怕羞。他甚至對於自己的手，究竟給自己的事業玷污了沒有，也不敢看一看。達進斯基在他一九二六年檢舉托羅茨基時候，死於法庭。

在政變的前夜，托羅茨基告訴達進斯基，克倫斯基的政府，赤衛軍一定要完全不去理睬；第一件事是奪取政權，不是用機關鎗去打政府；共和評議會，政府各部，和國會，在叛變的策略上佔一個不重要的部分，不應作爲一個武裝叛變的對象；國家的關鍵，不在其政治的公事的機關，也不在陶賴德宮，馬利亞宮，和冬宮，却在其技術機關，像電氣局，電話電報局，港口，煤氣廠，和自來水廠等。達進斯基容說，叛變必須設計預防敵人的行動，必須攻敵人於其營壘。『我們必須攻擊政府，就在牠防衛政權的地方；把牠打敗。假如敵人退到政府辦事處去，退到馬利亞宮，陶賴德宮，或冬宮裏去，他必須從那兒趕出。爲佔有政權起見，』達進斯基說，『我們必須用大衆

力量向政府猛擊。」

在五人委員會的叛變計畫中佔很重要位置的，便是工會的中立，沒有一個總罷工的幫助，真能把政權推翻嗎？「不，」中央委員會和五人的委員會都說，「一定要使大眾參加叛變來促成罷工。使我們可把大眾的力量向政府猛擊，和促成一個總罷工的，是一個總叛變的策略，不是孤立的反叛的策略。」「一個總罷工並非必需的，」托羅茨基說。「彼得格勒的混亂，對於我們的目的，比一個總罷工還有用。當一個總瓦解把國家變成癱瘓時候，政府決不能和變亂抗爭。我們既不能依靠罷工，我們便將依靠混亂。」

聽說委員會反對托羅茨基的策略的理由，是說他對於當時情況的觀察太過樂觀。事實上，托羅茨基是傾向於悲觀的；他對於那時情況的判斷，比大多數人所想，嚴重得多。他並不相信大眾，他都知道叛變要由少數人作去。促成總罷工，以達徵募大眾向政府作真正戰爭的目的，簡直是一個幻想。叛變只能由少數人作去。托羅茨基相信

，假如一個總罷工爆發，牠將是對布黨的罷工，爲防止這樣的總罷工起見，政權必須馬上奪得。後來的事變證明托羅茨基是對的。到了鐵路工人、郵政、電報、電話等職工，政府辦事處的職員，公營事業的雇員離職時候，事情已是太晚了。列寧已經執了政權：托羅茨基已把總罷工的背脊打折了。

中央委員會對於托羅茨基的策略的反對，是一種矛盾，這種矛盾是很有危害革命成功的可能時。在政變的前夜，有兩個大本營，兩個行動計畫，和兩個不同的目的。五人的委員會，依靠工人和逃兵的大衆，要奪取政府，以達奪取政權目的。托羅茨基，却依靠大約一千人，要奪取政權，以達推翻政府目的。馬克思本人如在，也許會想當時情況是較有利於委員會的計畫，較不利於托羅茨基的計畫。但是托羅茨基說過：『一個叛變並不需要順利的情況。』

在十月二十四號大白天，托羅茨基開始攻擊。作戰的計畫，已由前帝國軍隊的一

個軍官定好，他的名字爲安妥諾夫奧夫塞安柯，他又以數學家，棋手，革命家，流犯等身出名。列寧講到托羅茨基的策略時，一次談及安妥諾夫奧夫塞安柯說，只有像他那樣的一個棋手，才能夠組織這次革命。

安妥諾夫奧夫塞安柯，有一個悲傷而病態的表現。他看來像第一法國共和國國曆二月十八號前的拿破崙，長長的頭髮垂於兩肩；但是他的眼睛是沒有生氣的，臉孔瘦而青，是一個憂傷有病的人的。

安妥諾夫奧夫塞安柯，正在布黨總司令部的史摩爾尼學院 (Smolny Institute) 的頂樓一間小房子內，在一張彼得格勒地形圖上玩棋子。在他下面，第二層樓，五人的委員會却在開會決定總叛變的日子。委員會一點也不想像不到，托羅茨基已經開始攻擊。托羅茨基突然決定，只在最後一分鐘，告訴了列寧。委員會護守着列寧的話。他不是說過二十一號和二十四號都是太早，二十六號又太遲嗎？委員會開會決定確實舉事的日子，還不到一會，坡德篠斯基 (Podvoisky) 已把出人意料的新聞帶來了。托羅

茨基西亦衛軍，已經奪取了電報總局和涅瓦（Neva）河上的橋梁。佔據這些橋，爲的要担保城市中心和威保格工人區域的交通路線的安全。戴朋柯的水手，已經佔住市電氣局，煤氣廠，和火車站。事變的發生，有想像不到的疾速和秩序。電報總局本是有十名左右警察和士兵防守，在屋前排列着。警衛手段的不夠用，已由所謂「秩序維持及保護」的防守策畧證明了，這種防守策略，用以對付一個叛變的羣衆，也許可以得到好的結果，可是用以應付少數果斷的戰士，却是不行。警察策畧碰着出乎意料的攻擊，便成無用。戴朋柯的三個水手，他們參加過「看不見的演習」，已經熟悉那塊地方，潛入守衛隊中，直入辦公室去；從窗口向街上擲下幾個手榴彈來，他們便造成了軍警的混亂。兩小隊的水手，跑上來佔了他們的位置，用電報總局裏的機關槍把守着。一個第三小隊，却駐在總局對面的地方，準備用射擊敵人後面的方法，以應付或有的反攻。史摩爾尼學院和在城市各區工作着的小隊的交通，用鈔甲車來担保安全。機關槍藏匿於主要的十字路口的房屋內；游擊隊注視着那些對克倫斯基還保持忠實的

軍隊的兵營。

同日晚大約六點鐘時分，安安諾夫與夫塞安柯，臉色比平常更爲蒼白，但微笑着，跑進史摩爾尼學院的列寧的房間。「沒事了，」他說。政府的分子，對於事變猝不及防，躲到冬宮裏，把守冬宮的，現在只有數小隊的軍校生，和二營的娘子軍。克倫斯基逃走了。聽說他是跑到前方去，收集軍隊來反攻彼得格勒。全城的人都跑到街上，來探聽消息。店鋪，咖啡館，大酒店，影戲院，戲園，都開門了；街上塞滿着武裝士兵和工人，納夫斯巨大馬路上的一大羣人，像一條大江般在流動。個個人部談說着，討論着，咒詛着政府或布黨。最大的謠言在羣衆中散布着，說是克倫斯基死了，孟黨小數派的領袖們在陶賴德宮前被槍決了，列寧坐在冬宮裏的沙皇的房子裏了。

一大羣人，像大浪般，繼續從納夫斯巨路，哥羅柯夫斯卡亞路（Golokovskaya），和窩斯納生斯巨路（Voronskiy）——這三大馬路會合於海軍部——向亞歷山大公園湧去，看看紅旗到底是不是在冬宮上飛揚了。羣衆瞧見軍校生守着冬宮時，便行

後退。機關槍，明亮的窗子，沒人的廣場，汽車排列於總司令部前面，這些是令人煩惱的景象。羣衆從遠處望着莫明其妙。列寧呢？他在那裏？布黨在那裏？

當時沒有一個反對黨，不論自由黨，反動黨，孟黨，或社會革命黨，能夠理解這個情況的。他們不肯相信，布黨已奪取了政權。他們說，這些謠言許是史摩爾尼學院收買的人散布出來的；事實上，政府辦事處不過遷入冬宮以防萬一罷了；假如那天的消息是確實的，那麼，總算不會有一個政變，至多不過是發生了一串對於國家機關或城市公營事業機關武裝攻擊多少成功的事（還沒有確實的消息）。●立法的，政治的，行政的團體，尙還在克倫斯基手中。陶賴德宮和馬利亞宮，和政府各部，尙還沒有被攻。這個情況是矛盾不可解的；從前永不會有過一個革命沒有攻擊政府，可以說是已經奪取了政權的事。事情看來布黨並不關心政府的樣子。政府辦事處爲什麼不奪過來呢？一個人沒有控制國家的行政，也能夠克服政權，統治俄羅斯嗎？布黨自然是奪得了所有公營事業了，可是克倫斯基還沒有辭職。他還是政府的頭腦，縱使暫時，公

營事業，鐵路，電廠，電話，電報，郵政，國家銀行，以及煤炭，煤油，穀物等的倉庫，是不在他支配之下。其實呢，冬宮內的各部長是不能統治了；政府辦事處並不工作了，政府已和俄國其他部分隔絕了，種種交通工具都在布黨手中。郊野所有的路都堵住了；沒人可以離城他往，總司令部也隔絕了。布黨已把無線電總台奪取；赤衛軍屯駐於彼得和保羅砲台內，許多團兵本屬於彼得格勒防軍的，已經在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之下動作了。戰爭是刻不容緩的了。參謀本部爲什麼不動呢？聽說是等候克刺斯諾夫（Krasnov）的軍隊，克氏的軍隊正向都城進發。所有防護政府的必需的手段，都採用了。要是布黨還沒有決定向政府進攻的話，那一定是因爲他們覺得他們的地位還不夠力量，不能這麼做法。政府還沒有損失一切。

第二天，十月二十五號，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開會於史摩爾尼學院時候，托羅茨基命令安妥諾夫與夫塞安柯進攻藏匿着克倫斯基政府的各部長的冬宮，現在的問題是：布黨可在大會裏取得大多數的擁護嗎？

全俄的蘇維埃不會因布黨僅只已經奪得政權的宣告，便相信革命業已成功。他們還得告以赤衛軍已經俘獲政府的要人。托羅茨基對列寧說：『只有這個辦法，可使中央委員會和五人的委員會相信革命並沒有失敗。』

『你主意決定得太遲，』列寧答說。

『在我沒有證實防軍不會援救政府以前，我不能攻擊政府；』托羅茨基答，『我須得給軍隊以歸附我們的時光。現只有軍校生還是忠實的了。』

然後，戴着假髮，無鬚，裝成一個工人模樣的列寧，才從他藏匿的所在動身，到史摩爾尼學院參加蘇維埃大會去。這是他生平最慘痛的時刻，因為他想革命已經失敗了。像中央委員會，五人委員會，和大會的大部分的代表一樣，列寧要赤衛軍證明克倫斯基政府的塌臺，和克倫斯基的部長的俘獲。他不信任托羅茨基的驕傲，自信，和鹵莽詭計。托羅茨基並不是老衛兵之一分子，他並不是一個絕對可靠的布爾塞維克，不過是個七月事變後才進黨的新黨員。『我並非十二門徒之一，』托羅茨基說，『但

是我更像首先對異教徒 (Jehiles) 說教的聖保羅。」

列寧從不大受托羅茨基的吸引。托羅茨基大抵是不爲人所歡迎的。他的口才可是可疑的。他有指揮羣衆和首先發難的危險天才。他能分裂一個黨，創造一個異說——可是不論他多麼可怕，他到底是他們所需要的人物。列寧早就注意到托羅茨基愛好拿破崙史來作比較。他在會議或大會席上說話，或參加黨中的辯論會時，他常常關說到克倫威爾的清教徒的反叛，或法國革命。以法國革命人物和事變的標準，來判斷估計布黨革命的人物和事變的一個人，誰都必須提防。托羅茨基因七月事變被關於克列斯迪 (Kresty) 監獄，一出監獄，跑進彼得格勒蘇維埃，在激烈的演辭當中，便主張需要法國雅各賓黨的恐怖時代，這種情形，列寧決不會忘記。「斷頭臺(恐怖時代的象徵)結果只有產生拿破崙，」孟塞維克黨人向他叫喊。「我寧愛拿破崙不要克倫斯基，」托羅茨基回答說。這個笑話，列寧也決不會忘記。達進斯基後來常常批評托羅茨基說：「他愛拿破崙比愛列寧厲害。」

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正在史摩爾尼學院大廳中開會，和大廳相連的一個房子裏，列寧和托羅茨基坐在一張滿堆着紙張報紙的檯前。列寧的假髮的髮髮，依附於額前。托羅茨基瞧見這麼一個荒謬的假裝，不禁失笑。他想現在是列寧除去假髮的時候了，因為危險再也沒有了。革命已經勝利，列寧真正是俄羅斯的統治者了。現在至少，他可讓他的鬚長起來，把假髮除去，和羣衆見面了。孟黨的兩個領袖，澹和史科柏羅夫，在列寧前面經過，跑向大會廳裏去。他們彼此使了一個眼色，面色也變蒼白些，因為看見了戴着假髮的小小的地方戲子，他們似乎認出他便是能把神聖的俄羅斯完全消滅的人。

『一切都完了，』澹低聲對科柏羅夫說。『你爲什麼還化裝呢？』托羅茨基問列寧說。『已經勝利的人們並非常常隱藏自己啦。』列寧把托氏端詳，托氏的眼半閉着，嘴角微露譏刺的微笑。誰已經勝利呢？這便是問題。大炮的隆隆聲，機關槍的喇噠聲，時或可以聽見從遠處傳來。巡洋艦『黎明號』，泊於涅瓦河的，已經向冬宮開

火，以掩護赤衛軍的進擊了。

現在戴朋柯加入他們當中來了，戴氏身材很高，眼藍，臉孔給柔弱美麗的头髮配合着：喀琅斯塔得的水手，和科倫泰太太，（Madame Kollontai）都以他透明的眼睛和他的殘忍而愛他。戴氏報告消息說，安公諾夫與夫塞安柯的赤衛軍已經攻入冬宮，克倫斯基的部長都成布黨的囚犯，政府已塌臺了。『到底！』列寧叫說。『你說這話，你是遲了二十四個鐘頭了，』托羅茨基答說。列寧把假髮除去，用手抹前額。（威爾斯 H. G. Wells 一 次說及列寧，說他的頭顱和巴爾福公爵 Lord Balfour 的，同一形式。）『來吧，』列寧說，跑入大會廳中，托羅茨基默默無言地跟着。托氏看來疲倦了，一種睡態使他剛硬如鋼的眼睛變為朦朧，唐那車爾斯基宣言，在革命時的托羅茨基，使他憶起一個萊頓瓶（Leiden Jar）。可是現在政府倒了，列寧除去假髮，像一個人除去面具一般。革命是托羅茨基的功業。得實際利益的人，元首兼迪克推多，却是列寧。

托羅茨基默默無言地跟着他，帶着一種懷疑的微笑，這種微笑直至列寧死後方變緩和。

(註一)克勞則維次Karl von Clausewitz生於一七八〇年六月一日，卒於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是一個普魯士軍官，兼一個軍事著述家，著有書十大本。

(註二)萊頓瓶(Leyden Jar)是一種靜電貯蓄器，此器包含一個玻璃瓶或一個緊閉一端的圓筒，裏外均塗錫箔，幾至瓶頂，裏面的錫箔，通常和瓶頂的一個金屬結節相連：因萊頓城最先使用此器，故名。

第二章

托羅茨基對史 林革命的失敗

第二章 托羅茨基對史大林革命的失敗

史大林是知道怎樣利用十月革命教訓的唯一歐洲政治家。如果所有歐洲的共產黨，必須從托羅茨基那兒，得到其奪取政權的技術的知識，那麼，自由民主的政府，若果要學習防護國家，以抵抗共產黨的革命策畧，即托羅茨基的策畧，的襲擊的有效技術，便必須注意史大林。

史大林和托羅茨基之間的奮鬥，在過去十年歐洲政治史上，很可算是最可觀感的一件事。依官方所說，這個奮鬥，發生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多年以前。是在一九〇三年倫敦會議，列寧和馬爾妥夫(Martoff)分裂，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分裂，以後，托羅茨基才公開不贊成列寧的觀念。他雖然當時不加入馬爾妥夫的黨，他總覺孟塞維克的計畫，比布爾塞維克的漂亮得多。可是究其實，所有這些人身的和主義的淵源，和托羅茨基主義（即離經，畸形，及異說的主義）在解釋列寧思想上的危險應予打

消的事實，只是蘇俄官方對托羅茨基持敵視態度的口實和理由，這種敵視的淵源，深植於布黨精神本身上，於工農大眾的感情和目的上，於列寧死後的蘇俄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上。

史大林和托羅茨基之間的鬥爭史，是托氏企圖奪取國家，史大林和布黨老衛兵却設法防護的歷史。是一個不成功的革命故事。史大林用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來反對托羅茨基『永久革命』的學說。兩派互相攻擊，用的都是列寧的名義。

但是遠較光是關於列寧主義的解釋的論文，爲有嚴重意義的事變，是深藏於這些陰謀，討論，和詭辯之下。

最高權在危險中了。列寧的繼任者的問題，在列寧未死前許久，疾病徵候初起時，便已發生，這決不僅是一個理論的問題。個人的野心深藏於主義的問題之後：我們決不要誤信了關於這個討論的官方的理由。托羅茨基在這個爭議上最關心的事，是要表現自己爲列寧道德和智力的遺產的一個無所容心的保護者，爲指導十月革命的原則

的監護人，爲一個急進共產黨員，努力防止黨的官僚化，和資產階級精神在蘇俄境內長成的。可是史大林，在這個爭議上，却大概要保存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員和歐洲的資本家，自由黨及民主黨，不知道列寧信徒，蘇俄的真正代表，自己內部互相攻擊，真正理由在那裏。事實上托羅茨基拚命要奪取政權，史大林却拚命防守。

史大林沒有絲毫俄人的冷淡性格，對於善惡同樣不努力的屈服，空洞的反抗，倔強的自我犧牲，或俄人殘忍的及幼稚的仁慈，他都一點沒有。史大林並不是俄人，而是佐治亞人（Georgia 註一）。他，聰明，藏於堅忍，意志力，和判斷力中。他自信而固執。他的敵人攻擊他缺乏知識和智力；他們是錯了。他並不是一個歐洲所謂有教育的人，並不能詭辯術和心理學上的狂熱。他是一個列寧所謂的野蠻人，是西方教化，心理學和倫理學的一個敵人。他的智慧，是完全寶體的，本能的，不事彫飾的，不帶一個有教育的人的偏見或道德心的。有人說過，人們表現其品格於舉止上。我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全俄蘇維埃大會席上，瞧見史大林，跑上莫斯科大戲院的台上去。我是

恰在戲台前而之一排燈火下面的樂隊座位中，當時台上在成雙行的，有人民委員，威克(Lico)派來的代表，共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他從這雙行的背後出現。他穿得十分樸素，一件灰布戎裝，深色布褲套進長統靴內。方肩，矮胖，大塊的頭，頭上長着黑色鬚髮，狹小的眼，以眉毛很黑的烘托，更覺其狹小，臉上黑黻黻長着蓬鬆的黑鬚；他緩慢地沉着地跑，邊跑邊以足跟打地；頭向前突出，兩臂搖搖擺擺，使他看來像一個農民，不過是來自高原的一個農民——剛硬，堅忍，而固執的。不管歡迎他的歡聲如雷，他慢慢地跑，跑到李可夫(Lykoff)和加里寧(Kalinin)的背後，抬頭，望着歡迎他的羣衆站着不動，身微前俯——他的眼睛凝望着前方。只有大約二十名韃靼代表，是巴刺斯(Bukirs)、部耳里亞蒙古(Bouriat-mongols)、愛阿靠(takouts)、達格斯敦(Daghestan)等自治蘇維埃共和國派來的，是在他們包廂內謹守靜默的。他們穿着黃青色的綢製東方式長袍(Katans)，頭上長着長黑發光的頭髮，戴着繡有銀花的韃靼小帽，他們注視着眼睛狹小作一長縫的史大林：他們注視著迪克推多。

革命的鐵拳，西方的和文明資產階級的歐洲的死敵的史大林。羣衆的狂呼開始靜下來的時候，史大林慢慢地轉頭向着鞦韆的代表：這些蒙古人的視線和迪克推多的相碰着。一場大呼充滿着戲院：這是無產階級的俄羅斯，對赤色亞洲，對平原，沙漠，及亞洲大江的人民的歡迎。史大林又冷然轉向着羣衆。他繼續其前俯，不動的姿勢，視而無見的眼凝注着前方。

史大林的力量，藏在靜穩和忍耐中。他注視着托羅茨基的行動：研究他的運動，并以他自己的步武——是一個農民的沉重而緩慢的步武——來追隨他敏捷，猶豫，興奮的步調。史大林緘默，冰冷，而固執：托羅茨基驕傲，暴烈，自大，躁急，爲其野心及想像所支配。他生性是熱情，勇敢，好攻擊的。史大林說他是「一個可鄙的猶太人」。托羅茨基却稱史大林爲「一個可憐的耶教徒」。

當十月革命，托羅茨基，不給中央委員會或五人委員會知道，逕自使用紅軍以奪取政權時候，史大林站在一邊。只有史大林了解托羅茨基的弱點和錯誤，預先見到他

們將來會有的遙遠的結果。當列寧逝世托羅茨基唐突地把繼任問題作爲一個政治、經濟、及主義的問題提出時候，史大林已經把黨的機關拿了過來，柄着國政了。當托羅茨基攻擊史大林說他在列寧死前許久，已努力把繼任問題解決以爲已利時候，他却作一種沒人能夠駁倒的指摘。然而，在列寧病中給史大林以黨內的權威地位的，實是列寧本人。史大林碰着其敵人的攻擊時，却表現其手段高強，他說，他要對於列寧的逝世所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的危險作及時的預防。

『你利用他的病，』托羅茨基指摘他說。『爲的是防止你利用他的死，』史大林答說。

托羅茨基描寫他反史大林的鬥爭，寫得很是巧妙。在他的自傳裏頭，沒有一點透露出那場爭議的真性的。他主要的不變的宗旨，是要對國際無產階級，尤其是俄國無產階級，證明他並不是如他們所指摘那類的人，並不是如他們所誣捏的那類的人：一個準備作任何冒險或陰謀的布爾塞維克叛徒。照托羅茨基自己所說，人們所稱爲他

的異說的东西，不過是依照列寧自己的教訓來解釋列寧主義的企圖。他用『永久革命』的學說，無論對黨的主義的統一，或國家的安全，都不能算是一個危險。他並非要做一個路德或是一個拿破崙。

像一個歷史家一樣，他的趣味完全是爭論一類的。托羅茨基和史大林兩人，似乎受着密約的拘束的一樣，都努力把實際的爭權之戰，表現為觀念的衝突。而且，托羅茨基從不會被官方攻擊為抱拿破崙主義。這樣的一個攻擊，將會太明白地顯示給國際無產階級：俄國革命是正向資產階級的退化進行，拿破崙主義就是這個退化最明白的特徵之一。史大林在一個小冊子叫做『走向十月』(Towards October)的序上說：『永久革命的學說是孟塞維克主義的又一說法。』這就是官方的攻擊：托羅茨基的罪過，認為在於墮入孟塞維克的異說中。可是假如國際無產階級，對於史大林和托羅茨基的衝突的真正性質，能夠易受欺騙，真正情形，俄國人民也不能長被蒙蔽。個個人都明白：史大林對於托羅茨基，並非攻擊一種主義上的孟塞維克，在解釋列寧的迷津中摸

不到出路的人，却是攻擊一個赤色的拿破崙，唯一能把列寧的死變為一個政變，并把繼承問題安放於叛變基礎上的人。

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末，這個鬥爭，繼續為『永久革命』說的黨人，和列寧主義的官方保護者——托羅茨基所稱為列寧的香料保存的屍體的保護者——之間的爭論。托羅茨基以軍事委員的資格，可依靠軍隊和工會，工會由譚斯基（Tomsky）領導，譚斯基對史大林抱敵視態度，因史氏打算將工會放於黨的利益支配之下。譚斯基主張工會對國家的關係，應有自治的行動。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列寧便已看見紅軍和工會有同盟的可能，不無憂慮。在他死後，托羅茨基和譚斯基的私人協約產生一結果，士兵和工人作成一聯合戰線，來反抗農民和下中階級對於革命的腐化勢力，及反抗『史大林的十一月』（Thermidor of Stalin），像托羅茨基所稱謂。

史大林這邊，有G. P. D. 和黨政兩界的官員，史氏并預先瞧見法國革命歷史『二月十八』的危險，有再現於俄國可能。環繞着托羅茨基的名字的驚人的威望；由於他攻

猶登匿統(Yudenich)戈爾撒克(Kolchak)、丁尼金(Denikin)、蘭格爾(Wran-bel)等的勝利所帶回來的光榮；他的自負而玩世不恭的驕傲；這些使他成爲一種亦色拿破崙，爲之後盾的有軍隊；工人大衆，青年共產黨對於列寧老衛兵，和黨的集權制(hierarchy)的反抗精神。

著名的三雄 史大林，晉諾威夫，和卡美尼夫，使用最巧妙種屬的假裝，陰謀，和欺騙，在羣衆眼中做出和托羅茨基妥協的樣子，來激起同盟者中的不睦，散布懷疑和不满於其黨人當中，并使人們對於其言辭行動，和意向，都發生不信和猜忌之心。

(I.P.D.的首領，熱狂的達進斯基，用偵探和收買得來的人，彷彿做成一張網來包圍托羅茨基。G.P.D.的神祕可怖的機械，達氏把牠轉動，把敵人的腿一一切斷。達氏在暗中工作，托氏却在大白天下工作。事實上，當三雄損壞他的威信，玷污他的聲名，用絕大力量來表現他爲一個失望的向上爬者，一個藉革命而乘機取不正當利益者，

一個列寧遺教的叛徒的時候，托羅茨基却漫無計畫的向史大林，晉諾威夫，和卡美尼夫，向中央委員會，向列寧的老衛士，向黨的官僚等突擊。他責難小商人和農民階級的『十一月』反動的危險；他名喚共產黨青年，來幫助他反對革命的集權制的專制。三雄的回答，却取一種厲害誹謗的運動方式。所有報章都得有史大林的命令。漸漸地，托羅茨基覺得自己是孤立了。有關係的人，許多是膽怯，猶豫，或完全從鬥爭中退出；可是較為頑強，急進，勇敢的，却奮勉地作戰，雖則人自為戰，完全沒有聯絡。他們盲目地向同盟軍進攻，墮入對方陰謀詭計和奸詐的圈套中，結果彼此互不信任。士兵和工人，看到托羅茨基是創造紅軍的人，是推翻戈爾撤克和蘭格爾的人，是主張工會自由，工人專政以鎮壓新經濟政策和農民的反動的人；工人和士兵，對於十月革命的英雄及其觀念，還是忠實的。然而他們的忠實是十分被動性的；牠由於長期等候變成不活動的，反為托羅茨基的強烈而取攻勢戰役的莫大的負擔。

在爭議的最初的場面，托羅茨基實在相信：他能把一個黨分裂，能用工會和軍隊

的助力把『二馬共曳的車輪』（Troika 喻史大林等三人的聯合——譯者）推翻，以他自己的『二月十八』佔史大林的『十一月』之先。黨權和政權可以奪得，然後他能把他完全的共產主義的計畫實現。可是關於列寧思想的解釋的演說，小冊子，和討論，力量不足以使黨分裂。行動到底必需，這只等候托羅茨基選擇時日。情勢於他的計畫有利了。史大林，普諾威夫，和卡美尼夫，已經開始齟齬了。爲什麼托羅茨基不採取某種行動呢？當他可以實行動作，放棄辯論而舉事時候，他却消磨時光於研究大英帝國的社會政治情況，教訓英國共產黨應該怎樣着手奪取政權，努力把克倫威爾的鐵軍和紅軍，把列寧，克倫威爾，法國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拿破崙，和莫索里尼，作比較。『列寧』，托羅茨基寫道，『不能拿來和拿破崙或莫索里尼比較，只能和克倫威爾和羅伯斯庇爾比較。列寧是二十世紀的一個無產階級的克倫威爾。這樣解釋他是給了十七世紀的小小的資產階級的克倫威爾以最精美的可能的防護。』

當其時，托羅茨基，不運用他一九一七年十月的策畧來反對史大林，倒忙着勸告

英國輪船的船員，水手，燒火人，機房配電盤的人員，應怎樣和工人階級合作以達奪取政權目的。他正在分析英國水手和士兵的心理，爲的要測驗他們一接到向工人射擊的命令時他們的行爲：他忙着在解剖暴動的機械作用、爲的要瞧見，宛如在緩慢的運動中，拒絕射擊的士兵、遲疑不決的士兵、和假如同伴拒絕射擊使準備把同伴打死的士兵，這三種士兵的各個姿勢。這三種士兵是全部機械中的三種主要行動：那一種將會決定暴動的結果呢？在那個時候托羅基只想念着英國：他對於麥克唐納比對於史大林，遠爲關心。「克林威爾並不造成一個軍隊，只造成一個黨：他的軍隊是一個武裝的黨，他的權力就在於此。」在戰陣上，克倫威爾的士兵曾有「鐵軍」之號。托羅基說，「鐵軍對於革命常爲有用。在這點，英國工人可從克倫威爾得一番大教訓。」假如是這樣，托羅基爲什麼不決定行動呢？他爲什麼不把他的「鐵軍」，紅軍的士兵，去進攻史大林的擁護者呢？

托羅基的敵人，以他的遲緩得到了利益。他們免了他軍事人民委員的職，剝奪

他對紅軍的支配權。不久以後，譚斯基却了工會中領導的地位。大異說家兼可怕的叛徒，已經解除一武裝，在布爾塞維克黨中計畫造成拿破崙的二月十八日兩個主要從犯，現在都和他作對。C.P.D.把民衆對他的信仰漸漸地暗中破壞，他的擁護者的大半，以他曖昧不明的行爲和不可解的軟弱感着幻滅，審慎地退去。托羅茨基病了，他離開莫斯科。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他已在柏林一個護士家裏了：英國總罷工和匹爾蘇茨基的政變，使得他熱度高漲。他要回俄國，繼續鬥爭去。『當還沒有失掉一切時候，總不能算有什麼損失。』達進斯基，創造C.P.D.的殘忍而熱狂的人，死於一九二六年七月，當時他在中央委員會作反托羅茨基的暴烈演說。可是卡美尼夫和普諾威夫聯盟反對史大林，突然揭開。久已起於『三匹馬』的三個分子之間的不和內幕。列寧屍體前三個保護者之間的戰爭開始了。史大林邀得孟進斯基(Menjinsky)繼達進斯基而爲C.P.D.的指揮者)的幫助：卡美尼夫和普諾威夫却跑過托羅茨基這邊。行動的時刻已到。叛變之潮已起於莫斯科的禁城克勒謨林(Kremlin)四周。

在反史大林的鬥爭初期，羅素基已注意到：革命並非必然的事變。『如果革命可使合理地進展，革命也可以設法避免。』可是，事實上，以其近代變亂策畧的原理規則，設立革命準備的合理順序的，是羅素基本人。收一九二七年這個教訓的利益，這樣表示給歐洲各國政府看，保護資產階級的國家使免於共黨革命的危險為可能的，却是史大林。

歐洲最充分警衛，最為組織優良的國家的兩國，即荷蘭和瑞士，法律和秩序不僅是官僚的和政治的機關的產物，而且是其人民的一個天然特徵，在這兩國內應用共黨變亂的策畧的困難，並不會大於克倫斯基的俄國時代。這樣的似非實是的話，是根據什麼理由說的？是因為近代革命的問題是一個專門技術問題。『革命是一架機器，』羅素基說過：『只需要技術專家來把牠開動，也只有他能夠使牠停止。』這個機器的開動，是和國家的政治，社會，或經濟情況，沒有關係的。幹革命的並非大眾，只是少數的人們，準備着任何事變，受過變亂策畧的充分訓練，並知道對於國家技術事

業的重要機關作猛而疾的打擊的。這些衝鋒隊，應從專門工人中挑選，所謂專門工人是機器匠、電氣匠，有線無線的電報生，他們要在『專門技術』的工程師——懂得國家的『專門技術』工作進行的——命令之下動作。

在一九二三年的某次第三國際會議席上，拉德克（Radek）提議，在每個歐洲國家內，一種特殊團隊應受奪取政權的技術訓練。他主張，一千人，受過好的練習和訓練，便能在歐洲任何國家內奪取政權，不論牠是法國，英國，德國，瑞士，或西班牙。• 拉德克懷疑他國共產黨的革命技能。他批評第三國際的人物和方法時，他就對於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李普克尼希（Liebknecht）的事項，也不寬恕。一九二〇年，羅素基進攻波蘭時候，大家都很樂觀，拉德克是唯一反對這種樂觀的人。紅軍漸漸逼近威士杜拉河（Vistula）了，華沙陷落的消息，克勒謨林的人們料想隨時可以傳來。羅素基的成功，大部靠波蘭共產黨的支持。列寧當紅軍一到威士杜拉河，便盲目地自信地希冀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發生於華沙。拉德克說，『波蘭共產黨是靠不住的』

。他們是共產黨，但非革命家。』後來不久，列寧對澤金(Ul'ia Zetkin)說，『拉德克有先見之明。他警告我們。我很惱他，待他如一個敗北主義者(Defeatist)。但是對的是他，非我。他知道俄國境外的情況，尤其是西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的多。』

拉德克的提議，惹起列寧和所有第三國際要人的反對。列寧說：『如果我們要幫助外國共產黨來奪取他們國內的政權，我們必須在歐洲努力造成一種可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相比的情況。』列寧還是保持着他的戰略的觀念，忘却波蘭事變的教訓。只有辛羅茨基贊成拉德克的提議。他還進一步表明，莫斯科應設一技術訓練學校以訓練各國共產黨，使他們將來回國，能成爲各該國奪取政權的一特殊團隊的核心。希脫拉近來已把這個觀念復活過來，現在正在組織一間此類的學校，以訓練其衝鋒隊。『假如我能有千人的一隊，從柏林工人中徵募得來，給俄國共產黨鍛鍊過的，』托羅茨基說，『我能從事於二十四小時內奪取柏林。』他發動一個革命，從不依靠人民的熱誠，或大眾的參加。『大眾的參加也許有用，』他說，『但只在第二步反革命派的反攻須加

擊破時候。」他又說，德國共產黨，如果延擱一九一七年十月的策畧而不用，將常爲德國軍警所打敗。托羅茨基和拉德克，確曾擬定一個柏林革命的計畫。當一九二六年五月托羅茨基在德國首都施行喉部的外科手術時候，他曾被控爲到柏林組織共產叛變。可是在一九二六年，他已對於歐洲的革命不感趣味了。英國總罷工和波蘭匹爾蘇茨奇政變的消息，使他變爲熱狂，匆匆回莫斯科。在十月革命時代支配他，使他變爲像盧那車爾斯基所說「通了電流的電線」的他，也是這同樣的熱狂。當斯時，托羅茨基回到莫斯科，臉色蒼白，而精神熱狂，來組織衝鋒隊，以推翻史大林和奪取政權。

然而史大林却知道怎樣利用十月革命的教訓了。藉孟進斯基，G.P.U.的新首領，的幫助，他組織一個保護政權的特殊團隊。這個特殊團隊的司令部設於盧比安卡宮（Lubianka Palace），即G.P.U.的地址內。孟進斯基親自掌管這個共產黨徵募的挑選事宜。大概選自國營公用事業的工人，鐵路工人，機器工人，電氣匠，及電報生中。他們唯一的武器，是手榴彈和連發手槍，武器簡單，行動自能敏捷。這特殊團隊分一百

小隊，每隊十人，另有二十輛鐵甲車以增強其力量。每一支隊附有半連機關鎗手：各小隊和盧比安卡司令部的交通，由傳令騎兵保持。這整個組織，由孟進斯基完全管理，孟氏並把莫斯科分爲十個扇形。各扇形間和與盧比安卡間，用祕密電話線的網狀組織爲聯絡。除孟進斯基以外，只有裝電話線的人們，知道此電話線的存在。這樣，所有莫斯科技術機關的重要中心，都用電話和盧比安卡聯成一氣。在各扇形的戰畧地點上，有的屋宇是被許多『細胞』，或觀察中心佔據着，以爲支配及反抗根據地，這些地方做了整個系統的鐵鏈的鏈環。

小隊爲此特殊團隊的戰鬥單位，各小隊都得不斷訓練，使能在指定區域內，無需其他小隊協助，獨立行動。各人都得對於其本隊的工作及其扇形內其他九個隊員的工作，有完全了解。這個組織，依孟進斯基的意見，是『祕密的，看不出的。』牠的分子，不穿制服，也不佩任何證章。就他們爲該組織的分子，也約定保守祕密。他們受技術，軍事，和政治的訓練；他們養成恨惡已知或未知敵人，猶太人和托羅茨基

的信徒的心理。此特殊團隊的分子學習反抗托羅茨基的叛變策畧以防護政權的技術的學校，確是反閃族人的（Anti-Semitic）。史大林反閃族主義的來源，在歐洲已有很多人討論，有的人認為是對於農民偏見的一個退讓，和政治機會主義的一個必需。又有的人却認為是史大林反托羅茨基、晉諾威夫，和卜羊尼夫的鬥爭的一部，他們三個都是猶太人。史大林曾被指摘為犯法（因反閃族主義曾被宣布為一種反革命罪，可受法律嚴厲處分），可是這樣的指摘，是並不會把史氏的反閃族主義和防護政權的迫切需要的關係想想，也不會把史氏的反閃族主義看作爲他反托羅茨基的變亂企圖的策畧的一部。

史大林對於托羅茨基，晉諾威夫，卡羊尼夫這三個猶太人的恨惡，並不足作爲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十年的一個全國反閃族主義——使人憶起司毛里濱（Shol Yrine）的日子的——的重現理由。又史大林反對猶太人的鬥爭的來源，依理也不能歸于宗教的熱狂或傳統的偏見，毋寧歸於須對托羅茨基的危險的同盟者施行鬥爭。孟進斯

基說過，幾乎所有托羅茨基，晉諾威夫，和卞美尼夫的主要擁護者，都是以色列人；在紅軍，工會，和工廠中所有猶太人，也確歸附托羅茨基。在卞美尼夫佔有大半數的莫斯科蘇維埃內，在成爲晉諾威夫的心靈的列寧格勒蘇維埃內，反對史大林時幹部都是猶太人的。要把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軍隊，工會，和工人階級大眾，從托羅茨基，卞美尼夫，和晉諾威夫那兒拉開，只要把俄國人民對於猶太人所有舊時反閃族人的偏見和本能的憎恨點燃，便已夠了。史大林在反對『永久革命』的鬥爭上，依靠富農（Kulaks）的普通自私性和農民大眾的無知，這兩種農民都不會拋棄他們對於猶太人的年代久遠的恨惡。

史大林藉點燃這個反閃族主義，能夠把士兵，工人，和農民，作成一反托羅茨基主義危險的聯合戰線。托羅茨基爲奪取政權而組織的一個祕密社團，其組成分子，由於孟進斯基盡力追查，終於爲所捕獲。對於個猶太人，孟進斯基都猜疑爲叛變者，而加以迫害。這樣一來，反托羅茨基派鬥爭，很快便有了一個反閃族主義的政策

的一切特徵，而且確然受着政府的保護。猶太人都有系統地從軍隊，工會，政府及黨的機關，以至於工商業，辣斯管理機關那兒清除。托羅茨基派，原已侵入所有國家的政治，經濟，及行政集團，漸成破碎。許多猶太人，爲G.P.U.所迫害，被剝奪了生活和工作薪水，被監禁，被流放，被分散，或被迫居住於蘇維埃社會範圍之外，他們原都和托羅茨基的陰謀毫無關係：『他們必須替其他的人受苦，其他的人必須爲人人受苦，』孟進斯基說。孟進斯基被史大林所策畧弄得狼狽不堪：他受了人民對他的本能的嫉惡，無能爲力。舊俄國所有的偏見，都轉向這個叛徒，他是『像一個韃靼人般勇敢，像一個猶太人般卑鄙。』碰着這個意外的僥民本能和偏見的復活，托羅茨基能夠幹什麼呢？所有他的信徒都捨他而去，從最貧窮而最忠實的工人，他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承認他爲領袖，以至於士兵，他們會由他領導去和戈爾撒克和蘭格爾的戈薩克兵作戰得勝過的。在大衆眼光中，托羅茨基已成光是一個猶太人了。

當其時，晉諾威夫和卡美尼夫，開始對於托羅茨基，對於他的暴烈的無畏精神，

他的意志力，他的驕傲，他對於個個賣他的人的恨惡，以及他對於反對他的任何人的輕視，失掉信仰。卡美尼夫比晉諾威夫較為軟弱，較為缺乏決斷力，較多懦夫性質，但是他並不賣托羅茨基；他遺棄他。在反史大林的叛變的前夜，卡美尼夫對待托羅茨基，就和他十月革命的前夜，對待列寧一樣。後來，他還自己辯護說，『我並不信仰叛變的方法。』『他連賣友也不信仰，』便是托羅茨基的回答，因為卡美尼夫缺乏勇氣不敢公然賣他，他是永不原宥他的。晉諾威夫呢，却並不遺棄托羅茨基。他却在最後知道對於史大林的突擊已經失敗的那刻，賣他。『晉諾威夫並非懦夫；他只在危險時候跑開。』

托羅茨基曾告訴晉諾威夫跑去列寧格勒，一聽得莫斯科的叛變獲得成功消息，便把工人小隊組織起來奪取列寧格勒。這樣，托羅茨基曾避免了晉諾威夫在極危急的時刻和他接近。可是晉諾威夫再也不是列寧格勒的大眾的偶像了。當示威運動在故都組織，以慶祝一九二七年十月的黨的中央委員會的開會時候，遊行示威者突把這個事

件變爲對於托羅茨基忠誠的一個表現。假如晉諾威夫在列寧格勒工人當中還有幾分勢力，光是這件事也可引起一場反叛。後來，他曾自己表功，說那個叛變性的示威是他攪成的，可是究其實，這事完全出他和孟進斯基意料之外。就托羅茨基也覺着駭異，可是他却聰明，不會乘機利用。列寧格勒的工人大衆，再不是十年前的那種了。又，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赤衛軍，却變爲什麼了呢？

史大林眼見着工人和士兵的行列，前進，吹口笛，在中央委員會的看台下的陶賴德宮前經過，羣擠到托羅茨基的台前，向着十月革命的英雄，紅軍的創建者，工會自由的擁護者歡呼，他使看出托羅茨基的祕密組織的軟弱。那人，僅只少數的果斷的人，也許可不發一槍，把城市奪得。但是那時再也沒有安妥諾夫與夫寒安柯來指揮工人小隊，和叛變的衝鋒隊；晉諾威夫的赤衛軍恐怕他們的領袖，要把他們賣掉。假如托羅茨基的黨派，在莫斯科的，確不比在列寧格勒的強，孟進斯基使相信這個戰爭無異已經得勝。托羅茨基再也站不住了。許久他就注意着下面的事：他的黨徒被迫害，被

拘押，被弄到不能活動，被流放；其勇氣和可靠性向來是無可懷疑的，現在都天天捨他而去，這樣的人也實在太多。他以拚命的勇敢，以他血裏被迫害的猶太人的所有不可克服的驕傲，以他那種殘忍的復仇的意志力——這有時使他的聲音帶一種失望和反抗的聖經音調——親自作戰。

那時在工廠兵營的大會演說，而對着狐疑懦怯的士兵工人的羣衆的演說者，是臉色蒼白，目光淺短的，他的眼睛以熱狂和失眠而擴大。現在站在他們前面的，再也不是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托羅茨基，這麼動人，聰明，妙語橫生，却是十月革命和內戰時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和一二一年的托羅茨基，布爾塞維克的叛變者，史摩爾尼學院和戰場的托羅茨基，偉大的暴動家了。莫斯科的工人大衆，以他的臉色蒼白和感情暴烈，認識他爲列寧最激烈時代的托羅茨基。叛變的火燄已經在工廠兵營中燒着了，可是托羅茨基拘泥着他的策略。他用以奪取政權的，並非羣衆，只是秘密組織的衝鋒隊。他所追求的奪取政權的路

線，不是用工人大眾的叛變，只是用革命的科學組織。

革命第十週年紀念，要在幾星期的時光內慶祝了，歐洲各國的代表、第二國際各區的重要人，定會依時到莫斯科。可是托羅茨基却正在準備以他對於史大林的勝利，來慶祝他對於克倫斯基的十週年的勝利。對於莫斯科衛城內心腸狹窄的資產階級的「十一月」，再來一個無產階級的暴烈革命，工人代表，應得親眼看看。「托羅茨基正在騙人了」，史大林微笑說。他是密切注視着他的敵人的一舉一動。

大約一千名工人士兵，托羅茨基的舊黨徒，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革命觀念仍然保持忠實的，準備着偉大日子的來臨。技術專家和專門工人的小隊，早已從事於「瞧不見的演習」。孟進斯基的特殊團隊的人們，無論在什麼地方探聽托羅茨基的叛變機械的跳動，都聽得見；又有整百的小預兆，暗示著危險就在前頭。孟進斯基試用他力所能及的種種方法，來妨礙他的敵人的行動，可是鐵路上，電力廠內，和郵政電報局內的怠工，一天似一天增加了，托羅茨基的黨羽，處處都進去過了；他們對於國家公

營事業的個個輪輻都試驗過了，他們還隨時把她完全停止轉動。這些不過是走到叛變本身前的小戰。當其時，孟進斯基的技術專家，却日夜動員，守護着國家的機關。他們也不斷地試驗牠（國家的機關）的效率，牠的反動，和牠的抵抗力。孟進斯基是寧願馬上把托羅茨基及其最危險的同謀者拘捕起來的，但是史大林不答應他的請求。在十月革命十週紀念日前拘捕托羅茨基，將使大眾和從歐洲各地到來莫斯科參加典禮的工人代表，得一不良印象。托羅茨基選擇此時來奪取政權，是再好沒有的了。他的策略的睿智，已使他知道怎樣自處。史大林因恐怕專制的表現，決不敢拘捕他。假如到了他敢這麼幹的時候，那定然是太遲了，托羅茨基說。那時革命十週年紀念的煙花，便要爆發，史大林再也不會再掌國家樞要大任了。

叛變的主要工作，開始是要奪取國家公用事業的總局。接着是要拘捕人民委員，中央委員，和監察委員。可是孟進斯基對於這個是完全提防了；托羅茨基的赤衛軍到來了，房子是空的。所有史大林派的領袖，都躲到京城內去了；史大林在衛城內，忍

耐地靜寂地等候着叛變的衝鋒隊和孟進斯基的特殊團隊的奮鬥的結果。時爲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莫斯科似乎穿上了紅色衣裳。從俄國各部分和從亞洲最遠區域派來的蘇聯的同盟共和國的代表們行列，在沙倭 (Savoy) 飯店和麥脫羅玻爾 (Metropole) 飯店前面經過，歐洲的代表是在這兩間飯店住着。整千整萬的紅旗，在列甯陵墓上，赤色廣場內，衛城城牆下飛舞。在廣場的一端，布來圖尼禮拜堂 (Yasili Biyenni Church) 附近，整整齊齊排列着蒲得揚尼 (Budyonni) 的騎兵，騎兵旁邊便是杜卡澤夫斯基 (Tukachevsky) 的步兵，和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二一年的老兵，這些士兵都是平羅茨基曾領導去平內亂得到勝利的。當服洛示羅夫 (Voroshilov) 軍事人民委員，在檢閱蘇聯的軍隊時候，平羅茨基却企圖用一千人來奪取政權。

孟進斯基預防着。他的防禦的策畧 是不把軍隊嚴陣整隊於有被攻擊危險的建築物前面，以爲保護，只由少數的人藏於屋內，以爲防衛。他用瞧不見的防禦，來抵擋

托羅茨基的瞧不見的攻擊。他絕不用軍隊散布於衛城，人民委員會，工業托辣斯總局，或企業組合和政府行政機關的四週。他集中他的特殊團隊來防守公用事業機關，G.P.U. 警察的隊伍，却用來護衛着國家政治和行政的機關。托羅茨基却事前不知道孟進斯基的策畧，等到他發覺他的敵人已學曉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功課時，却已太遲。當被告以他的對於電報局，電話局，和火車站的突擊失敗了，料不到的不可解的事情發生有時，他馬上明白，他的變亂，是碰着了遠比光是警察手段爲複雜的一個有組織的防禦。但是他還不明瞭事情的真相。當他最後得到奪取電力總廠的失敗消息時，他突然改變計畫，決定來奪取國家政治的和行政的機關。瞧見他的衝鋒隊，已給敵人猛烈的突擊打敗，向各方面逃散，他便放棄他原定策畧，集中他的全力來作民衆叛變的最高企圖。

托羅茨基那天在莫斯科對無產階級大眾的演說，只有幾千的學生和工人聽見。當一個龐大的羣衆，滿布於列寧墓前的赤色廣場，圍繞着史大林，圍繞着黨和政府的領

袖；圍繞着第三國際的外國代表時候，托羅茨基的黨徒，衝入大學禮堂，避免着警察的攻擊，領導着一隊學生和工人出發到赤色廣場去。

托羅茨基的行爲，是易受批評的。對民衆的煽動，街頭巷角的策畧高升爲一種赤手空拳的暴動，都是一個瘋狂的冒險。可是事情是這樣的，舉事失敗以後，托羅茨基已失掉了自制力。在過去，特別是在他生平千鈞一髮時刻，他冷靜的智力曾用遠見來挽和他活潑的想像，用某程度的玩世不恭來調劑他偉大的熱情；可是現在他似乎以失敗而沉醉了。事情既一發而不可收拾，他便屈服於他熱烈的天性，這個天性更刺激他使他作以一場暴動來推翻史太林的絕望的企圖。也許他知道大勢已去，大家已對他失掉信仰，僅有很少的朋友還是對他忠實。他一定覺得現在他只能依靠自己，雖則和賭博一樣，還有一張牌在手，總還不算完全輸了。

托羅茨基甚至被攻擊爲定有一個鹵莽的計畫，擬把列寧的塗了香料的屍體，從衛城城腳的陰沉的陵墓玻璃棺中取出。然後召喚人民環繞着革命的神物，以此神物作爲

攻擊史大林的專制的一個攻城機，這個觀念，若果是可怕，其中也有偉大的元素。也許奪取列寧的屍體的觀念，曾在托羅茨基的熱狂的心頭掠過，當他聽見羣衆的吶喊，注視着他小隊的學生工人邊唱國際歌，邊向充滿着士兵人民，刺刀棘立，紅旗飛舞的赤色廣場前進時候。

在第一次接戰，這小小的行列，便被擊退了，被趕散了。托羅茨基舉目四顧。他的忠實的朋友，他這派的領袖，打算奪取政權的小小的軍官，那裏去了？猶太人是不適於作真正戰爭，作肉搏的戰鬥，或革命的。在那場暴動中始終不變的唯一猶太人，只是托羅茨基，偉大的暴動者，布爾塞維克革命的叛徒。『一個士兵槍擊我的車子，彷彿來警告我，』托羅茨基寫道。『有的士兵又在攔準了。在那十一月七日有眼看見的人們，目擊莫斯科街道上又一個「十一月」的企圖』。

在他流亡在外的無聊歲月中，托羅茨基相信無產階級的歐洲，可從這些事變得到教訓。他忘記中產階級的歐洲，也一樣可得這些教訓的利益。

(註一)佐治亞人，爲高加索山居人種之一，以其肉體美著名。

(註二)Thermidor爲法國革命之第十一月，由七月十九日起算。Thermidor七月十九日爲法國大革命時代，羅伯斯庇爾被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政權被推翻，大革命完結的日子。托氏所說史大林的『十一月』，意指史大林把俄國革命斷送的日子。

變亂與革命技術

第三章

一九二零年波蘭的經

驗：華沙秩序良好

第三章 一九二〇年波蘭的經驗：華沙

秩序良好

我在凡爾賽最高軍事會議 (Supreme War Council) 花了幾月時光以後，在一九一九年十月被任命為波京華沙意大利使館的外交隨員。這樣，我才有幾個機會知道匹爾蘇茨奇。我漸漸發見他，受他的想像和他的熱情指導的，遠比受邏輯指導的為多；與其說他是野心，無寧說他是專橫；骨子裏稟賦的，意志力比智力為多。像所有從立陶宛 (Lithuania) 來的人一樣，他是不怕稱自己為固執或瘋狂的。

光是他生平的事，不能使他得波盧他 (Putarch) 或馬基雅弗利的友誼。依我看來，他的革命者的人格，似乎遠不若偉大的反革命者如威爾遜、克利蒙梭，魯意喬治，或福煦 (Foch) 的有趣，他們在和會席上我都會過，和密切注意過。拿光是一個革

命者的身分、匹爾蘇茨奇似乎又不足和史坦布力斯巨 (Stambuliski) 比較，史氏給我的印象，使我認他爲一個缺乏任何道德觀念的人，一個很熱烈而玩世不恭的叛徒，他敢在一九一九年歐洲諸國當中說及和平和正義。

匹爾蘇茨奇住於華沙的柏爾味對勒 (Belvedere)，我第一次在那兒會他，我不禁詫異。他的外貌和舉止是出人意料的。我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的布爾喬亞的叛徒，整天在想大胆計畫的概念及其實施，只要他的計畫和他的時代與人民的文明歷史觀念不生衝突，且和法律相合，然而法律他是想任其本人不越出其範圍限度內施以破壞的。事實上，匹爾蘇茨奇在一九二六年政變前後的行爲，和德利撒 (Maria Theresa) 的波蘭政策的口號無大差異：「像普魯士人那麼幹法幹去，可是常須保存一個誠實的外貌。」

匹爾蘇茨奇會把德利撒的格言牢記，及這麼耐心地保持合法的外貌，自然是不足爲奇。這種爲一個觀念所囿的特點，爲許多革命者所特具，證明其，舉例來說，不能

在一九二六年依照一個不光是政治的藝術的規則來計畫及實施一個革命。凡藝術都有其技術，而革命技術又並非所有大革命家都澈底明瞭。卡替來那(Catiline)、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以至於列寧，只舉這幾個最有名的來說，知道一切關於革命所應知道的事，却不知道革命技術。在二月十八日的拿破崙和布郎熱(Boulangier)將軍之間，只有一個琉細安(Lucien Bonaparte)。一九一九年秋末的波蘭人民，認判匹爾蘇茨奇，是唯一可付託以波蘭共和國的命運的人。那時匹氏是國家的首領，可是他的權力只是在憲法未定以前臨時性質的，憲法將於正月由國會草擬。國家首領的威權，此外還受黨的陰謀和個人野心所束縛。至於匹氏對於有制憲權的國會，其所處地位，又很和克倫威爾在一六五四年九月三日對英國國會的一樣。

輿論希冀他把國會解散，把政府責任負擔起來，總屬徒然。這個迪克推多，既暴烈，又布爾喬亞，既好亂，又留心要在民衆眼中表現其爲守法和公正，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將軍，是一個中上的革命家兼一個中下的反動者，他不能決定於內戰和對蘇俄戰

爭之間。他彷彿個個禮拜都要革命的樣子，却又極願用一個將來的憲法來鞏固自己的位置。此人在輿論方面，確惹起多少驚訝，却沒有引動一點憂慮。

不僅社會黨，就右派的人，都很着急想要知道，這個提秀斯(Theseus註)，已把亞立亞德尼(Ariadne)的線玩了一年多，還沒有作最後的決定，把他用來引波蘭以出於牠所陷入的政治和財政的『迷園』，抑或把這共和國縊死，他到底怎樣。他打算在波蘭國王的夏宮柏爾味對勒消度的時光，他似乎寧願花費於和首相帕得勒斯岐(Pater-cwaski)競爭其陰謀和狡獪上。帕得勒斯岐住於王宮——華沙中心的波蘭國王的冬宮——內，笑以他的大鋼絲琴的曲調，匹爾蘇茨奇却以他的騎兵的號角爲和音。

國家首領的威權，在人民待來，是一天減似一天了。這是消磨於議院的爭論和政黨的陰謀中。內幕外患交迫而來，匹氏仍然不動，這費解的事，使社會黨對於前此在流放中在謀叛中的同志的信念，受一很嚴重的壓迫。在沙皮愛哈王(Prince Sapieha)——他是一九一九年正月反匹爾蘇茨奇的政變失敗的主角——無效的企圖以後，波

蘭貴族已不復作突然奪取政權之想。可是當他們的野心突然復活時，他們却相信，匹氏現再也不能保護公衆自由便免於右派的攻擊，及自此以後他再不能爲他們自由行動之一障礙。

匹氏對於沙皮愛哈王並無懷怨，沙氏和他一樣是個立陶宛人，不過沙氏是一個大紳士，能得人歡心，有禮貌，文雅到一種瑣碎的矯飾地步。他的文雅是從容不迫的，頗像英國人的滿不在意的態度，這種態度外國人而受教育於英國的，染得很易，有成爲第二天性的可能。沙氏並不是會惹起匹氏的猜忌或嫉妬的人；他的反叛會是這靡愛美家的無經驗的一件事，匹氏並不因而憂慮。

匹氏是小心的，雖則也是好鬥的，他又藐視波蘭貴族至全不在意的程度，他對沙氏報仇，派沙氏爲聖詹姆士（St. James）朝的大使：這個薩拉（Salla）生長於劍橋，回英國完成其教育。

打算用暴烈手段來奪取政權的計畫，不僅見於反動派（他們恐怕議會的紊亂對於

波蘭會有危險)當中。哈勒(Joseph Harter)將軍，從法國前線打仗歸來，待時而動，他是一隊盡忠於他的義勇軍首領。他是匹氏的一個敵人，準備隨時要求繼位權。英國派遣隊(British Military Mission)的首領威亞脫將軍(General Carton de Wiart)，他是使波蘭人想起納爾遜的，因為他在歐戰時眇一目，失一臂，他慣常說匹爾蘇茨奇應該提防哈勒。哈勒跛腳，和塔力藍(Talleyrand)一樣。

這時國內的情況不斷地漸增惡化。帕得勒斯岐下台時，黨爭又變兇猛，新議長斯考爾士奇(Skulski)，對於政治的或行政的紊亂，各派的要求，或秘密醞釀的要求，都不適去解決。在三月底，華沙軍事會議的一次會議席上，哈勒將軍明顯地反對匹爾蘇茨奇。通過了奪取基輔(Kiev)的案以後，哈勒退到鄉下去，不聞不問，態度深藏莫測，這似乎和上項決議的戰畧的重要不相合。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波蘭軍隊越過烏克蘭邊界，五月八日佔領基輔。匹氏

輕易得來的勝利，激起波蘭全國很大的熱誠。五月十八日，得勝的英雄，華沙居民開勝利歡迎大會去接他，這次大會，他的熱狂黨徒之最坦白的，好拿歡迎馬倫哥（mar-
sullo）的英雄的大會來作比較。同時，六月初，托羅茨基所率領的布黨軍隊，開始進攻。六月十五左右，蒲得揚尼的騎兵已重佔基輔。議長斯考爾士奇，讓位於格刺布士奇（Grabski），外交部長帕德克（Patek），却由倫敦大使沙皮愛哈王繼任，沙氏浸染着英國的自由主義和平地歸來。全國人民都武裝起來反對赤軍的侵入：哈勒本人，雖和匹氏有怨，也挺身而出，以援救他的屈辱的敵人；他帶着義勇軍回來。可是黨派的爭吵，還似乎超越一切以上，其聲之大，竟使蒲德揚尼的馬嘶聲莫能聽見。

八月初，托羅茨基的軍隊，到了華沙門口了。在城市街頭巷角探聽消息的緘默着急的羣衆當中，有一羣一羣的逃兵，亡命者，和逃難農民；戰爭的雷般的聲音，一天近以一天，新議長格刺布士奇倒了，繼任者維安斯（Witos），不爲右派所信任，作絕望的努力去把黨爭消弭，和把市民的反抗組織起來。在工人階級區域內，和在納列夫

斯巨(Nalewski)的區域，即華沙猶太村——那兒住有十萬猶太人，他門急切地守候着戰事的反響——內，已有反叛的徵象。最離奇的謠言，可聽見於國會應接室中，各部守候室中，銀行和報館中，咖啡店和兵營中。有人談說，維安斯曾向德國請援，德國的干涉快要來阻止布黨的攻擊。後來我們又聽見說，和柏林的交涉確曾進行，不過此事是維安斯與匹爾蘇茨奇的完全同意所發動。威根德將軍(General Weyand)的到來，似乎多少和這種談話有關，他的到來，確然是使維氏計畫失敗，並對匹氏表示不信任的。常常準備和法國政策合作的右派的人們，攻擊維安斯無用和鼠首兩端，大聲疾呼要一強力政府。維安斯不能自主地增劇了一般的紊亂，因為他完全不能止息黨派的紛爭，及因為他把所有國難責任，始而歸於右派，繼而謗於左派。敵人是存城門口了。饑餓和叛亂已經把握住了華沙。行列來來往往於郊外的街道上，和克刺靠斯基，普澤美斯西(Krakowskie Przedmiescie)鋪道上。一隊隊臉凹眼凸的逃兵，遊蕩於銀行，宮殿，及富人房屋的前面。

八月六日，刺提大人(Morsignor Ratti)，即教皇嫩西峨(Papal Nuncio 現為教皇庇護第十一 Pope Pius X)·往訪議長，并以外交團領袖的資格，借英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等國公使同往，要求維安斯馬上說明，假如波蘭政府須退出首都時，將遷去什麼地方。這個步驟是先一日決定的，所有外交團團員曾在嫩西峨事務所中經過一番長時間討論。大多數到場的人，都和英德兩公使，藍波爾德爵士(Sir Horace Rumbold)和奧柏多爾夫伯爵(Count Oberndorf)一樣，主張把外交團馬上搬到較安全的地方，像波森(Posen)或辰斯托和發(Uzenstochowa)去。藍波爾德爵士甚至提議，應強迫波蘭政府選波森為臨時首都。主張留於華沙至最後一刻的只有兩個，便是嫩西峨，刺提大人，和意大利公使，譚梅信尼(Tommasini)。他們的態度在會議席上曾受厲批評，波蘭政府也不大以為然：如果教皇嫩西峨和意大利公使願留於華沙，這一定是因為他們暗中希望到了最後退不出的時刻，他們可在布黨佔領下繼

續居留。這樣，教皇嫩西峨便有一個機會，舉行教皇宮廷和蘇維埃政府之間的交涉，來討論有利於教會的宗教問題。教會早已留心蘇俄的事變，只在等候時機以擴其勢力範圍於東歐。可爲這點的證明的，不僅有委派哲諾趣大人 (Monsignor Genocchi) 爲烏克蘭的羅馬教皇使者的事實，還有教皇把明白的保護權擴張到希阿波力斯 (Heopolis) 的聯合總主教，塞替趣大人 (Monsignor Andre Szeplychi) 身上的事件。羅馬教皇宮廷，已常認加里西亞的聯合教會 (Galician uniate Church) 爲天主教克服俄國的一個天然媒介了。

至於意國公使譚梅何尼，便被推想爲執行其外交部長斯福擦伯爵 (Count Sforza) 的命令，斯氏也是傾向於和俄國發生友誼關係，因爲意大利國內政策，大概受意國社會黨強迫要求所支配。要是華沙被布黨佔領了，意公使譚氏在華沙，便可給予斯伯爵以一適當的和莫斯科政府發生外交關係的機會。

議長維妥斯，以極冷淡的態度，來詢問刺提大人的提議。然而終於大家同意，波

蘭政府在危險時，將遷往波森，並將照拂外交團的搬遷事件。第二天，八月八日，很多使館秘書離開華沙。

布黨軍隊的前鋒，已抵城門口了，在工人的郊野區，最初的槍聲已可聽見，現在是革命的時刻了。

這個時候的華沙，看來像是一個等候被劫的城市。天氣的大熱，似乎窒息了所有人聲和噪音。街上的羣衆是完全不噪的。時而一個運送傷兵的很長的電車，慢慢地從這些人羣中經過。傷兵有時從窗口外望，搖拳咒罵。一陣不停的嚼嚼聲，從此鋪道到彼鋪道，從這條街到那條街地展開。一羣布黨的俘虜，打壞的，背駝的，以及跛腳的，制前前面有紅星爲記，在騎兵保護之下前進。羣衆默默地讓路給她們經過，馬上又集攏了。隨處有鬥爭爆發，但都馬上給洶湧的羣衆壓倒。有的時候，一個稀少的熱狂的軍士的小行列經過，擎着黑十字架高出人頭的海上；羣衆如波浪般慢蕩而前，然後一個人流追隨着十字架，過捲着十字架，退回，迷失於擾亂的人海中。在威士杜拉橋

上，又一堆羣衆在凝神靜聽遠處的砲聲。帶着熱和塵的沉重的雲，蔭蔽着天邊，天邊震動雷鳴，彷彿有一架攻城機正向牠攻擊一般。

火車總站，日夜都被軍隊的飢餓逃兵，和各族各色的難民包圍着。在這些混亂的日子，只有猶太人似乎是覺得沒事般的。納列夫斯巨區，華沙的猶大村，正在歡躍。波蘭人平時迫害以色列人的子女，這兒猶太人含恨至深，是以他們瞧見天主教和不能容忍的波蘭結局悲慘，免不了引爲快愉。納列夫斯巨的猶太人，普通是由於小心和傳統而這麼靜默和被動的，以很例外的勇敢暴烈行動透露出他們的感情。猶太人變爲謀反的了，這是對於波蘭人的一個凶兆。

難民從佔領區域帶來的消息，更點燃起謀叛的精神：他們說凡被布黨佔領的村莊和城市內，主要地包含本地猶太人的一個蘇維埃都成立起來了，被迫害的猶太人真的成爲迫害者了嗎？自由，報仇，和權力，這些果實是這麼的甘美，納列夫斯區的可鄙的居民，也渴欲嘗嘗。在華沙城外僅只幾英里之遙的紅軍，有一個天然的同盟軍，這

便是城內龐大猶太居民，其數日見增多，其憤日見激越。在八月初，華沙城內至少有五十萬猶太人。我時常不解，這個偉大的渴欲反叛的民衆，像他們那麼充滿一種瘋狂的嫉惡和對於自由的飢渴，什麼使他們不試行反叛。

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一個奄奄待斃的政府，國家大部分被敵國侵略，首都被圍且在紊亂狀態中，只要有一千人，果斷而準備着任何事件的發生的，便可不發一彈，把這個首都佔領。可是我那個時代的經驗教訓我：一個叛變的領袖雖然可爲猶太人，革命的工具却不應從以色列人的子女中徵募。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彼得格勒的布黨革命的叛變領袖，是猶太人托羅茨基，不是俄國人列寧；可是實行者，叛變者，實際都是俄國水手，工人，和士兵。托羅茨基在一九二七年和史大林的鬥爭中，損失很大，方知道依靠以猶太人爲主的徒衆來實行革命，是多麼危險。

外交團差不多天天在嫩西職事務所開會，討論當時的形勢。我常常跟隨意大利公使譚梅信尼去，譚氏是不大喜歡他所有同僚的態度的，他們都擁護藍波爾德爵士和奧

柏多爾夫伯爵，只有法國公使巴納費歐(M. de Parafieu)，他雖然以為形勢最是嚴重，並不掩其恐怖，却恐怕外交團搬到波森去，要令人發生一個逃亡的印象，惹起公憤。他和刺提大人，及意大利公使一樣相信，華沙非至最後一刻不要退出，藍波爾德及奧柏多爾夫馬上離開首都的勸告不要聽從，除非國內的形勢瓦解，波京的軍事防禦因而陷於危險境地時。

巴納費歐的見解，實際上和英德公使的較為接近，和嫩西峨及意公使的較差遠些。這後兩人，自然，縱使布黨入了城，也要停在華沙的，但是他們坦白地希望着波蘭軍事和內國形勢的變佳。他們看到外交團遲到最後一分鐘才來遷去波森，並無危險。

但於巴納費歐看來，只是軍事情況似乎有希望的。他不大能不信任威根德。因為一個法國將軍現在已被付託以波京防護的責任，法公使乃假意和藍波爾德和奧柏多爾夫一致，不因他是懷疑軍事情況，但只因國內情勢危險潛伏。法德兩公使，特別害怕華沙會落入布黨軍隊手中。只一個猶太人的或共產黨的反叛，能夠公式的使巴納費歐

掛慮。「我所怕的，」法國公使說，「是匹爾蘇茨奇和威根德會受襲擊。」

依佩雷格里納迪大人(Monsignor Pellegrinetti)、嫩西峨事務所的秘書、所說，教皇嫩西峨並不相信革命。「嫩西峨，」英國派遣隊首領威亞脫將軍說，「不能看到這個從華沙的猶太村及外來的可憐的暴民，敢於試行奪取政權。」但是波蘭並不像教會裏一樣，只有大主教和教皇能夠幹政變的事。

刺提大人相信反叛必然失敗。雖則政府，軍事領袖，和統治階級，換句話說，負事變責任的人們，對於新的和更嚴重的危險所取預防手段，他並不以在在意。可是巴納費歐的辯論，是屬於一種太過嚴重的性質的，要不惹起嫩西峨心中的懷疑也不可能。是以，佩雷格里納迪大人一朝來訪公使譚梅信尼，我並不詫異。主教的來意，是在担保他，政府已取了種種預防手段，來抵抗任何將來的叛變企圖。意公使馬上遣人叫我，就在佩氏面前，解釋嫩西峨的懷疑，并告訴我找出政府究已取了什麼預防手段，以防止紊亂及鎮壓反叛。意大利派遣隊首領羅美將軍(General Romei)剛剛帶回新

聞證實亦軍攻擊的繼續進展，這個使他對於華沙的命運已一點沒有什麼疑問了。這是八月十二日。那天晚上托羅茨基的軍隊，離城大約只二十英里了。『要是波蘭軍隊能夠再支持一兩天，』意公使說，『威根德將軍的行動也許還可以成功。可是我們決不要希望太奢。』他吩咐我跑到他們恐怕有發生亂子可能的工人階級區域和納列夫斯區去，馬上發見出城中最危急的地區來，并找出威根德和匹爾蘇茨奇曾受充分保護，政府有無充分保障，以免於一場可能的突擊。『你不要一個人去，』他結語說，『也許好些。』他勸我和法使館隨員，羅爾林隊長(Captain Rollin)，一道去。

羅爾林隊長，一個騎兵軍官，是在公使館幕僚中『第二局』。他是巴納費歐和法國派遣隊首領亨利士將軍(General Henrys)最能幹最有天才的合作者中之一個。他常來意國公使館，和意公使極其要好，他們確是誠懇的朋友。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法西斯蒂革命時代，我曾在羅馬再和他相會，他在羅馬做法內塞宮(Farnese Palace)的法大使館的隨員。莫索里尼的革命策略，曾完全得到他的讚賞。

布黨軍隊把華沙包圍起來以後，我憤和他大大跑到波蘭的前哨去，爲的要更密切地注意戰爭的變化。可是布黨軍隊並不看來怎麼可怕，除掉赤色戈薩克兵以外，他們是可怕的騎兵，值得爲更高尚的理由來盡力的以外，其他的，都遲鈍地可憐地作戰。他們看來像一個飢餓的襤褸的羣衆，只受恐怖和飢餓所推動的。由我所有在法國和意大利前線的戰鬥經驗來看，我總不了解波蘭人和這樣的軍隊相遇何以也要敗退。

羅爾林隊長似乎想到，波蘭政府一點也不曉得防衛一個近代國家的藝術。這同樣的批評，在另一意義上，可以適用於匹爾蘇茨奇。波蘭的軍隊被人稱說爲無畏的。可是無畏的軍隊又有什麼用，如果他們的領袖不知道防禦的藝術在於知道本身的弱點？波蘭政府所取以應付叛變企圖的防範手段，證明牠是不知道一個近代國家的最弱的地點所在。

革命的技術，自薩拉的時代以來，已大大進步了：那麼顯然地，克倫斯基所用以

防止列寧奪取政權的方法，應和西塞祿 (Cicero) 所用以隄防卡替來那危害共和國的手段，很不相同。從前這是一件應由警察解決的事，現在這倒已成一個專門技術的問題。當一九二〇年三月，在柏林，警察和技術手段都付之實驗時，對照起來是很明白的。

波蘭政府依照克倫斯基的榜樣：確然，牠是依着西塞祿的經驗行動的。可是奪取和防護國家的藝術，已隨世紀推移而改變，并隨國家性質變化而改變。如果卡替來那的謀反可以某種警察手段成功地制止，類似的手段是不能提防列寧的。克倫斯基的錯誤，在於他使用西塞祿用以防護他那時的羅馬市場和郊外的方法，來企圖保護一個近代城市易受損害的地方：銀行，火車站，電話和電報總局。

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卡普 (Von Kapf) 忘記了：除掉威廉街 (Wilhelmstrasse) 的聯邦議會和各部以外，柏林還有其電氣的及無線電的站所，工廠，和鐵路。共產黨利用他的錯誤，把柏林的生活變為麻痺，使臨時政府歸於崩潰，這臨時政府的成立，是

由於軍事警察方法的暴力空擊。在十一月一號的晚上，路易十拿破崙（Louis Napoléon）開始革命，是把所有的印刷所和鐘樓佔領。可是波蘭人民從不記得他們自己的經驗，其他民族的，那就更不用說了。波蘭的歷史，充滿波人以爲他們所特有的事變。他們不相信他們民族生活上的某一件事，可於其他民族中找得：他們是第一次經驗此事；此事從不會在任何地方發生過。

維安斯政府所取的預防手段，是通常的警察手段。威士杜拉的諸橋，鐵路橋，及布拉格橋（Prague Bridge），每一橋端只有四名士兵駐守。電氣總廠是不守衛的：那兒我們找不到更夫或守兵的蹤影。經理告訴我們，首都軍事總監剛才會打電話說，如果有任何機器被毀，或電流被斷，應由經理本人負責。華沙外邊的納列夫斯巨區域以外的衛城，充滿着騎兵和馬匹。我們進出自由：守兵從不問我們的通過證。偶然地，衛城內發現一堆的武器和火藥。車站陷於完全混亂中：一羣羣的難民襲擊火車，不受約束的羣衆擠滿月台和軌道，一組組喝醉了兵士，直挺挺地大夢沉酣地睡於地上。

羅爾林是知道拉丁的，『Sommo vino bue Sepuliti』只要十個人，以手榴彈爲武器：

和平常一樣，四個衛兵守衛着大本營，大本營地址在華沙第一廣場內，自是以後被毀的一間俄國教堂陰影下。大門和廳室都給不斷地來來去去；由頭至腳渾身灰塵的軍官和傳令兵擠塞着。我們利用這種混亂狀況，上樓，跑下一個走廊，經過一間房子，房內掛有許多地圖，一個軍官坐在房角的一張檯前，抬頭招呼我們，臉上帶一種討厭的神情。我們跑下又一道走廊，到了一種等候室中，然後我們又跑到大廳中。當我們再在廣場內兩個衛兵前面經過時，羅爾林隊長回頭向我微笑。波士德斯飯店（Hotel de Postes）的守衛，只有一個中尉和一小隊士兵。這個軍官告訴我們，他接有命令，說是如果羣衆造反，應抵拒他們進飯店內。我提示說，這樣一小隊有秩序的士兵，無疑能把一反叛的羣衆抵拒住，可是決難和十個果斷的人們所作的突擊抗衡。中尉微笑，指着靜靜地出出進進於該建築的羣衆，笑說：「你所說那樣的十人，也許已一個個跑進去了，或在我們眼前正在這麼地幹的進程中：『我的工作足鎮壓一個暴動，不

是防止一個突襲。」

士兵星羅棋布地集於各部的門前，嚴密注視着來來去去的一般羣衆和店夥。議會給警察騎巡隊和騎兵包圍着：議員來而又去，低聲地在交頭接耳。在議會客廳裏，我們碰見了國會的司儀官特倫普進斯奇（Trompinski），他心不在焉地招呼我們。特氏被幾個波士那尼亞的（Posanian）機警而冷靜的議員包圍着。特氏是一個左派的波士那尼亞人，公開反對匹爾蘇茨奇的政策。他的推翻維妥斯政府的祕密策畧，那時很多人討論。

那天晚上在韓德俱樂部（Hunt Club），這位國會司儀官對英使館的奔廷（Havensdish Bentinck）說，『匹爾蘇茨奇並不知道怎樣保護波蘭，維妥斯却不知道怎樣保護共和。』特倫普進斯奇所謂『共和』，是指『國會』。像所有愚鈍的人一樣，特氏並不真正感覺安穩。

那整整一天，我們向此城的各個方向亂跑，跑到最遠的郊外去。在晚上十時，我

們在沙倭飯店(Savoy Hotel)前經過時，羅爾林聽見有人叫他。這是巴拉曹威茲將軍(General Bulach Balachowitch)，他站在飯店門口，招呼我們進去。他是匹爾蘇茨奇的『黨徒』，但這個黨徒字樣，應照俄國和波蘭的意義來解釋：俄國的巴拉曹威茲將軍，率領有名的黑色戈薩克軍隊，爲波蘭來和布德揚尼的赤色戈薩克兵而戰。

巴氏爲人，勇敢而果斷，精於盜術，習於游擊的別動隊戰爭的一切詭計，是匹氏的將牌。匹氏用他和庇特路拉(Иетман Петура)，來在白俄及烏克蘭境內，鼓勵反對布黨及登尼金的暴動。巴氏的大本營是在沙倭飯店，他有時在兩軍小戰之際匆匆到此，來守候政治的發展。波蘭政府中的一個危機，便足以嚴重地感動他，不論是順利或不順利。內國的事件，比較布德揚尼的戈薩克兵的行動，更足使他密切地集中注意。波蘭人不信任他，匹氏本人也只極端戒慎地用他，彷彿他是一個危險的同盟者。

巴氏馬上開始討論這時形勢。他並不隱藏其需要一個右派的革命的信念，他相信：「只有這樣才能使華沙不落於敵人手中，波蘭不被蹂躪。維妥斯是不適於應付這個

局面的，」他結束說，「他也不能保護匹氏的軍隊的後衛。假如沒人決定來奪取政權，把紊亂局面結束，來組織平民的反抗，把外來危險抵抗住而保護這共和國，一二天內，我們便要有一個共產黨的革命了。」羅爾林想，要防止共產黨起事是太晚了，右派的政黨中又沒有人適合於負擔這麼重大的責任的。

波蘭情況如此，巴氏和羅爾林不同，他並想不到革命的責任是這麼的很是嚴重，因為共和國的安全已在危險中了。至於這個冒險的困難問題，那又不論那個傻子都可奪取政權。「可是，」他加上說，「哈拉是在前方，沙皮愛哈沒有可靠的朋友，特維普進斯基沒有胆量。」於此我提示說：左派的政黨也缺乏適於應付這個形勢的人材，不然什麼使共產黨不試行革命呢？「你是對的，」巴氏說，「如果我和他們易地而處，我決不會等得這麼久。如果我不是一个俄人，一個外國人，和這個我所防護的國家的一個客卿，我現在已動手革命了。」羅爾林微笑說：「如果你是一個波蘭人，你會一點事也還沒有做。在波蘭國內，不是太晚的時候，總還是太早的。」

巴氏就是能在幾個鐘頭以內把維亞斯政府推翻的人。一千名他的戈薩克兵，便能夠把此城的重要中心攻下，并維持秩序一些時候。後此呢？巴氏是一個俄人，他的人又是戈薩克人。這樣的一個突擊，當時也許不會碰到什麼嚴重困難，可是後來便會有不可超越的困難發生。一度奪得政權，巴氏便要連忙把牠交給右派的人們，可是沒有一個波蘭的愛國者，會接受一個戈薩克兵的禮物。只有共產黨會利用這個形勢。『這層，事實上，將予右派以一個好的教訓，』巴氏結語說。

那天晚上在韓德俱樂部，在貴族和大地主當中，除掉沙皮愛哈及特綸普進斯奇以外，我們發見有的是最爲反對匹爾蘇茨奇及維亞斯的代表分子。僅有的外國外交家是德公使奧柏多爾夫，英將軍威亞脫，及法使實的祕書。個個人似乎都泰然自若，只有沙皮愛哈及奧柏多爾夫除外。沙皮愛哈詐作聽不見在他旁邊的提議，時或欠身對威亞脫將軍說幾句話，威氏正和波鐸克忌伯爵 (Count Potoucki) 討論軍事形勢。那天布黨軍隊已深進拉德德祭明扇形，離華沙大約二十基羅米突的一個村莊。

「我們更奮鬥到底，」波鐸克忌將軍說。

「你的意思是說，等到明天吧，」英國將軍微笑着說。

波鐸克忌伯爵，不過幾天以前才離開巴黎的，但是他已經打算儘可能的快回巴黎去，只要等到幸運之神又再向波蘭微笑時候。

「你們都像在拿破崙時代率領波蘭軍隊於意大利的你們的著名的頓布洛甫斯岐 (Dombrowski)，」威亞脫說，「頓氏常好說，『我得常常準備爲祖國而死，但不在祖國內過活。』」

這樣就是波蘭的人們；這樣就是他們的思想。你能夠聽見遠處的隆隆砲聲了。意公使那天早上在離開我們以前，曾告訴我們在韓德俱樂部等他。時候很不早了，我就要走了，譚梅信尼剛好進來。我們的關於維妥斯政府漫無準備的筆記，使他覺得異常嚴重，可是這並不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事。不過幾點鐘前，維妥斯曾對他承認，他再也不覺得他有控制這個局面的力量了。譚梅信尼又一樣相信，在匹氏和維氏的敵人當中

，沒有一個人是適於發動革命的。只有共產黨能造成一些不安。但是他們恐怕以某種不小心的行動，和這個形勢妥協下去，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如果不是無用，也許結果危險的事業，暫不動手去做。顯然，勝利是無疑的了，他們只在等候托羅茨基的到來。「就刺提大人，」意公使加上說，「也已決定不要放棄我們所已同意的見解。教皇嫩西峨和我，將居留華沙到底：不管會發生什麼事件。」

「多麼可惜，」幾分鐘以後羅爾林隊長含譏帶諷批評說，「多麼可惜呀，如果什麼事都不發生。」

當第二天晚上消息傳來，說是布黨軍隊已經佔領拉德祭明村，正在攻擊華沙橋的彼端時，外交團匆匆離開首都，躲到波森去。只有教皇嫩西峨，意公使，美國和丹麥的代辦，留於華沙。

那天整整一晚，全城都在恐慌中。第二天，是八月十五日，和聖瑪麗節日，全市民衆整隊在聖母像後巡行，求她保佑波蘭免於侵略。

一切似乎都不可挽救了。這龐大的行列、唱着應答祈禱歌，誠恐會瞧見一隊的赤色戈薩克兵在第二轉灣處出現。然後威根德將軍初次勝利的消息傳來了。這個消息傳布得和野火一般。托羅茨基的軍隊已節節敗退，不復能支了。

托羅茨基的必不可缺的同盟者，叛變的領導者，沒有做到響應他的工作。

(註)提秀斯：希臘神話，提秀斯為希臘傳說中最著名英雄之一，雅典王 Aeg-eus 之子。以卦 Crete 迷宮殺牛頭人身之怪物 the Minotaur，救雅典人之苦難為己任，並下決心，如不勝利，誓不生還。亞立德亞厄愛之，以一軸線為贈，提秀斯藉此線的助力，入迷宮後，能從原路出來。此處以提秀斯喻匹爾蘇茨奇。

變亂與革命技術

一〇二

第四章

卡普或戰神與馬克思

第四章 卡普或戰神與馬克思

『我們希冀波蘭發生一場革命，而波蘭革命不來，』托羅茨基在一九二〇年秋對澤金(Clara Zetkin)說。和藍波爾德爵士一樣，相信跟隨革命而起的所有境況中，混亂遠為最有用的人們，對於波蘭的叛徒們的行爲，有什麼辦法加以合理的解釋呢？

托羅茨基的軍隊到了華沙門口，維妥斯政府的極度軟弱，民衆的謀反精神，定然都是企圖革命的最順利的情況。巴拉曹威慈說過，『無論那個傻子都能奪取政權。』而且，在一九二〇年，不僅波蘭，就全歐都充滿這些傻子。情況如此，爲什麼華沙沒有一個人，就共產黨也沒有，作一次的革命企圖呢？對於波蘭的革新的可能性，完全沒有幻想的唯一的人，便是拉德克，列寧本人曾這麼對澤金說過。拉德克知道波蘭叛徒所缺乏的

是什麼，他相信一個波蘭革命須得以外力造成。對於旁的國家的叛徒，拉德克也沒有任何錯誤的希望。一九二〇年夏波蘭事變的故事所暴露的，不僅是波蘭叛徒，兼且是所有歐洲叛徒的能力不足。無論誰，能夠對於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的歐洲事變，作一不偏袒的觀察的，都不禁奇怪，歐洲怎樣設法度過這樣一個嚴重的革命危機。幾乎所有國家的自由派的中產階級，都是不能防護國家的。防護國家的方法，過去現在都在於警察制度的單簡的應用，此項制度，自古迄今，都還是專制和自由政府所依賴以生存的。可是假如布爾喬亞不能防護國家，這却給革命政黨的能力不足抵消了：革命政黨不能用近代攻擊的策畧來對付政府的舊式的防衛方法，不能用一個革命技術來擋開警察的手段。

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歐洲革命危機最是千鈞一髮的階段，左右兩派的叛徒，都不能夠運用布爾塞維克革命的經驗，這是件有意義的事。他們不知道托羅茨基曾樹了新的榜樣的革命之方法，策畧，和近代技術。他們的奪取政權的觀念是舊而不合用，因此

他們定然發見自己和敵人決鬥時，所用的手段和方法，所有政府無論如何軟弱和短視，都能用防護國家的傳統手段和方法，予以成功的抵抗。

歐洲是極適於革命了，可是革命的黨，顯然不能善於利用這些順利的情況或托羅茨基的經驗。他們相信，一九一七年十月布黨革命的成功，是由於當時的俄國特殊狀況，和克倫斯基的重大錯誤。可是那時幾乎個個歐洲的國家，都有一克倫斯基為政府的領袖：他們忘記了托羅茨基作成他的革命計畫，把牠實施時，他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俄國的特殊景況。托羅茨基革命策畧的新奇之點，就在於這個完全不顧國家一般的景況。克倫斯基的大錯只能影響在黨革命的計畫和施行；托羅茨基的策畧却是一樣的，縱使俄國情況不是那樣。

克倫斯基的錯誤，過去現在都是歐洲整個自由派的布爾喬亞的特徵。政府極度軟弱，他們的生存是一件關乎警察組織的事體。同時，自由派政府幸運的是，叛徒們也認到

革命是一個警察組織的問題。

卡普(Kapp)的暴動，對於所有以政治觀念，不以技術觀念來思考革命策畧的人們，都是一個教訓。

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晚上，盧脫威茲將軍(General von Luttwitz)所指揮的幾師波羅的(Balte)軍隊，已集中於柏林附近。他們送一個哀的美敦書給寶厄(Bauer)的政府說，除非政府辭職讓給卡普來幹，他們便要佔領首都。縱使卡普自以為其革命為議院性質，和本人是盧脫威茲的西耶士(Sievers)而自傲，然而其革命的企圖，在概念和實施上，自起事始，仍是一個純粹古典式的軍事革命。寶厄的政府，不睬其要求，却採取必需的警察手段，以防衛國家及維持秩序。和這樣的事例所常碰着的一樣，政府用一個警察計畫來抵抗一個軍事計畫。這兩個計畫是相類的，這就是軍事叛變完全不是革命的緣故。警察防衛國家，彷彿牠是一個城市；士兵攻擊國家，彷彿牠是一個要塞。

賓厄吩咐警察把廣場及大街用障礙物擋住，并把所有公家建築佔領。盧脫威慈爲實現他的革命起見，把他自己的軍隊，來代替警察，分佈於大街十字路口，一個廣場的入口，威廉街的聯那議會和各部前面。在他進城幾點鐘以後，他已是當時形勢的支配者了。首都不會流血已奪了過來，和衛兵換班一樣的有規律。可是如果盧脫威慈是一個武人，那麼，卡普，前農業部長，便是一個高等職員，和一個官僚。盧脫威慈以爲，僅以他的人來代替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便已奪取了國家，新總長卡普呢，却相信佔領各部便足担保國家機械的如常工作，并證實革命政府的合法。

賓厄是一個平平無奇的人，但賦有常識，很和聯邦中的將軍和主要官員相熟。他馬上看出，用武力反攻來對付盧脫威慈會多麼無用。柏林給波羅的軍隊佔領，是不能避免的事。用警察和這些堅強的士兵戰，決無僥倖。他們在制裁暴動和謀叛上是一個有用的武器，但和老兵作戰却是絕對無望。當第一隊銅盔隊，出現於塞着威廉街口的障礙物

前面時候，那兒的警察小隊便投降了叛軍。諾斯克本人，一個強有力的人，決意防守到底的，聽見第一次失敗時，便決定擁護寶厄及其他閣員。寶厄想得很對，他想革命政府在支配國家的機械是最無力的。如果這個機械能夠多少加以停止，或至少阻使不能前進，那麼卡普政府便要受致命傷。如果國家的脈搏只能加以阻礙，那麼整個公共生活便非變成癱瘓不可。

寶厄的態度，是受教於馬克斯之門的一個小布爾喬亞的態度。他是唯一的有胆量，敢於把公共生活作一完全而強烈的掀動，以防止卡普藉已成法律和秩序之助而固執其權力之人；這樣的一個人，只能成爲一個中產階級的布爾喬亞，一個守秩序的人，充滿社會主義者的觀念，慣於用一種適爲政府官吏的公正心和懷疑心，來判斷和他的心理，教育，或興趣完全不同或不相合的人和事的。

寶厄的政府，在離開柏林到德勒斯登(Dresden)暫避之先，已開始了對無產階級的

申訴，要求工人宣布一場總罷工。賓厄的決定，替卡普種下了危險。還對賓厄的政府保持忠實的軍隊的一個新的攻擊，比一場總罷工，於卡普方面，也許危險要小得多，因為那樣，盧脫威慈的軍隊便能易於得勝了。但是一大羣的工人，怎能夠說服他們使復工呢？定然不能使用暴力。在正午時分，卡普以為他對於柏林的局面完全有支配力量，但到了同日，三月十三日晚上，他却發見自己為一個預料不及的敵人包圍住了。柏林的生活，在片刻間已被攪到癱瘓不靈了。罷工遍布於全普魯士。黑暗統治着首都，中心區的街道上一個人影也沒有，雖則工人的郊外完全平靜無事。一種總癱瘓已打擊了像電燈一類的技術事業：甚至於看護婦也離了醫院。和普魯士及德國其他地方的交通，那天下午很早便停止了：柏林在幾個鐘頭以內便要受餓了。在羣衆中沒有暴力或反叛的表示，工人們都以最大的冷靜離了工廠。總混亂完全實現了。

在三月十三那晚，柏林似乎墮入一種沉重的睡眠中了，除掉在阿德隆飯店 (Adlon

Hotel) 內，那兒同盟的使節團駐着，個個人都澈夜無眠，在守候更嚴重的發展。在黎明時，都一平靜無事，雖則沒了麵包，水，和報紙。在人口最多的區域，市場是冷落的了：鐵路的罷工，已斷絕了都城的食物供給，總罷工已在所有政府和私家的雇員當中，像傳染病般流行。電話生電報生都不到局。銀行店鋪，和咖啡店，都關了門。政府機關的許多公務員，都不肯承認革命政府。寶厄已預料到罷工要傳染得多麼厲害。卡普叫他自己的工程師和技巧工人來試行修理技術機關的精巧的機器，可是已來不及了。國家本身的機械已經患了麻痺。

郊外的工人階級羣衆，再也不如第一天這麼安靜了：躁急，不安，和叛變的小徵象處處都開始可以瞧見。從南部諸邦傳來的消息，使卡普不得不選擇下面兩條路的一條來走：不是對包圍着柏林的德國屈服，便是對以不合法的政府爲其俘虜的柏林投降。他應把政權交回給寶厄，還是交回給已在郊外獲得了大多數的工人會議呢？革命所奪得的

只有聯邦議會和各部。卡普的地位，一個鐘頭嚴重似一個鐘頭：他的政府慢慢地被剝奪了一個政治行動的可能和機緣了。和左派政黨交涉，或和右派政黨妥協，似都已不成問題。一個暴烈的行動，可以引起預料不到的結果。當廬脫威慈的軍隊企圖強迫工人復工時，唯一的結果是無用的流血。最初的犧牲者的死屍，鋪道上隨處可以看見，這不過證明革命政府忘記奪取總電廠和火車站的致命錯誤罷了。

這些最初的點點的血，在國家的轉輪上生了不能抹去的鏽，到了第三天，紀律缺乏的事，顯然已侵入官僚政治中來了，這可以拘捕外交部的幾個高等官吏爲證。在三月十五日，國民大會開會於司徒嘉德（Stuttgart），寶厄對總統亞伯特（Ebert）說及柏林的流血事件時，說：「卡普干涉紊亂時，便患了錯誤。」

當時局面的支配者，是寶厄，尊敬秩序的溫和的寶厄，只有他知道卡普的革命企圖

，決然可用廣播的紊亂壓服。從沒有一個充滿可信的原則的保守黨員，也沒有尊重法律的自由黨人，甚至於沒有一個忠於議會以議會為政治鬥爭的一個道路的民主黨人，敢像他那樣做，鼓動無產階級大眾來作不合法的干涉，把防護國家的事信託於一場總罷工的。

馬基雅弗利的君王，如處於寶厄的地位，許會大胆地召喚人民來和一個突擊，或一個政府的謀叛鬥爭，馬基雅弗利的君王，定然是比維多利亞皇后時代的一個保皇黨員還要保守，縱使他的道德偏見或他的政治教育，國家不負責任。但是那時他是受教於亞細亞和希臘的苛政的普通歷史榜樣，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生活。

在另一方面，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歐洲政府的傳統，不許其政府求援於無產階級大眾的非法行動，無論要碰着什麼危險。後來德國的人民發生疑問，如果史脫列斯曼處於寶厄的地位，會怎麼樣幹。我們可以斷定，史脫列斯曼會想到寶厄的求援於無產階級，為一個最錯誤的行動。

我們必須記住，寶厄的教養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所以他對於反對革命的手段的選擇，自然並無憂懼。以一個總罷工為一合法的方法，以防護一個民主的國家使免於軍事的或共黨的駐所的突擊，這個觀念，是不能外於一個受教於馬克思的教訓的人的。然而，寶厄却是應用馬克思的基本原則之一以防護國家的第一人。他的榜樣是在近代革命史中最為重要的。

在非法政府的五天期間，德國人民對於寶厄的信心，開始動搖，變為不安和恐怖，卡普在三月十七日宣布放棄政權，因為「德國極端危急的情況，要求所有政黨和國民的聯合，來應付一個共產革命的危險。」社會黨已不能支配總罷工了，當時局面的真正的控制者是共產黨。赤色共和國，已在柏林的有些郊外宣布了。工人會議，德國徧地濤起。在薩克森(Saxony)和魯爾(Ruhr)，總罷工已引起了反叛，國防軍碰着了——一個完全好的共產軍，有大砲又有機關槍的。寶厄將幹什麼呢？卡普已被總罷工趕走了——寶厄要

消滅於內戰中嗎？

碰着制裁工人的叛變的需要時，寶厄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教育便暴露出弱點來了。馬克思說：『革命是一個藝術。』可是他的藝術是政權的奪取，不是政權的防守。馬克思的革命戰畧，目的在奪取國家：他的方法是階級戰爭。列寧爲繼續當權起見，須得把馬克思主義的某項基本原則推翻，像普諾威夫所觀察，他寫道：『自此以後，真正馬克思主義沒有列寧是不可能的了。』總罷工會是寶厄防護聯邦反卡普的武器：要是聯邦要免於一個無產階級革命，便必需請救於國防軍。脫威慈的軍隊，爲總罷工所窘，但是他們制裁共產革命，却能易如反掌做到。然而卡普，却恰在無產階級給他一個站在自己立場戰爭的時候，放棄了政權。在一個反動者像卡普方面，竟犯這麼一個大錯，是不可解的，沒有道理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像寶厄不能聽見，在那刻的國防軍，是唯一可以用以應付無產革命的武器，他的錯誤却是容易解釋的。當其時，在和共產黨叛變的領袖作了幾次無用的妥協企圖以後，寶厄把政權交給米勒(Müller)。這於一個具這麼無畏的真誠和溫和的觀念的人，是一個悲慘的結局。

歐洲的叛徒和自由派，都還可從列寧和寶厄得到很多的教訓。

第五章

拿破崙——或第一 個近代的革命

第五章 拿破崙——或第一個近代的革命

假如拿破崙，在二月十八日，發見一個像寶厄這樣的人，和他搗蛋，會發生什麼事體呢？拿破崙和德國聯邦誠實的總長之間，如有這樣的關係，會產生某種有趣的可能事件。寶厄並非希臘名傳記家波盧他的英雄之一，却是一個良善的中產階級的德人。他的情操性是完全被馬克思主義者的教育壓抑了的。這樣一個中和的人，是能有無窮的應變之才的。可是，一個這麼具有普通美德的人竟與一個平常而不幸的英雄像卡普者相遇，這倒是一個悲慘的命運！寶厄是拿破崙的敵手，是能在二月十八巧妙地對付阿科勒（Arcole）的勝利者的人。拿破崙要碰到他，才算最後棋逢敵手。

我們很可以說，寶厄是一個凡爾賽和威瑪爾的德人，兼是一個近代的歐洲人，拿破崙却是一個十八世紀的歐洲人，和一七八九年的一個二十歲的法人。誰能想像得出，寶厄會做什麼事以防止二月十八日的革命呢？拿破崙並非卡普，一七九九年的巴黎

情況，和一九二〇年柏林的情況也大不相同。寶厄不能用其總罷工的策畧來對付拿破崙，因為立意用以防止革命的一個罷工，其成功所必需的社會的和技術的組織，都是沒有。寶厄在二月十八或有的技術，和德總長及拿破崙之間的比較，這兩件事，研究起來，是比最初看來較為有趣的。

拿破崙是十八世紀的一個法人，然本質上却是現今的人，比卡普遠為近代化。他的心智和寶厄的是屬於同一範疇的，和守秩序的人像里哇拉及匹爾蘇萊奇（即任何近代的將軍）的觀念一樣，他們要從現在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防護國家的平常國家大員手裏，奪取政權。如果要使這個比較，免掉武斷的外形，便必須了解，奪取政權的近代和古典概念之差，第一次是見於拿破崙，二月十八是發生近代革命技術的問題的第一次革命。拿破崙的錯誤，固執，和猶豫，都是一個十八世紀脚色要解決關於近代國家的複雜性質的困難新問題——在這個特種方式第一次表現的問題——者的特徵。

拿破崙最嚴重的錯誤，是建立其二月十八日的計畫，於尊敬法律及議院行動的機

械上。這個『錯誤』，證明拿破崙，對於某種現代國家問題有一種銳利眼光，對於潛伏於公民和國家之間的許多巧妙關係，有一種聰明注意，不愧為本質上是一個近代的人，和一個現代的歐洲人。不管二月十八的革命，在計畫上實施上有缺點，他仍是一個議院的革命的典型。牠的顯著的特徵，在於事實上，沒有一個近代歐洲的議院革命，可以發生而不現其計畫上實施上的同樣缺點的。這層我們可以寶厄，里哇拉，及匹爾蘇茨奇為證。

拿破崙在倫巴底（Lombardy）的平原上，研究薩拉，卡替來那，愷撒的古典的榜樣，預備奪取政權。他們的榜樣是有名的，但於他沒有用處。卡替來那的陰謀，拿破崙對之不能有實際的興趣。卡替來那還不是一個英雄，是一個遠為太過小心而缺乏勇敢的謀叛政治家，然而西塞祿（Cicero）却是一個驚人的警察提督。卡替來那及其共同謀叛者，都被他小心地引入羅網，以強有力的諷刺，打擊他們，像一個近代新

聞紙的攻擊一般。西塞祿一定知道，怎樣從他所有反對者的錯誤、貴族和平民的所有繁文縟節，陷阱，軟弱，野心，和低等不能等等中，取得利益。在那個時代，拿破崙情願而且任意地流露出他輕視警察制度的態度。他想到卡替來那為光是一個設計者，很大意，固執，而猶豫，充滿好的決心和壞的意向；他想他為一個革命者，從不曉選擇時間，地方，和手段；他想他為不能在適當時候和人民相見的一個叛者，徘徊於障礙和叛變之間，失却其實貴時刻，於諦聽西塞祿的「*que usque tendent*」，或組織反國民同盟的選民運動上面。卡替來那有一個受謗很多的哈孟雷特（*Hamlet*）的樣子，似乎是一個完全受制於一個著名律師的詭計或警察圈套的一個傢伙。西塞祿却是無用的，同時是必需的。福耳特耳（*Voltaire*）批評耶穌會徒（*Jesuits*）說：「如果耶穌會徒要成為有用的，必須防止他們之成為必需的。」這樣的話可以移贈西氏。拿破崙雖然藐視警察方法，而且突然的警察暴動的觀念，於他看來，和猛烈的軍營革命，一樣極可厭惡，他對於西塞祿的聰明，倒也不禁心嚮往之。這樣的一個人，也

許將有一天證明其爲有用，誰能斷定呢？機緣之神、和神話中的哲那斯（Janus）一樣，是朝兩面望的：一條是西塞祿之路，又一條是卡替來那之路。

拿破崙像所有準備用暴烈手段奪取政權的人們一樣，不敢在法國全民眼中，表現其卡替來那的形態：卡氏是凡於他叛變的計畫有用的手段，都可拿來使用的：卡氏是一個秘密謀叛中的一個出人意料的成功者，野心的，大胆的，能作任何過分的事的；卡氏是一個罪犯，準備劫掠，殺人，放火，并決定不惜以任何代價繼要和他的敵人同歸於盡於其國家的廢墟之下也非勝利不可的。拿破崙知道，事實上，卡替來那的聲名，是民間傳說和誹謗所作成，他知道西塞祿的判斷，缺乏根據，西塞祿的學說，是說話組成的東西。他又知道，卡替來那所犯的案子，就法律上講，是一個罪惡，而這個「犯人」，或「犯罪的謀叛者」，不過是一個很平常的政治家，不精於政治的運動，而且這麼靠不住的固執，以致警察靠幾個偵探和被煽動工具的助力，便易於把他除去。拿破崙認到卡替來那的大錯，在於讓全世界知道他在極秘密之中準備一種革命以後，從

沒有去實行，以謀取勝。假如他只會試試他的運氣就好——機會一定不少：國內情況如此，如果有革命企圖發生，政府也許不能抵抗。這個共和國，以幾場演說，以警察手段，得免於這麼一個嚴重的恫嚇。這事的功勞，並非純是西塞祿的。但因卡替來那死於戰場，他的結局確是像他這個大貴族和勇敢戰士的。然而拿破崙的猜想並不因而減其正確性，什麼猜想呢，就是：假如結局卡氏不過要跑到山中，死一個於羅馬人值得的死，這麼多的喧囂是無需的，他也無需把自己牽累到這麼廣的程度，引起這麼多的不幸。拿破崙以為卡氏可有一個史好的死法。

拿破崙想到他自己的命運時，薩拉和愷撒的事業，遠為他的最大的思考題目。他們同具他的天才，他們同具他的時代的精神。威發拿破崙使準備及施行二月十八的革命的觀念，還沒有充分發展。奪取政權的藝術，於他看來，似乎是一個以軍事為主的藝術，在此中，是將戰爭的策略應用於政爭上，和把軍事的詭計變為民事的爭議。

薩拉和愷撒克服羅馬所用的戰畧，並非他們所共有的政治天才的，而是軍事天才

的一個證據。他們奪取羅馬所要克服的障礙，純粹是軍事的。他們所要攻打的，是軍隊，而非政治集團。在布林的西（Brindisi）上岸，和渡魯比侃河（Rubicon），並不是革命開始：這兩件事純是戰畧，沒有什麼政治的重要性。薩拉和愷撒，漢尼拔（Hannibal）和貝利撒（Belisair），大家都有同一的戰畧的目標：奪取一個城市。他們都像偉大的隊長，明瞭一切戰爭的藝術的。薩拉的軍事天才，像愷撒的一樣，遠比他的政治意識爲大。不問他們在布林的西上岸或過魯比侃河，他們的戰役自然並非完全爲一個戰畧的計畫所限，他們的軍隊的每一行動，都潛藏有一個政策。戰爭的藝術包括百種較小的政策和遠大的計畫。屠梭（Turenne），查理士第十二（Charles XII），福煦，確實個個軍事首領，都是他的國家的政策的工具，他的戰畧必須和國家的政治利益相一致。戰爭常由政治目的而生，戰爭不過是國家政治的一面。找遍歷史，沒有一個軍事領袖爲戰爭而實施戰爭藝術的事例，又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軍事領袖當中，也沒有研究家（amateurs），就在意大利雇傭軍官中也沒有。受雇於

佛羅倫斯共和國的英國雇傭軍官佐凡泥·阿魯陀 (Giovanni Acuto 原名約翰·霍克烏德 John Hawkwood)、曾說「一個人爲生而戰，非戰以就死，」這並非研究家的滑稽說話，也並非雇傭兵的格言。他的言辭包含戰爭的全副精神和理由。愷撒·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納爾遜、或拿破崙，都很可以選此爲格言。

當薩拉和愷撒出發去克服羅馬時候，他們自然抱着一個政治目的，可是我們必給愷撒以愷撒的東西，給薩拉以薩拉應得的物件。他們都不曾幹過革命。這兩個偉大的軍事領袖藉以奪取羅馬共和國的有名戰役，比任何平常的作亂的陰謀，還要遠離革命。薩拉沿布林的西面路進攻羅馬，或換句話說，從革命的企圖發軔於布林的西，以至於最後成功的，足足費了一年工夫。這個時間對於革命是太長了。凡人均知戰術有其常規，及其變則；薩拉只遵守了後者。至於政治的常規及變則，薩拉和愷撒都在進了羅馬以後，方才開始注意。就自此以後，他們也遵守變則多，常規少，因爲這是所有軍事領袖一在他們所奪得的城市內開始創製新法律和一個新秩序時所表現的慣性和特

徵。

拿破崙一七九七年——這一年對於一個果決的將軍，與其說是野心無寧說是大膽的將軍，是充滿許多希望的——在倫巴底平原上，一定已經開始覺得，愷撒和拉薩的榜樣，到底要不利於他。他看見奧士（Hoche）無意中獻身替指揮府製造政變的錯誤，和薩拉及愷撒的錯誤，比較起來，其嚴重程度小得多了。拿破崙在七月十四對意大利士兵的宣言上，警告克利犀俱樂部（Clichy Club）說：他已準備過阿爾卑斯山，向巴黎進軍，以保護法國的憲法，自由，政府，和共和國民。他的話似乎表示他自己的憂急之情，恐怕他會被奧士的躁急，而非他的和愷撒抗衡的祕密熱情，所著了先鞭。其第一要點，是要和指揮府保持友誼，不要太公然地和指揮府的敵人表同情。

早如一七九七年，拿氏已開始聽見，奪取政權的適當工具，必為軍隊。表面上，這個工具必須受法律支配，使用這個工具時必不好破壞合法性。我們覺得這種注意合法性，就是拿氏奪取政權的意見，大異於其古代的典型——那些光榮而危險的榜樣

——的處所。

在參加二月事變的許多角色中，拿破崙是一個神色最不自如的人。

自從埃及回來以後，他繼續出其風頭，輪番惹起讚美，嫉惡，譏笑，和猜疑。他已不必要地自貽伊戚。西耶士和塔力藍，都以他的錯誤而不安。他能夠追求什麼呢？他爲什麼不讓旁的人幹任何事呢？西耶士和琉細安凝神注意於整個計畫，這整個計畫是詳細細定下來的。西耶士，審慎而小心，認爲政權不能於僅只一天內奪取過來，拿破崙的躁急是一個大危險；其對於雄辯的嗜好，却是另一大危險，塔力藍說。爲什麼這樣子把愷撒和克倫威爾牽強加入來呢？只有拿破崙是處於那種情況中的。如果要尊重合法的外貌，如果政權的奪取，不用一種單純的軍營革命，或一種警察陰謀，却用與元老派和五百議員同謀的議院方法，並沿着困難而複雜的程序路線做去，那拿破崙也便不好堅持其某種態度。一個快要奪取國家政權的勝利將軍，不能求人讚美，或花費時間於詭計中。

西耶士已瞧見一切可能的困難，并預先採了對付的手段，甚至於爲了將來的勝利或失敗，而學了騎馬。當其時疏細安已當選爲五百人議會的主席，提出他自己的四個親信的名字，充任大會場的考察員。因在一個議院革命上，就這樣的侍從，也許是重要的。元老院議場的侍從，當其時，却已被西耶士攔住了。現在是需要一個口實，來召集兩院會議於巴黎外聖克勞宮——假說某種陰謀某種雅各賓詭計，或某種公共的危險。西耶士指使警察產生這麼的一個口實；結果是公式的宣布共和國陷於『可怖的雅各賓詭計』的危險中了。所以兩院大會得靜靜地開會於聖克勞宮，革命計畫將充分實現。

拿破崙和他的朋友抱同一見解。自是以後，他的舉止較爲深藏些，他的陰謀較爲小心地實施，他的自信心較爲受了約束，他漸漸得到結論說，他是這個活劇的從機器下來之神 (*Deus ex machina*)，因此相信，一切事都會恰如他所願望地發生。然而使他得從當時錯雜情況中渡過的，還是別人的力量：西耶士拉着他，引他前進。因爲到

底拿破崙還不過是一個軍人；他的政治天才只在二月十八以後方纔暴露。所有大領袖，如薩拉，愷撒，拿破崙也並不比他們渺小，當他們預備實行革命時，都不過是軍人而已。他們也許作絕大努力，來保存合法形式，幷表示對國家的忠誠崇敬；可是這不過是暴露他們的進行程序的不合法，及其對國家的輕視的一個標識。他們從馬背上跳下來參加政治鬥爭，但他們忘記把刺馬距卸下。當其時疏細安，以密切的注意，注視着他的兄弟的每一姿態，以至於他的思想最秘密的地方。他微笑了，帶着一些苦味地微笑，覺得他對於他的兄弟，比對於自己還拿得定。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還有什麼事能夠發生來改變事件的進程及敗壞革命呢？

拿破崙的計畫，有一個基本錯誤，便是尊重合法性。西耶士自始就反對革命計畫可在法律限制以內實施之意見。依他看來，對於不能預料的或有事件——這些事件當是最好表現革命暴力的機緣——必須設許多方法去提防。必需從一個狹窄的過道通過，常是危險的事。而且，對於這個法律哲學家，一個合法的革命，似乎是荒謬的。但

是拿破崙堅定不移。他寧冒險，而不願破壞合法形式。在二月十七之夜，西耶士已警告他，城外已有擾亂，他幸好是聽從勸言拘捕兩打議員；拿破崙不贊成這個不合法行動。他的計畫是作一種議會叛變用的。他將不破壞法律，不用暴力，而奪取政權，當佛社 (Fouche) 向他投効時，他笑說，他並不需要警察；他的威嚴，他的名字的光榮，便已夠了。所以他信仰極其簡單。

然而事實上，這躁急的將軍，這雄辯的戰士，並沒有想到怎樣在嚴密合法的範圍內去實行。他——在二月十八早上出席元老院會議，他便完全忘記他的任務，是在將勝利的劍為人民代表服務。他完全忘記，他必須對元老表現為一反雅各賓陰謀的憲法保護人，非為一個愷撒第二。他必須做成為一個將軍，不過受元老院委託担保大會和平地搬過聖克勞宮，他必須忍耐地在議會喜劇上——在此喜劇上做主角的倒要大會——做比較不重要的部分。但是當他站在他的衣服麗都的官員中；對旁觀的中產階級市民的大會演說，他似乎是受了某種不友愛的神的授意。

他不能說什麼話，只能摹仿英雄的情感，此情感是由於他匆忙研究亞力山大和噠撒的事業所得來：『我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建築於真自由，公民自由，人民代表上面的共和國——我誓言這種共和國，我們必將得到。』他週遭的官員，響應他這種誓言。元老們當時都在默默驚訝中凝望。沒有什麼可防止這個馴服的大會的任何人，不論是多麼無關重要的人，以自由，共和，憲法等名義，來攻擊拿氏的這些大話，這些大話，在那時是這麼的沒有意義，但仍然用於雄辯目的上却是這麼的危險。西耶士也瞧見了這個危險。在晚間，大會的侍從官，已把對於觀點可疑的議員的開會請柬毀滅。但是仍有不重要的人，為西耶士所注意不到，足使拿氏陷於危險之中。事實上，議員加拉脫(Carré)站起來說：『這些軍人，沒有一個』。他宣布說，『曾對憲法發過誓的。』拿氏受此責難，臉色轉白。但是主席及時插入，大會在『共和萬歲』的歡呼聲中暫停。

拿氏在推勒里園(Park of Tuileries)中檢閱他的軍隊的經程中，充分暴露了自

已。當他離開元老會議時，他已用一種高腔聲音對波托脫(Botto)坦白地說了，現在他對他軍隊的演說，却是輕蔑而恐嚇的。他覺得自己滿有把握。然而當佛社極力主張最有煽動性的議員必須拘捕起來時候，拿氏却不肯下令，並說事情既然這麼順利地進行，那是無需的了；再舉行幾個儀式，奪取政權的事，便可完成。相信這層的拿氏，在當時的危險急流中顯然智窮計盡了。在第二天，二月十九，西耶士在聖克勞宮，自己起始覺得一切已成的錯誤，並為將來生怖，可是拿氏還是表示這麼相信其威望，及其計畫的前途。和表示這輕輕視會議的律師們——這是他給議員們的稱呼——塔力藍不知道究竟叫他為頭腦簡單，抑是愚笨的好。

西耶士會運用合法方式及議會程序的規則，設想出整個計畫來；然而他還把某種實際的細目漏了，沒有算到。為什麼聖克勞大會的召集，要在二月十九，不在二月十八呢？為什麼要把這二十四小時的時間給反對派，讓他們去研究當時情況及組織反抗呢？就令聖克勞會議要遲至十九，為什麼兩院的召集又要遲至下午二時，不在中午呢

？議員們有此兩個鐘頭，他們可以交換印象，意見，和設計，及商同動作，來反對企圖的欺騙或暴力。五百議員決意作戰。他們聽見四周的許多士兵而越發生氣。他們在過道上天井上衝來衝去，彼此互問他們爲什麼同意離開巴黎，並查詢所謂雅各賓陰謀的人名及詳情。西耶士已忘記爲造這個陰謀的證據了。他瞧見有的議員在微笑，有的議員却以感情興奮而臉色蒼白。他瞧見這個局面離清明很遠，所有的人都可以僅只一句話或一個姿態，而轉變。如果他會聽信佛社的話——可是現在太晚了，他們必須信託機緣了，再沒有什麼可信賴的了。這些都是實施革命的新奇策略。

在兩點鐘時，元老院開會了。西耶士的計畫，起頭便受了阻礙。這些可敬的公民，都在狂亂中；幸而混亂得厲害，再沒有說話的餘地。在奧倫治里（Orangery），五百議員以暴風雨般的誓言，指摘，和恫嚇，來迎接他們的主席疏細安。西耶士想，一切都完了，他臉色慘白，打算出門逃避這種混亂去。他已安排了一輛馬車，在園邊等他，預備需要逃走時應用。乘馬車比騎馬來得舒服而安穩。謹慎的西耶士，在草擬其

拿破崙取政權的計畫時，大概是不會輕忽這樣的細目的。當那個時候，拿破崙和他的友人，在樓下的房子裏，躁急地等候着大會的選舉；覺到不安的，也不只西耶士一人。假如元老反對解散令，假如他們推舉三個臨時執政，決定改良憲法，這麼詳細給西耶士定下來的革命計畫，會成爲什麼呢？對於這種或有之事，西耶士什麼也不會打算，只打算坐馬車一走了之。

截至此刻，拿破崙所最關心的，是保守合法形式，及在議會進程範圍內行事，他的行動就像一個近代自由主義者。在這點，他是一個傳統的創始者。後來打算奪取政權的所有武人，都對這個原則保持忠實，直至最後非用暴力不可時候。武人的自由主義常是危險的，尤其是在今日。

他一瞧見西耶士的計畫，由於元老及五百議員的反對，而受阻，末由實現時候，拿氏便決定親自出馬來試驗國會。這個在某一方式內，還是一個自由派的進行方法，雖然有暴力壯其聲勢——像一個軍人所解釋的自由主義。元老一瞧見拿氏，便靜下

來了。可是慢撒和克倫威爾的信徒，是又一次給他的辯才誘陷了。他的宿辭，最初大家是以尊敬的沉靜諦聽，後來便時間以不贊成的低語聲。當他說，『如果我是一個叛徒，你們各人都可刺殺我』時候，大廳的隱處便有大笑聲了。演說者心亂，遲疑，口吃，然後再用高聲說，『記住我是有戰神，幸運之神擁護着的。』議員們起身，圍着講壇：他們都大笑着。『將軍，你不知道你講的是什麼了，』忠實的部耳麟尼(Bourjenni)低語說，同時捉住他的臂膀。拿氏讓自已給部氏帶出廳堂去。

幾刻以後，他跨過奧倫治里的門限，給四個特別軍和幾個官員護送着。五百議員以叫喊迎他：『匪徒，暴君，打倒他。』他們以侮辱及至於打擊來猛攻他。四個特別軍，密切地圍着他，以為保護，幾個官員却替他在這個騷亂中開路。終於成功把他帶出廳外的是加丹氏(Cardanne)。西耶士想，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是逃走：拿氏却對他的朋友們說，現在唯一的希望是訴之武力。在五百議員的廳中，把拿氏擯諸法律保護之案是提出付表決了。幾分鐘內，慢撒及克倫威爾的繼起者，便要被擯於法律保護

之外，便要失敗了。

拿氏上馬，去見他的軍隊。「準備殺敵，」他叫說。士兵只報以歡呼。這是那有名的兩天之最特殊的一幕。拿氏憤極，狂亂而顫，蒼茫四顧。阿科勒的英雄，並不會帶得一營隨他幹去。假如疏細安不在此刻趕到，一切都要失掉。使得軍士行動，而把這個局面挽救的，是疏細安，穆拉（Murat）却拔劍指揮特別軍去攻擊五百議員。

後來，蒙德隆想起愷撒和克倫威爾的繼起者在那刻的臉無人色，便斷言將軍已行動錯誤。蒙德隆（魯蒂爾Foetac）稱他為「一個騎馬的塔力藍」終身相信，愛讀波他的傳記的英雄，在聖克勞曾有一刻以畏怖而震顫，并相信任何小小的無名的公民，國會中議員之任一個，可以於自身毫無危險，在那有名的兩天，把拿破崙的命運破壞，和把法蘭西共和國救起。

第六章

里哇拉及匹爾蘇茨奇

：一個朝臣和一個社

會主義將軍

第六章 里哇拉及匹爾蘇茨奇：一個朝

臣和一個社會主義將軍

拿破崙解決奪取政權的問題，把軍隊使用得彷彿他是議院進程範圍內的一個合法武器。他所豎的這個榜樣，對於所有像卡普，里哇拉，和匹爾蘇茨基一類的人物，還有很大影響，他們都是假作把法律的尊重和暴力的使用相調和，和打算以武力來行議院革命的。「二月十八」的策畧，並非武力叛變的策畧。他們主要關懷的，是在法律內行事；這兒便是拿氏在革命技術上革新的地方。這個當代的問題，顯見於卡普，里哇拉，和匹爾蘇茨奇的行動上，這就是「二月十八」在現在也還重要的緣故。拿破崙的策畧：還是議會國家的一個急迫的危險。卡普的幻想是什麼？是在做盧脫威茲（Von

Luttwitz) 的西耶士，以幹革命。同樣，盧登多爾夫的策畧，當他在一九二三年和希脫拉及卡爾聯軍，進攻柏林時，是二月十八一類的策畧。他的目標是什麼！和卡普的一樣：聯邦議會，威瑪爾的憲法。里哇拉和匹爾蘇茨命也是這樣：目的都在攻擊議會。就列寧本人，在一九一七年夏，革命初期，也開始採用拿破崙的策畧。一九一七年七月革命策畧失敗的主要理由，是布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列寧本人，反對在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後舉行革命。他們唯一的目標，是一種議會性質的，就是，在蘇維埃中佔得大多數。列寧在七月革命後，息影芬蘭，直至十月革命前夜，還是只想取得十月開會的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大多數。一個平凡策畧家的他，在發出革命信號以前，追求議會的安穩。『像丹頓和克倫威爾一樣，』盧那車爾斯基說，『列寧是一個生成的機會主義者。』

拿氏的方法，是為應付一時的事變起見，不為儀式本身，而遵守一切儀式。拿氏

策畧的基本原則，是擇定議院爲合併使用暴力和尊重法律的最好所在。這便是二月十八的軀髓。卡普，里哇拉，匹爾蘇茨奇是，就希脫拉也有多少是，守法和守秩序的人，反動的人，他們奪取權力的目的，在增加他們的威嚴，權力，及權威；決定取宣言，其非爲國家的敵人而爲國家的僕人的手段，以明其叛變動機的合理。他們所最怕的，是被擯於法律保護之外。他們定他們的計畫時，他們決不能忘記，拿氏聽見被擯於法律保護之外時如何大驚失色之故事。議院是他們的策畧的標的；他們希望藉議院來推翻國家。只有立法權，對於妥協和陰謀的把戲是這麼有利的，能夠幫助他們，把一個已成事實包括在憲法以內。然後革命的專制可以移花接木到憲法的合法上去。

議會或接受已成事實，把革命變爲內閣的改組，而使已成事實成爲合法，或則叛徒們解散議會，給新議會以把革命行動作成合法化的工作。可是一個議會，把革命作成合法化，不過是自簽其死亡證書。在革命史上，這個定則並無例外，這就是：一個

議會，一把革命行動作成合法化，牠便是這個行動的第一個犧牲者。革命目的既在增加國家的威嚴，權力和威權，拿氏方法之完成此目的，不過是議會的改良，和議會特權的剝奪。因為拿氏式的革命，合法性的唯一担保，在於限制公共權和國會權的一種憲法改革。自由乃其第一敵人。

拿氏的策畧，必須不顧一切犧牲，繼續在法律範圍內行事。他們依靠暴力的使用，只為保持這個範圍內的地位，或在他們被迫後退時候為爭得原來地位。拿氏——二月十八的護憲的拿氏——知道五百議員已把他宣布為非法時候，他探什麼行動呢？他得最後採用暴力：他命令他的士兵退出「奧倫治里」；他驅逐，趕散國家的代表。可是幾個鐘頭以後，疏細安，五百議員的下院主席，連忙召集許多議員，再行開會，就以此議會，開始把革命作成合法化的工作。二月十八的策畧，只能運用於憲法範圍以內。議會的存在是拿氏策畧的一個必不可缺條件。一個專制君主，決不容忍比較一個

陰謀或軍事叛變爲嚴重的事件。

一個迪克推多的徒屬，常把他（迪克推多）變爲一個波盧他傳記中的一個英雄。這是所有迪克推多的命運。雖然這個是里哇拉和匹爾蘇茨奇的命運，但如果西班牙和波蘭的議會是英法的衆議會，他們無疑已碰到嚴重得多的困難。

但是他們的成功，決不由於事實上西班牙和波蘭的議會非英法的衆議會，以及一九二三年的西班牙，一九二六年的波蘭，並無強固而足以捍衛公共權利的國會的民治主義。近代國家當前最嚴重危險之一，是國會的易受損傷。所有國會，沒有例外，都多少是易受損傷的。國會的民治主義，錯誤在太過信任自由的勝利，在實際，却沒有什麼比近代的歐洲國家更爲脆弱的。如相信國會是對拿破崙式冒險最好的捍衛國家之具，自由能由自由本身和警察手段去保護，那便是危險的幻想。這倒是里哇拉和匹爾蘇茨奇革命前夜以前西班牙和波蘭議會所相信。

在波盧他的光榮傳記的英雄當中，一個紳士也找不出。也許這就是里哇拉，紳士兼將軍，不能登錄在歷史上作爲一個波盧他的英雄的緣故。

在這個迪克推多不幸的故事中，沒有什麼像他的忠心和真誠這麼悲慘的了。他不能被指摘爲以平凡智力爲他國家服務，他只能被指摘爲以他高尚的品格任由國王處置。迪克推多們應該提防立憲的國王，甚至像梅特涅 (Meternich) 那麼幹。國王的同謀，是西班牙迪克推多制中最有趣的——也許唯一有趣的——元素。如果不是阿爾芳梭第十三的串騙，里哇拉不能奪取政權，解散國會，壓抑公共權利，而仍在憲法制限內統治。這個政變的真正的機器中下來之神，這個迪克推多制的負責者，並非里哇拉，而是國王。有人說，里哇拉在做作二月十八的遊戲文章上，是個不自量力的拿破崙；但是里哇拉，在革命和在『以國王名義行之』的迪克推多制的全部絕望喜劇上，僅在一個好亂成性的國王的政治事業上，幹了一個『不自量力的莫索里尼』的任務。在

立憲君主制下，沒有容納迪克推多的餘地：只有朝臣，出自一種諛媚精神，可試行政變。國王和里哇拉的串騙，論其性質，為憲法與迪克推多制的一種妥協的，並不如為一個朝臣及其國王間的一個含糊的約定之多。里哇拉並非一個迪克推多；他不過是一個朝臣。這個計謀，所求得的，為憲法的保護，國會的權利，政治的自由，結果只有叛國。國王在一種只有他在憲法和人民前面負責的冒險中，把叛國加上同謀，這直是一個可憐的故事。

從西班牙得來的教訓，是不利於『以國王命令造成的』迪克推多制的。為證明阿爾芳梭第十三對其同謀者的態度的合義，和解釋共和國的產生起見，有人說，西班牙國王沒有給予其國家以一個『專制的民治』（Autocratic democracy），只給予了一個迪克推多制。我們要相信里哇拉並不忠心替其國王服務嗎？他的迪克推多制的目的，不是在攻擊國會權利、和憲法自由，和真在於創造一個『專制的民治』嗎？里

味拉爲皇室一忠僕，僅遵從國王意旨，是有事變經程爲證的。他不能以迪克推多制的這個必然結果受責難，可是一個立憲君主不應忘記這點。這個必然的事變順序，產生出西班牙共和國。

可和『二月十八』比較的所有革命中，一九二六年匹爾蘇茨奇的革命，或許是最有趣味的。在一九二〇年，魯意·喬治呼匹爾蘇茨奇爲一個社會主義的拿破崙（他從不喜歡社會主義的將軍）。匹爾蘇茨奇又表示，他知道利用馬克思來實施布爾喬亞的迪克推多制的方法。匹氏革命中的新元素，是勞動大眾的同謀。施行他的革命策畧的，並非工人，是會暴動過的軍隊。佔據橋梁，糧食軍需庫，十字路，火車站，電話電報局，和銀行的，也是這種軍隊。在攻擊華沙要塞——這些要塞是被忠于維妥斯政府的軍隊防守着的——和在圍攻柏爾味對勒（Belvedere）——這是共和國總統及其關員躲難的地方——這兩件事上，大眾都沒有參加。士兵再次在拿破崙策畧上，執行了其

古典的任務。這次革命中的新奇元素，是社會黨宣布一個總罷工，來幫助匹爾蘇茨奇，和右派聯盟作戰，這樣使維安斯失却靠山。這鬥爭上的原來的因子，使軍事叛變的暴烈行動，得一種新的社會意義的正常解釋。因為工人包括在內，匹氏的士兵，便似乎是防護人民的自由的。謝謝工人大眾參加革命策畧，一個總罷工迅速地將軍隊叛變變成爲一個受一部軍隊擁護的民衆革命。這樣，匹氏，在革命開始不過是一位叛將，乃變成爲一個人民領袖，一個無產階級的英雄，像魯意喬治說過：一個社會主義的拿破崙。

但是光是一個總罷工，不能把匹氏帶到法律範圍內來。他也是怕被宣布爲非法的。根本上，這個社會主義將軍，只是一個布爾喬亞的卡替來那，在他的時代和人民之公民的和歷史的傳統內，從事計畫和實施最大膽的計謀。他是一個叛徒，打算推翻國家，而不受非法宣告。這就是他嫉惡維安斯不給予他（匹氏）以防護國家權力之理由

。當對政府保持忠實的軍隊，抵抗攻擊時，匹氏，像一個真正立陶宛的波蘭人一樣，『野蠻而囂強』，是完全激惱了。他以機關槍回敬機關槍。使社會主義的將軍不得成爲政府的一個合法工具，不得利用後來的事變來補救起始所造的錯誤的；也就是這種立陶宛的波蘭人。一個議會的革命，並非由一個積極的軍事討伐開始的。像蒙德隆（Montron）說，『這事還沒完成。』

匹氏得社會黨爲一共謀者，并得總罷工爲其策畧的力量，但他還須贏得議會的司儀官爲一個同盟者。匹氏是就要藉憲法來推翻國家。當戰爭正在華沙郊外進行，海拉將軍準備好從波士尼亞來援救政府時候，圍困於柏爾味對勒的共和國總統倭脫西科斯巨（Wojciekowski）及議會主席維安斯，已決定依憲法的習慣，把權力放於議會司儀官手中。自是以後，憲法的擔保人，再也不是共和國總統，却是議會的司儀官了。這不過是議會革命的開端；自此以前，所謂革命，不過是一個軍事叛變；由一種總

罷工壯其聲勢。匹氏後來說過，如果倭脫西科斯巨和維妥斯，曾等候他們的忠實軍隊的到來，革命的攻擊也許不能成功。在總統和維妥斯方面的一種太過匆遽的決定，把叛變變成爲一個議會革命。現在讓匹氏在議會取得合法地位的，却是議會的司儀官。『我並不希望建設一種迪克推多制，』匹氏一踏實議會中的地位時，便宣言說：『我打算只依着憲法行動，打算增加國家的威嚴，權力，和威權。』像所有以武力奪取政權的反動結黨者一樣，他唯一的野心，是在僞飾爲國家的一個忠僕。

匹氏進華沙時也就像國家的一個忠僕一樣，坐的是四馬車，由笑臉迎人的騎兵護送。歡迎他的羣衆，排列於克拉戈斯巨•布魯色美斯西 (Krakowski Przedmieście) 的鋪道上，大叫『匹爾蘇茨奇萬歲！共和國萬歲！』議會的司儀官，將無難和他訂定關於憲法問題的協定。他想：『現在革命已過，我們將能彼此諒解了。』

但是議會革命只恰在開始。就在今日，憲法已漸成迪克推多制的一個工具，民治

和無產階級的波蘭，是一個志願擁護革命者，兼還是社會主義將軍的一個敵人；匹氏在這麼多陰謀，和這麼多失望以後，還沒有找得調和暴力和合法之方。

在一九二六年，匹氏的議會革命，是恰在開始；在今日，是一個尙未成功的革命

第七章 莫索里尼

第七章 莫索里尼

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法西斯蒂奪取政權之際，我偶然碰見了以色列·臧威爾（Israel Zangwill），他是一個著作家，不論在他生活上或藝術上，都從不能拋去其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成見的。

他到佛羅倫斯，在火車站的出口處，因不肯將護照出示，一二個黑衣黨便把他拘捕。他，一個暴力和不合法方法的死敵，是加入了英國民主支配聯合會（English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的。佔據着佛羅倫斯車站的武裝的人們，不是國家警察（Carabinieri），不是士兵，也不是警察，只是黑衣黨，這種人，依臧氏看來，是沒有權佔據車站，或要求查驗他的護照的。他被帶到阿諾（Arno）附近、匹阿紫·門他那（Pisa a Mentana）地方的法西斯蒂司令部。那兒，在從前被工程師協會——一個被法西斯蒂用暴力破壞了的社會黨組織——所佔據的建築內，這位英國著

作家被領到執政官譚布尼（Consul Tamburini）前面，譚氏當時爲佛羅倫斯的黑衣黨徒的最高指揮者。譚氏叫我進去當翻譯員。我一到場，聽見犯人臧威爾氏，我大爲詫異，臧氏榮膺民主支配聯合會會員之職，却給一個既非英國的，又非自由主義的，或民主主義的革命所侵害。

事實上他是憤怒的。他用最修飾的英語，表示出對於一般革命，尤其是法西斯主義革命的完全無禮的意見。因惱怒而臉色漲紅的他，野蠻地眼炯炯地望着不幸的譚布尼，譚氏是一點英語也不懂，就令這個生客用意大利話說出他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意見，他也不會懂得的。我盡力把於一法西斯蒂聽來不會悅耳的說話，繙成有禮的意大利語。我想我這麼幹是爲臧氏最好的利益起見，因爲那時譚氏的行爲，並非提奧克立塔（Theocritus）的一個田園詩內的腳色的行爲，也非費邊社一個社員的行爲。而且，他從沒有聽過臧氏的名字，不易使他相信站在他前面的，是一個有名的英國著作家。『英國話我一個字也不懂，』他說。『我很懷疑你會把他的話作精確的譯述與否』

。英語是一個反革命的語言。似乎就體的文法構造也是自由主義的。無論如何，你把這個紳士帶出去，使他把這不幸的小事忘記。」由此我便和威氏跑到他飯店裏，花了一些時候，和他討論莫索里尼，意國的政治形勢，和剛好已經開始的政權爭奪戰。

這是革命的第一天，事變所走的路線，似乎不是政府所預定的那個。威氏幾乎不相信我們已經在一個革命當中。「一七八九年在巴黎，」他反對說，「革命不僅發生於巴黎人心中，且見於巴黎街道上。」說老實話，那一刻的佛羅倫斯，外表看來，一點也不像一七八九年的巴黎。街上的人們，神色安然漠然；佛羅倫斯人若干世代以來，都慣於作有禮的含譏帶諷的微笑，現在也這樣微笑着在。我回憶起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就在托羅茨基動手革命的那天，沒人能夠瞧出什麼事正在發生的任何外表標識。戲園，影畫院，酒店，咖啡店，還照常開門。「因為，」我說，「革命技術在近代已大大進化了。」

『莫索里尼的這個革命，不是一個革命，』威氏反駁說，『是一個喜劇。』像許

多意大利的自由黨人和民主黨人一樣，臧氏以為意大利王和莫索里尼之間有一個諒解，革命不過是掩蔽意王計畫的一個轉移視線的東西，臧氏的意見是錯誤的，但是這個意見，像許多英人的意見一樣，是太嚴重了，不能輕輕地棄置不理。臧氏的出發點，是設想到，那時的事變，是一個政治策畧——在此策畧上，狡猾和計算遠比暴力和革命熱誠為重要的——的結果。由他看來，莫索里尼得力自馬基雅弗利，而非得力自卡替來那。這個觀念，當時歐洲很普遍，現在也還是這樣。自十九世紀初年以來，歐洲常慣判斷意大利的人物和事變，當作是一個很古的哲學和生活方式的產物。意大利的近代史，大部分是這樣子用意大利人對於修辭學，對於一個流利而文學的表現方式的天然癖性，解釋着。並非所有意大利人都有這個弱點，但許多意大利人確有這個弱點到不可救藥的田地。判斷民族的，常以其弱點而不以其優點為根據。可是就這樣，我也不能相信，外國人對於近代意大利的意見，有什麼合理之處，縱使修辭學的口才和文學過用到這般田地，使意大利歷史，有時似乎是個喜劇，其英雄為此喜劇的主角，

所有旁的人爲唱歌隊觀者。及

要了解現代的意大利，你必須用客觀眼光來看她，忘記那兒曾產生過古羅馬人及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人。『要是你那麼幹了，』我對臧威爾說，『你便會明白莫索里尼是沒有一點老式的。他常是一個現代的人，縱當他寧願做出有些不類現代的人時候。他的政治，和愷撒波耳查(Caesar Borghese)的，一點也沒有關係。他所從馬基雅弗利學來的，和格拉斯頓(Gladstone)或魯意佐治所學得的，無大差異。他的革命的見解，完全和薩拉或愷爾的不同。幾天以後，你將聽見許多人談及愷爾及魯比侃河。這將不過是純正的修辭學，莫索里尼無論如何決不會不草擬，或不實施一個革命計畫——完全近代化的革命計畫。對於這個計畫，政府除用警察手段以外，沒有旁的辦法抵抗。』

於此，臧威爾多少含譏帶諷地說，奧克森斯廷那伯爵(Count Oxenshierna)在他的著名的行述中，追溯『愷爾』(Caesar)的字源來自一個意指大象的迦太基字。『

我希望，』他說，『莫索里尼在他革命策畧的運用上，不會像一隻大象般這麼笨，會比愷撒更近代式。』

當其時，臧威爾極願看看附近地方我所稱爲法西斯蒂革命的機械的，究竟是什麼。他不能想像出一個沒有障礙物，巷戰，和屏陳鋪道的革命。『但是這兒樣樣事物都井然有序，』他抗辯說，『這是一個喜劇，什麼也不是，光是一個喜劇。』隨時，在佛羅倫斯市中，載着黑衣黨的汽車，作呼呼聲而過。這些少年法西斯蒂，戴着鋼盔，攜着來復槍，刺刀，和手榴彈。他們雄健地唱歌，揮着黑色旗幟，旗上用鋸線繡有死神的面。臧氏不肯相信，這些青年，差不多是童子的青年，是莫氏的有名的衝鋒隊，以其迅速暴烈的攻擊方法聞名遐邇的。『法西斯主義使用暴力，是不可恕的，』他說。

但是莫氏的革命軍，並非救世軍。黑衣黨的刺刀炸彈，非爲貫徹博愛的宗旨，却是爲肉戰用的。努力從法西斯主義中除去暴烈元素，和把黑衣黨當作虛梭和托爾斯泰

的門徒的人們，只是處於修辭學的口才和文學的一種煙霧中的人們。他們這些人，是寧願假裝莫索里尼爲一個古羅馬人，爲十五世紀的一個海盜，或文藝復興時代，具有柔軟白皙的手，精於毒物和柏拉圖主義的一個貴族。以盧梭或托爾斯泰的門徒進行革命，你至多只能把革命作成像喜劇的東西。以這樣的軍隊，就要從一個自由派政府奪取政權也不能夠。『好，你並非僞君子，』威威爾說，『可是請你示我以我可藉以確信這個革命不是一個喜劇的徵象，好不好？』

我提議就那天晚上，帶他去把我所稱爲法西斯蒂革命機械的東西，密切觀察一下。那晚，譚布令尼要帶他的軍隊到羅馬去。我和寧西峨令尼(Nencolini)被選爲代理他的佛羅倫斯省的黑衣黨領袖的職務的人。我到司令部去接受命令，那兒我見了巴爾波將軍(General Balbo)，他是革命軍事委員會四委員之一。巴爾波將軍並不怎麼滿意佛羅倫斯的情況。● 黑衣黨誠然已出其不意的奪取了城內省內的所有戰略地點，即，技術組織的緊要中心，——煤氣和電氣廠，總郵政局，電話電報局，橋梁，火車

站。政治的和軍事的長官，都完全不及防備的被捉獲了。警察在法西斯蒂佔領車站，郵局，電話電報局時畧施抵抗而失敗以後，已退到里加蒂宮(Palazzo Riccardi)、前維梭索大帝(Lorenzo the magnificent)的住所，現勅委市長的辦事處去。里加蒂宮，有數小隊的國家警察，及皇家衛隊把守，兩輛鐵甲車壯其聲勢。市長伯里戈李先生(Signor Pericci)本人，圍困在內，交通被斷，不能和羅馬政府及城內省內的長官互通聲氣。電話線已被割斷；機關槍在四周屋上架着，控制着此宮四周的通路。防軍，步兵，砲兵，騎兵，國家警察，及皇家衛隊，已被關禁於兵營內。暫時軍事長官守着善意的中立。可是這種中立，是不能太過依靠的，因為那種局面如果不能於二十四小時內弄個分曉，軍團指揮袞紮加親王(Prince Gonzaga)，必將設法盡其全力以恢復秩序。和軍隊衝突，將為革命運動的一個可怖的試驗。佛羅倫斯，連同比薩(Pisa)及波倫亞(Bologna)，為南北意大利的交通的要衝。要保障法西斯蒂軍隊由北方運至羅馬省的安全，最終要是在把意大利戰畧中心繼續支配，直至向首都駁

軍的法西斯蒂軍隊強迫了政府把政權交給莫索里尼時候。固守佛羅倫斯只有一法，就是假造消息以揆延時日。

暴烈和狡猾，並非互相排斥的。我奉巴爾波將軍的命令，帶一小隊法西斯蒂到多斯加納 (Tuscany) 最大的日報名叫內茲盎 (Nazione) 的報館去。我會了編輯人波勒利先生 (Borelli)，——彼現爲 *Corriere della Sera* 的編輯——要求他馬上印一個號外，內容說奇塔鼎尼將軍 (General Citadini)，意王的侍從武官，曾去米蘭 (Milan) 和莫索里尼商議，因此莫氏已同意組一新閣。這個消息是假的，可是有點像真。大家知道意王曾住在比薩附近的聖羅梭爾 (San Rossore)，却不知道那天晚上奇塔鼎尼將軍已護隨着他去了羅馬。兩個鐘頭以後，千百輛的法西斯蒂的汽車，把內茲盎的這個號外散發多斯加納全境。游行隊組成了：士兵和國家警察，與黑衣團親睦，歡欣慶祝對於莫氏和意王兩人的謹慎和愛國心這麼可貴的一個解決辦法。袁紫加親王親自到法西司蒂司令部，來得到關於這個好消息的證實說話，這個好消息使他

解除了精神痛苦和一種嚴重責任。他曾打一無線電報去羅馬，要求證實莫氏和國王的妥協消息，可是他又說軍政部不會作切實答覆。他們曾說，國王之名必不好包含到黨爭上去，是項消息也許尙言之太早。『我由經驗得知，』袁紫加親王微笑着加上說，『真實新聞在軍部裏也常稱爲言之太早的。』

是晚，馬爾波將軍已動身到革命的大本營佩魯查(Perugia)去。譚布令尼已帶着他的軍隊，趁火車到羅曼坎納(Roman Campagna)，去和黑衣軍的主力聯合。我在早晨二時離開法西斯蒂司令部，跑到臧威爾的飯店裏，他正在等我。我就要到邊境上去考察了。我要和他和我一道去，我可把法西斯蒂革命非喜劇的徵象指示給他看。臧威爾以一種滿意的微笑迎接我。他手裏拿着一張內茲盎報的號外。『你相信不，』他問，『意王和莫氏妥協了呢？你必承認一個立憲的革命，至多不外是一個戲場的做作。』我把這假消息的原由告訴他，他聽了以後，顯露極爲困惑的神情。『出版自由之謂何？』他問。顯然一個立憲的君主不能同意於革命者來蹂躪出版自由。這個喜劇

變成嚴重的了。然而出版自由從不會防止報紙之刊布假消息。對於我的說話，戚威爾只能說，在一個自由國家像英國裏頭，表現出版自由的並非假的消息。

城中靜無行人。街角法西斯蒂的邏卒，站在雨中不動，他們的黑帽傘戴在頭上。在佩科里路 (Via de' Pecori) 上，一輛汽車停在電話局的門首；這是許多裝有機關槍的裝甲汽車之一，法西斯蒂稱爲他們的坦克車的。電話局已被胸前佩有紅百合徽章的「紅百合」騎兵中隊的衝鋒隊所佔領。「紅百合」隊，和「敢死」隊，爲佛羅倫斯軍隊中最暴烈的隊伍。在坎坡馬爾脫 (Campo di Marte) 的火車站附近，我們碰見五輛裝甲汽車，車上載有來復槍及機關槍，這是聖佐聚峨 (San Giorgio) 的兵營中的法西斯蒂「細胞」移交給軍團的總司令的。因爲無論什麼地方，在工廠裏，軍隊裏，銀行裏，以及公共機關裏，都有法西斯蒂的細胞，這些細胞是革命組織的祕密中心。這些來復槍及機關槍，是預定拿來給一千名左右從羅馬納 (Romagna) 來，僅只帶有刺刀和手槍的黑衣團用的。他們是隨時都可從法英薩 (Fianza) 到步了。站上的

軍官告訴我，他相信在波倫亞和格里摩拿（Cremona），法西斯蒂曾和國家警察發生衝突，所受損失頗大；黑衣團進攻國家警察，國家警察以絕大力量自衛。在比薩，盧加（Lucca），里窩那（Livorno） 廬恩那（Siena） 阿勒嗶（Arezzo），和格羅塞托（Grosseto）等地，消息好些。這些地方的所有技術機關，都在法西斯蒂手中。

『死了多少人呢？』臧威爾問。他知道在多斯加納不會有一塊地方發生過流血的慘事，他不禁駭怪。『那麼，表面上，』他說，『你們的革命在波倫亞和格里摩拿，是比這裏更重得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黨革命的發生，幾乎不會有過什麼損失。僅有的死亡的紀錄，只發生於布黨奪取政權後幾日。反革命運動發生，托羅茨基的赤衛軍從事於打倒士官生的運動，抵抗克倫斯基的戈薩克兵，和對付兒拉斯諾夫將軍（General Krasnoff）時候。所以我說，『由波倫亞及格里摩拿的流血事件，可以證明法西斯蒂的革命機械尚有欠完滿之處。這種機械運行完滿的處所，像在多斯加納一般，不幸事件是很罕的。』臧威爾不禁諷刺地微笑。『你們的國王，』他說，『是一個

穩健的技師。要信賴他，你的機械才能美滿地運行啦。」

在此刻，一列火車在一球黑煙中，在大呼聲，歌聲，和鼓聲中，到來。「是從羅馬納來的法西斯蒂，」一個手持來復槍在車站上走來走去的車站雇員說。在幾分鐘內，我們是在一羣黑軍裏邊了，這羣黑軍是一隊精神飽滿，外表看來令人不安的傢伙，襯衣前面繡有死神的頭，鋼盔塗了紅色，刺刀插在大皮帶上。他們有太陽曬黑的臉和嚴峻的容貌，這是羅馬納農民所通有的，和些微的尖鬚。他們外表看來，冒險，兇狠，甚至威嚇的，臧威爾顯然感到不安。然而他快意地微笑，努力用文雅的姿态在這個噪聒的羣衆中前進，武裝青年看見他這種文雅姿態，却極爲駭異。「他們看來是很粗的一羣，」他對我申訴說。「你不能希冀一個革命的衝鋒隊會有什麼溫和，是不是？」我答。「莫索里尼過去四年的政治戰爭，不會用過溫柔或狡猾來作戰，但用暴力，最堅強的最殘忍的科學的暴力。」

以色列，臧威爾確是在經受一種非常冒險。被黑衣的亂黨的邏卒拘捕，然後得到釋放，現在他却坐着汽車，在夜深時分，來親自視察法西斯蒂的革命並非喜劇的徵象。『我必不好看來像空第德 (Candide) 在耶穌會徒 (Jesuits) 中一樣，』他微笑着說，他看來真的有些像空第德，在這些戰士當中，假如一個蒙着以色列名字的英國人，會像空第德，是可設想的事的話。這些高大的農民，具有無情的眼，結實的牙床，粗大的手，由頭至脚，目不轉睛，現輕視態度去打暈他，而且駭怪的頗為懊惱的發見，他們當中竟有一個紳士，御着白領，具羞澀斯文的舉止，看來就一個警官或國會中的一布爾喬亞議員也不像的。

我們再上汽車，當我們在空無行人的街上前衝時，我對臧威爾說，『你對於你所稱為喜劇的法西斯蒂革命的輕視，定然是和你們對於黑衣團的恨惡相矛盾，英國自由主義者是天天在那兒指斥黑衣團的使用暴力的。假如革命家是用暴力的人，革命怎能僅和做戲一樣呢？可是我告訴你，黑衣團不僅暴烈，而且殘忍。不錯，有時他們的新

聞紙，抗議他們的反對派說及他們的暴烈。但是這不過是安慰下中階級的虛偽行。爲究竟莫索里尼本人並非一個素食主義者，一個基督徒的科學家，或一個社會民主黨。他所受教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教育，是以他是完全沒有托爾斯泰的成分的：他從不會在牛津大學讀過書，不曉得政治上紳士態度的行爲，而凡對於羅曼斯或博愛主義的口味，都因他認識了尼采，排除淨盡。假如莫索里尼是一個眼睛溫和聲音低微的小紳士，他的黨徒一定離他而去，找旁的領袖去了。不觀乎一年以前，莫氏提議和社會黨議和時，法西斯蒂黨內確有叛變和爭議事件發生。黑衣團的大部堅持要繼續內戰。你必記得黑衣團大半來自極左黨。其中有許多是退伍軍人，經過四年大戰而心腸變硬了的。又許多是具有強烈感情的少年人。你決不要忘記武裝的人們的上帝，必然是一個暴烈的上帝。」

「我不會忘記，」臧威爾答說。

當我們於黎明時分，回到佛羅倫斯時候，以色列·臧威爾對於那時全意大利的事

變的梗概，都有了一回密切的視察了。我會帶着他迅速地馳過佛羅倫斯邊境，從延波利 (Empoli) 到馬折羅 (Mugello) 從匹斯托亞 (Pistoia) 到聖吉峨哇尼哇爾大諾 (San Giovanni Valdarno)。橋梁，車站，十字路，高架橋，運河水閘，穀倉，武器廠，煤氣電氣廠，所有這些戰畧的位置，都被法西斯蒂的隊伍佔領了。突然間，黑暗之處，邏卒會向我們問：『誰在那邊跑？』沿鐵路路線每隔二百碼之遙，都駐有法西斯蒂的守兵，在匹斯托亞，延波利，聖吉峨哇尼哇爾大諾等站，成羣結隊的全副武裝的鐵路工人，都準備着極端必要時把交通斷絕。事實上，種種保障交通，或斷絕交通的手段，都已採用。有一個危險是：國家警察和士兵的援救隊伍，會派到安布立亞 (Umbria) 及拉丁姆 (Latium)，去攻向羅馬進攻的法西斯蒂軍隊的後部。一個滿裝國家警察的火車，從波倫亞進發，被阻於匹斯托亞附近離著名的瓦峨尼 (Vaioni) 橋數百米突的地方。雙方會開槍互擊，火車終不得不後退，駕駛者不敢冒險過橋。在通唐加的塞刺哇勒 (Serravalle) 地方，也曾發生小戰。載着皇家衛隊的

裝甲車，曾被守着通匹斯托亞平原的路的機關槍手掃射。

『無疑你會讀過馬基雅弗利的卡斯特刺青 (Castigare) 傳上所敘塞刺哇勒的戰爭的故事，』我對我的同伴說。『我並沒有讀馬基雅弗利』，威威爾答。我們經過普拉陀 (Prato) 時，天已大光。普拉陀是佛羅倫斯鄰近的一小城，為織造業的一個重要中心。工廠有二百，工人有二萬五千。普城，人皆知為意大利的曼徹斯特 (Manchester)，佛蘭塞斯戈·馬爾戈·大定尼 (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 即出生於此，佛氏聽說是匯票的創造者。政治上，普拉陀却名譽不好，牠是以罷工及工潮出名的，牠是布勒西 (Brescia) 的出生地，布勒西在一九〇〇年弑意大利第二國王罕柏特 (Humbert)。普拉陀的人民是善良的，但性嗜殺。

一路都是去上工的工人。他們似乎對於事變漠不關心，靜默地跑過，對於晚上軍事革命委員會貼在牆上的布告，看也不看一下。『也許你願意知道丹農雪烏 (D'Annunzio) 受其古典教育於此處普拉陀的奇昆諾尼學院 (Vigginini College) 吧？』我

問。「在此刻，」臧威爾答，「我所欲知道的，乃是你們的工人對於革命怎麼幹法。你們的危險，不在於政府所能幹的事，倒在於一場罷工。」

在一九二二年末，法西斯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並非怎樣克服自由派政府或社會黨，社會黨日見成爲議會性質的，同時日見成爲意國立憲生活上的一個困難的元素。法西斯蒂的問題，是在怎樣去克服工會，工會乃是能夠防衛布爾喬亞政府以反抗共產黨和法西斯黨襲擊的僅有的革命力量。

德國一九二〇年三月寶厄利用工人組織以反對卡普的革命企圖，工人組織所幹的事，佐力蒂已經知道。佐氏已學了這種教訓，雖則戒慎地。意國政黨無力反對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以非政治方法作戰，這是對於共產黨赤衛軍暴力的適當的報復手段。各政黨的計畫是要把所有革命力量，不願服從「議院化」的進程，或所謂「同於合法」的，通通摒於法律保護之外。這並不是可以強迫法西斯蒂或共產黨放棄暴烈手段的方法。政府能夠怎樣設法來反對黑衣團或赤衛軍的革命活動呢？大眾的黨，社會黨

加和多力黨，牠們一降於立憲政黨的地位以後，牠們所能有的唯一的用處，只是擁護，和用一種方法來證明，政府所採取的任何壓迫手段爲合憲法。可是要減低意大利的混亂狀況，必非光是警察手段所能奏效，還須有旁的方法才行。

佐力蒂並不派遣軍隊去抵抗法西斯蒂和共產黨的革命勢力的進攻，倒小心地決定用有組織的勞工的動作去對抗，而和牠抵消。這是寶厄的方法，用來作爲一種防止革命的手段。但是寶厄用此法，是馬克主義者的用法，佐力蒂用此法，却是自由主義者的用法。是以工會變爲服務政府的一個工具，以不合法的方法，來反抗黑衣團和赤衛軍的不合法行動。在佐力蒂手中，罷工對於法西斯蒂和共產黨都成爲危險的武器，像向來對於政府一樣。罷工的流行病，一九二〇及一九二一年最爲盛行，對於布爾喬亞，甚至對於工人階級，都似乎是國家的一種痼疾，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前進信號，結果必然是大衆奪得政權的一個必需的危機。實際上，這不過是大局起深沉變化的一個徵候。這些罷工，並非像一九一九年一樣，反對政府的，却是反對革命勢力的，這種革

命勢力是擬不要工會的參與，或竟在他們積極反對形勢之下，來奪取政權的。工會和社會黨間長時間不睦的來源，便是工會獨立的問題。可是工人階級現在所要提防革命勢力的計畫的，却不僅是他們組織的獨立，兼且是他們組織的存在。工人們為保護本身階級的自由權，而反對法西斯蒂。工會對於共產黨的態度，恰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前夜俄國工會對布黨的一樣。

但是佐力蒂想要循自由派路線，來應用寶厄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方法，却只把大層形勢更弄糟糕些。佐力蒂的自由主義、僅是不審慎的樂觀主義。佐力蒂是憤世嫉俗的，懷疑的；他最好描繪為一個議會的迪克推多，太聰明而不肯相信任何觀念，太偏執而不肯尊敬任何人。不知如何，他在心中已成功把憤世嫉俗及懷疑，和樂觀主義調和了。是以他會造作某種局面，而表面上不會露出關心該項局面的心情，他會把無數的小陰謀和這些局面結合起來，同時表面上做出讓牠們自然成熟的样子。他對政府連最微的信仰也沒有；反之，他的政策的祕密，恰是他對於政府的輕視。他對於寶厄的馬克

思主義者方法的自由派解釋，在於以工會的革命力量來代替政府的壓迫力量。他把反抗法西斯蒂和共產黨來防衛布爾喬亞政府的工作，交給工會。由此他可以自由自在來做議會工作，這種議會工作却是使無產階級變為腐化的。

在一九二〇年滿終時候，意大利境內展開一種局面，這種局面，為近代歐洲政治上孤立的事例。丹農雪烏已奪取了阜姆(Fiume)，隨時都可率領軍隊進攻意大利，來奪取政權。就在有組織的工人中，他也有朋友。海員工會和阜姆政府之間，關係真切，是盡人皆知。工會運動的領袖，並不認丹農雪烏為一個敵人，却認為一個危險的傢伙，會把意國捲入國際糾紛的旋渦中心。然而無論如何，他並不會被認真地認為是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上可能的同盟者，儘管人皆知其嫉妬莫索里尼，及其革命組織在意大利國內政治所幹的工作。可是丹農雪烏和莫索里尼間的這種敵對，在佐力蒂方面却有很可利用之處。佐力蒂對於人家不好的事是常能適當地利用，對於好的事却未見能真誠幹去的。當其時共產黨却在法西斯蒂和政府夾攻之中，失掉了對於工人大眾的

一切勢力。因為他們的恐怖手段的犯罪不智，他們在政權的爭奪上，已成爲不過是一個次要的元素。他們完全誤解了意大利的革命問題，完全不能放棄單刀直入的攻擊和行刺和特發的反叛策畧，於兵營工廠之中，引起一串無益的郊外小戰。最多他們所能做到的，不過是在一個雖然失敗的鬥爭上作勇敢野蠻的領袖所能做到的事而已。在一九一九的赤色之年，任何小小的托羅茨基，任何小小的地方的卡替來那，只有一點精神：一小隊的人和幾顆子彈，便可奪取政權，而不用大做大作來推翻國王或政府或意大利歷史；機會給共黨失掉或完全處置失當的，屢次不一次。在莫斯科衛城內，意大利共產黨離奇的無力狀況，常爲笑談之資。聰明而愉快的列寧，聽見意大利的消息常要大聲狂笑：『意大利的共產黨，哈，哈，哈。』他對於丹農雪烏常由阜姆報告給他的消息，感到一種稚氣的快樂。

當其時，阜姆的問題，却日見成爲一個對外政策的問題。自丹農雪烏一九一九年九月創建一個阜姆國以來，該地的歷史的時鐘，在幾月時光內，已被撥後了許多世紀

。丹農雪烏的意見是，阜姆國應爲一強有力的革命組織的一個第一中心，從阜姆派應遣一枝革命軍去克服羅馬。到了一九二〇年末，阜姆國已成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個意大利的專制國，以內爭而分裂，被一個太過愛好言辭而依着馬基雅弗利的教訓做事的王的野心，奢侈，及修辭學所擾亂。阜姆國除掉其時代錯誤的毛病以外，還有一個缺陷，就是，如的存在與其說是內國政策的問題，毋寧說是對外政策的問題。阜姆國並非依革命方法奪得的，牠的創建也不會變更意大利內部的形勢。

阜姆國的創建的唯一影響，是反乎民族自決原則的對於阜姆的一個國際解決，被挫敗了。這是丹農雪烏偉大的成績，但是這也是他在意大利內部革命鬥爭上軟弱的原由。丹氏因創建阜姆國，已成爲意大利對外政策上一個基本的元素，可是因此他已從內國政治脫出，無論如何，不再成其爲內國政治上的一個直接勢力了。丹農雪烏指定其軍隊幹去的任務，自然降於黑衣團身上。當丹氏建國阜姆，做一獨立區的國王，自建其立憲政府，軍隊，財政，及大使時，莫索里尼擴張其革命組織，日見廣布於全意

大利。人們常說，丹農雪烏是『君王』，莫索里尼却是馬基雅弗利。可是於意大利的青年看來，丹氏不過是一個象徵，一種民族的朱匹亞（Jupiter），阜姆問題，光是莫索里尼可藉以攻擊政府的對外政策的一個口實。

莫索里尼因阜姆的地位如此，在革命鬥爭上消滅了一個危險的敵人，可以得到利益，同時也有理由，可以被擾不安。他和丹氏反對，對於他的徒屬影響很大。本來是從右黨跑過來的，都搗亂地依附丹氏。從左黨，共和黨，社會黨，及共產黨跑過來的，事實上是法西斯蒂衝鋒隊的優秀部分，却公然對十五世紀的復活者持敵視態度。

這種敵對在佐力蒂手中，是他努力藉以從中取利的工具，但得不到成功。他最初以為，他能夠激發丹氏和莫氏間的公開的鬥爭，可是不久他便看見在這樣的計畫上他是徒勞無功，但阜姆問題須得迅速解決，他便決定主意用武力奪取丹農雪烏的國家。在一九二〇年耶誕節前夜，他利用順利的境况，遣幾旅的軍隊去攻阜姆。

丹農雪烏的軍隊的悲痛抗議，引起全意大利的憤怒的共鳴。法西斯蒂還沒預大備

舉。鬥爭定是嚴厲的。在邊疆上和城市的郊外，黑旗紅旗，內戰的象徵，已迎風招展於那含着預兆的不安的冬天的寒風中。莫索里尼的工作，不僅是要替阜姆的戰死軍隊報仇。他還要保護自己不爲反動派所乘，反動派是要把法西斯主義撲滅於丹農雪鳥的國家的廢墟中的。政府和工人組織，已經從事戰鬥，一方有警察的迫害，另一方有挑戰行動：因工人現在已成爲侵略者了。佐力蒂打算乘阜姆的悲慘的耶誕節以後法西斯蒂黨內訌之機會，把莫索里尼指諸法律保護之外。工會領袖，以連續的罷工，開始作戰。整個城鎮，省區，以至於大區，會以某一小村的騷擾，而突然停止動作。槍聲一響，工人便行罷工。一得到工廠叱咤者的警號，人們便空工廠盪擲而出，屋門窗門，都關起來，交通停止，沒人來往的大路，就同準備動作的戰艦一樣凶獷惡毒着。工廠內的工人準備着鬥爭。處處都堆着武器，烟通背，織機中，發電機中，汽鍋中。在堆起的煤炭中，可以查出大堆的來復槍和藥彈。在停住的機器當中，在活塞，壓榨器，鐵砧，起重機當中，油污滿面的安靜地注意集中的人們在經過。他們爬登工

廠烟通的鐵級，爬登吊橋，爬登矗立的玻璃屋頂。他們的工作，是在把個個工廠都變成一個堡壘。高高在烟通上，插着紅旗。在廣場上工人羣聚着，組織連，組，和隊。當選的領袖，臂纏紅徽為記，發布命令，又遣邏卒去偵察地面。他們回來時，工人會離開工廠，藉着牆壁掩護，靜默地向着城市的戰畧地點走去。特別訓練來作巷戰用的隊伍，抽調到勞工交易所去保護工會的大本營，提防黑衣團的攻擊。機關槍架設於每個出口，於樓梯角，於走廊末，於屋頂上。手榴彈堆於事務所內近窗口地方。火車頭的可機把火車頭斷了去，遣火車於中途，開足馬力駛回車站。在鄉間，農民的貨車在路上堆起，來阻止黑衣團從此城運至彼城。赤衛軍的農民，埋伏於籬笆後面，帶的武器有游戲用的槍，有乾草叉，有鋤，有鏟，有鋤，有鏟，偵伺法西斯蒂裝甲車的經過。沿着鐵路，一村復一村，直至城市的近郊，槍聲時發，紅旗繽紛。工廠汽笛的叫聲一宣布罷工，國家警察，皇家衛隊，及警察，都退到他們營所裏去。佐力蒂是自由派色彩太濃了，對於工人們自動施行得這麼可讚美的反對國家的敵人的鬥爭，再也不能干預。

被罷工這樣危險地絕了緣，法西斯蒂的小隊，特別訓練來作共戰的，繫於十字路口；指定作攻擊及防禦屋宇的工作的小隊，却時時準備着來增援弱點，保護受威脅的地位，或向敵人組織的核心施行簡捷厲害的攻擊。衝鋒隊所包含的黑衣隊，是訓練過在羣衆中潛過，實行突擊的策畧，此項策畧有時且孤立地實行，其武器有刺刀，炸彈，及火把，時在指定連他們到戰場的裝甲車近旁準備動作。他們是特別指定來施行報復的。報復是黑衣團策畧的一個很重要部分。從一個邊遠之區或一個鄉村傳到一個法西斯蒂的死訊，衝鋒隊便出去報仇。勞工交易所，工人俱樂部，社會黨領袖的房屋，便被攻，被劫，被焚。在其初，報仇還是件新奇之事，赤衛軍都向他們的攻擊者開火，一場血戰會發生於勞工交易所及工人俱樂部的週遭，和該區該村的街道上。可是不久，這報仇的可怕武器便證明其成功。赤衛軍的戰鬥精神變弱了。他們失却自願的勇氣，工人組織的反抗力根本打碎了。一碰着黑衣隊，赤衛軍，社會黨領袖，工會書記，罷工煽動者，會逃到鄉間，躲到林木裏去。那兒他們還要被窮追，這個沒有號角，不

打招呼的窮追，常澈夜不息。有時一個法西斯蒂被殺所在地的一村，全村人口都逃走了。衝鋒隊到來，只見着空屋，沒人來往的大路，和一個黑衣隊員屍屍橫陳鋪道上。

然而工會領袖之反對法西斯蒂的迅速、暴烈，殘忍的策畧，所做工作，却不只像他們所說非武力抵抗而已。不錯，他們公式負責的，除罷工以外沒有什麼，他們仍苦心孤詣地用盡可能方法來鼓動工人的戰鬥精神。他們假作不知道在勞工交易所，及工人俱樂部裏頭，藏有槍械炸彈，可是他們決不欲罷工成爲一個和平的示威。罷工是要成爲一個戰爭行動，工人巷戰策畧的必需的背景。『罷工是我們的報復方法，』他們宣布說，『非武力抵抗是我們反對法西斯蒂的短棒短刀的東西。』但是他們很知道，工人是跑到勞工交易所去武裝自己去了。在罷工的熱烈，沉重的空氣中，工人被引到武裝鬥爭上了。社會黨所表現的態度，彷彿他們是法西斯蒂暴力下無罪的非武裝的犧牲者，被黑狼咬得流血的紅色羔羊，這種態度，和某種來自自由派的法西斯蒂的托爾斯泰的顧忌，一樣可笑，這種法西斯蒂是不敢承認莫索里尼的黨徒曾放過一槍，使用

過一棒、或強迫敵人喝過一點馮油的。

工會領袖儘管矯飾，黑衣隊方面也有死傷。若以為法西斯蒂沒有受到一重的挫折，這是完全錯誤的。有時郊外，鄉村，整個區域，武裝起來反對他們，信號是由總罷工發出。黑衣隊被攻於其家中，兵營被毀於街上，一隊隊的工人農民，肩看槍，持着手榴彈，却佔據鄉村，侵入城市，搜索法西斯蒂。工人們沒有他們的領袖這麼虛偽，可以沙撒那(Satan)的屠殺案為證。在此城內，時當一九二一年七月，五十個黑衣隊員被殺，僅只被傷的却喉管被割，躺於醫院前的昇床上。此外尚有一百名，向邊境逃命，却被女人用乾草叉和鋤刀，趕入森林。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的意大利的內戰史，法西斯蒂奪取政權的序幕，是由這麼殘忍的暴力的插話做成的。

法西斯蒂，為制止工農的革命罷工及變亂——這種罷工和變亂是越變越常，組織越廣，越為嚴重了——及猝把整個區域的活動停止起見，採用有系統地佔領被威脅區域的策略。日復一日，黑衣團會依着一個動員計畫在所指定的地點集中。萬千的武裝

的人，有時人數不下於一萬五千或二萬，會麇聚於一個城市、鄉、或村內，迅速地用汽車由一省區運到另一省區。在幾個鐘頭內，整個被佔區域，是在一種被圍狀態中。所有社會黨，共產黨機關，勞工交易所，工會，工人俱樂部，報館及合作社所存的一切，均有秩序地被解散，或打得粉碎。赤衛軍追不及逃的，均強使服藥，被棒打，趕得雞飛狗走。在二三天內，短棒會在若干百方哩內橫行。到了一九二一年末，這些策畧，愈益普遍地系統地採用，都得了成功：無產階級之政治的及工團主義的組織，已受一勢力全滅的打擊。

一個赤色革命的危險，現在已永遠免除了：公民莫索里尼已『功在國家』。是以現在，個個階級的可敬的公民以為，黑衣團會歸家睡覺了。可是不久他們便發見，法西斯主義已對政府施了一個勢力全滅的打擊，和對於工人階級一樣。

莫索里尼克服政權的策畧，只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想得出：決不要忘記莫索里尼所受的教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教育。在列寧和托羅茨基看來，意大利革命形勢的

可駭怪的事是，意大利共產黨，不能利用任何特別的同時發生的順利情況。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革命總罷工時候，意大利北部的工廠，頂厲害的是被工人佔據了，可是沒有一個人出來能夠率領一小隊黨徒去奪取政權的。以一個總罷工的擁護，任何小小的地方的托羅茨基，都能夠得到支配權，無庸要求國王的允准。

莫索里尼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眼光來判斷這個局面：他不能夠相信同時對政府權力和工人階級的力量反抗的革命可以成功。他既藐視社會黨及共產黨領袖，又看不起所有像丹農雪烏的人們打算推翻政府，却一點也不過問，究竟工人階級的組織的態度是否擁護或中立。莫索里尼確不致為一個總罷工所完全擊敗的。他也不像丹農雪烏一樣，把工人階級在一個革命所佔地位的重要性估價太低。他在感情上是遠為太近代化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者的近代政治的社會的問題的看法，吸收得遠為太過徹底了，再也不能被欺騙到抄襲一九二〇年布浪葵(Blanqui)的國家主義者學說上去。

法西斯蒂着手克復政權，並非使用反動的策略。莫索里尼是大異乎丹農雪烏，大

異乎卡普，里哇拉，或希脫拉的。他站在馬克思主義者觀點，總計無產階級的力量，和他們在一九二〇年革命形勢中的任務；由此觀點，他斷定，第一件事是把工會打破，工會是政府依賴以防護政權的。受了卡普和賓厄的歷史的教訓，他害怕總罷工。法西斯主義的官方的歷史家，主張他們的辯論說，從莫索里尼一九一九年的計畫看來，他並非反動派。確然，黑衣團真誠信仰的計畫，法西斯蒂的老戰士們現在還保持忠實的同樣的精神果實，是一個民主的民治的計畫。可是莫索里尼的馬克思主義者教育，並不表現於一九一九年的計畫，却見於法西斯主義藉以奪取政權的策畧上，和他藉以適用那些原則的一貫的方法上。本書以後并可敘明，怎樣馬克思主義者的策畧，一到一個反動派像希脫拉的手中，便變得不像樣子。

認真想到法西斯主義光是政府防止共產黨危險的一個障礙，純是對於無產階級政治的和社會的克服的一個反動的人們，都想，到了一九二一年中期，莫索里尼便已完或其事業，畢其任務。佐力蒂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權力在總罷工中

表現得這麼明白以後，馬上得到這同樣的結論，固然這結論的根據，和上者完全不同。內戰現在在高度暴烈中，兩方均損失極重，可是這些野蠻奮鬥的結局，亦色年分的所有駭人的奇遇的末尾，是無產階級勢力的敗北。佐力蒂曾利用工會爲反法西斯主義的工具，突然發見這種惘嚇是不濟事了，工人的組織已完全粉碎了。法西斯蒂從鬥爭的開場，便是取進攻態度，而宗旨鮮明。兼且他對政府作戰上，有驚人的準備。佐力蒂所有用以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是什麼呢？工會所組成的防禦，已經完了。組成一估議院大多數的政黨，是無力反對一個強固武裝的組織的，這個組織是準備從議院內和用實力來發出攻擊了。

佐力蒂還有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試把法西斯蒂議會化。這是一個自由派首相——他在過去三十年間，在意大利幹一個議會迪克推多的工作，服務於一個並不過於小心關懷憲法的君主——常用的計畫。莫案里尼，他的政綱是決不和他的革命策畧衝突，對於這些提議只極小心去應付。在一九三一年五月的選舉進行中，法西斯蒂同意

加入國民同盟，這個國民同盟是佐力蒂希望藉以把黑衣軍妥協并腐化之的。他擬用普選來解散黑衣軍運動。

他要造成國民同盟極爲困難。立憲的政黨強烈地反對參加，其根據和具一個明白的民主計畫的一個武裝組織的一樣。但佐力蒂所注意的，並非一九一九年帶着民主和民治的色彩的計畫，只是法西斯蒂的策畧的目的。因爲莫氏的目的是在奪取政權。顯然，法西斯蒂的計畫，爲達選舉目的，必須接受，要是使法西斯主義離開其革命目的的話。他這次不能有什麼成功，就和前此煽動丹農雪烏對莫氏的嫉妬，想藉以搗亂是項爭議一樣。法西斯不特遠不受議會化，且堅持着他的目標。當大約二十名法西斯蒂被選入國會內，積極破壞國民同盟的統一時候，黑衣團又轉向共和黨及加多力黨的聯盟，要以近來對付社會黨的工會得到這麼好的成功的暴力，打破他們。

爲準備奪取政權起見，一切旁的有組織的力量，不管是左派，右派，或中派，都得肅清。沒有一種力量可以任容留存下來擁護政府，或在革命的危急關頭，予法西斯

以嚴重打擊，而阻其前進。法西斯黨不置要預防總罷工，而且提防政府，議會，無產階級的聯合行動。法西斯黨只有努力肅清一切，消滅種種敵對的有組織勢力，不管是政治的，或工團主義者的，工人階級的，或中產階級的。工會，合作社，工人俱樂部，勞工交易所，報館，政黨——這一切都得掃光。反動的自由派的中產階級，大爲驚異。他們設想法西斯主義的工作已經完成，那知道，黑衣團解散了共和黨加多力黨的組織以後，現在又向自由黨，民主黨，共濟會，保守黨，及種種的中產階級的可尊敬黨派，進攻，工人農民皆引爲悅樂。

在法西斯黨方面，他們從事於打倒中產階級的工作，比較打倒無產階級時，遠爲熱誠。法西斯黨的衝鋒隊，大部是工人，小工匠，和農民組成的。而且反中產階級的鬥爭，是真正反對政府和國家本身的。自由黨，民主黨，保守黨，當他們把法西斯黨帶入國民同盟時，給予莫索里尼，像給予這麼多在他以前的人一樣，以『他的國家的救主』的非公式稱號。過去五十年間，意大利的『國家救主』，真多得很。這已降爲

一種官廳的職業——是一大危險，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太常得到穩當的救護的。而今這些同樣可尊敬的人民——是一點也不會認到，莫索里尼除却依傳統方式來救意大利以外，還有什麼旁的目的。他們不能理解——他是出來奪取國家，這一個野心，是比一九一九年計畫上任何事為真誠得多去孕育的。法西斯蒂的暴力，在牠用以對付工人階級的組織的期間，曾受人這麼熱烈的讚美，現在對於自由派的中產階級却似乎是令人痛苦地不合法而不悅意的。誰能相信，莫索里尼，呱呱叫的愛國家，與共產黨，社會黨，共和黨戰鬥過，會突然變為一個危險的傢伙，一點不帶布爾喬亞的顧忌，決定反國王和議會的意志，來奪取政權呢？

可是如果法西斯主義已成為國家的一個危險，那是佐力蒂的過失。這個運動早應及時制止，及宣布為非法。像對付丹農雪島一樣，以武力壓倒的。可是現在『國家主義者的布爾塞維克主義』，是遠比較國式布爾塞維克主義——中產階級現在才免了這個主義的恐怖——為危險的。目下的問題是，在波諾米(Bonomi)支配下的新政府，

不能補償佐力蒂政府的錯誤。波諾米原是一個社會黨；他所知道對付法西斯主義的唯一方法，是採用警察手段。在一九二一年將終時候，最厲害的鬥爭，起於波諾米與莫索里尼之間，波氏這個馬克思主義者是要用警察手段壓服法西斯主義，使不及準備以奪取政權，莫氏却要設法作持久戰；這是一個包含迫害，暴力，和流血的殘忍的奮鬥。波諾米終把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黑衣團。靠着政府的支持，工人做了許多重組其工人組織的工作。但是莫索里尼，有系統地發展了他的計畫。社會黨和法西斯蒂之間，欲停戰而不能。工人何以現不出力量，因被中產階級政黨的無脊骨的短視的行爲，以及對於黑衣團暴力，所用報復手段不過是未成熟詭計蒙上口頭的愛國主義的人們，完全自私，弄得腐化了去。

在一九二二年起始數月，下述渺茫的不幸事態流行着。法西斯蒂運用有秩序的暴力，漸漸支配住意國所有緊要的中心；法西斯主義的政治，軍事，及工團主義的組織，遍布於全意。莫索里尼手裏握着意大利的整個地圖，滿佈城，鎮，及其熱誠好鬥的

人口。這個地圖，宛如鯨於莫氏之右手的一般。波諾米已沉埋於政黨和工會的灰塵及廢墟中。國家的命脈都在黑衣團手裏，黑衣團包圍羅馬，佔領全國。國家的管轄權，完全支持於幾百個孤立的位置，其間知事，市長，及警官，正在革命勢力中施其日常的統治時，已就地被圍。國王和政府離開了，他們都怕負責。他們都依賴一種舊憲法爲迴避；國王依靠軍隊和元老院，政府依靠警察和衆議院。自由派的中產階級，以及工人，都深感不安。

在一九二二年八月，莫氏通告全國，法西斯主義準備奪取政權了。以一種最後的大力，政府打算先發制人，激起工人農民的反叛，藉以衝破法西斯蒂的包圍線。民黨，社會黨，共和黨，和工會大會聯合，共組一種公安委員會，以這個委員會的命令，在八月宣布一個總罷工。這個是叫做合法的或護憲的罷工；這是自由，民主，合法，及國家的保護者反黑衣軍的最後奮鬥。到底莫氏是要和他的最危險的敵人——法西斯蒂奪取政權的唯一嚴重的障礙——接戰了。他就要去和總罷工接戰，而克服牠了，

這個總罷工是三年來無時不爲法西斯革命的致命打擊的恫嚇的，這個反革命的總罷工，原是他三年來和工人階級的組織鬥爭，要使牠化爲無力的。政府，和自由派的反動的中產階級，慫恿工人的反革命，以爲藉此可以破壞黑衣團革命的熱誠，及至少暫時使國家免除一種總攻擊隨時可以到來的恫嚇，但是法西斯蒂從他們隊伍裏頭，派出專家和專門工人，來輪班服務，以替代公共事業中的罷工者的位置，同時黑衣團以一種可怖的暴力的表現，把站在工會議會紅旗下的防護國家的軍隊打破。法西斯主義所得克服政權的決然的勝利，非在十月，實在八月。在『護憲罷工』失敗以後，法格他(H. ota)，一個軟弱而可敬的政治家，繼續任職，便光是爲贊助國王起見了。

然而，當其時，國王再也不需要這種忠誠了。一九一九年的法西斯蒂計畫，還是尊敬法西斯蒂老衛士的，是民主性質的，但到了革命前夜，莫索里尼却標出『國王萬歲』的旗幟。

某些官方的編年史家，沈湎於修辭學和文學，曾把法西斯蒂革命作戲劇式的紀實

。這些記載都是假的。法西斯蒂革命史上，並無偉大的說話，或光明的姿勢，或手勢之類，足以使人憶起愷撒，克倫威爾，或拿破崙的。向羅馬進攻的大軍，並非愷撒的從高盧 (Gaul) 回來的百戰之士，莫索里尼穿的也不是羅馬的衣裳。報紙的插畫和官方的繪畫，都是著作歷史的不好的引導。看了大偉德 (David) 所繪的拿破崙畫像，便難於設想拿破崙是我們所知爲完全恰切的近代的天才家了。歷史上的拿破崙，異乎大偉德所畫像，和喀諾華 (Canova) 所彫刻，就和莫索里尼之異乎愷撒或科利媯尼 (Balto-lomeo Colleoni) 一樣。在某種着色版畫上，黑衣隊表現爲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在有很多莊嚴的拱門，攻壘，陵墓，柱楹，廊廡，及彫像的意大利上面，進軍而過，天上則飛鷹蔽空；彷彿法西斯蒂革命發生於奧維得 (Ovid) 及賀拉西 (Horace) 時代的意大利，以羅馬大軍爲其英雄，朱匹忒 (Jupiter) 本人却掌管全局以保存古典傳統的憲法外貌一般。在旁的繪畫上，莫索里尼，一九二二年的英雄，表現出來的眼睛，看來像是一八三〇年的英雄，一個浪漫派的人物，被發見爲浪跡於新古典派的鄰境，帶

領着軍隊，時而步行，時而騎馬，是個臉色蒼白帶着微笑的人，完全和記於有色畫版的歷史和諧一的。在羅馬坎納的嚴刻多災的山水的荒涼水道背景上，莫索里尼現身，這樣的人物，是像浦桑(Ponsan)的一幅畫中，哥德的一首哀歌中，彼埃脫羅戈洒(Pietroossa)的一篇戲劇中，卡杜契(Caducei)，或丹農雪烏的一首詩中的：他的禪袋似乎塞滿着尼采的大著。但是這些著色的畫版，是過去五十年意大利文化與文學的鑑別力欠佳的高峯。依這些革命畫看來，是難於相信莫索里尼能把法格他政府推翻而奪取政權的。

可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真正的莫氏，並不表現於畫版。真正的莫氏是一個近代的人，嚴冷，無畏，暴烈，而多謀。在革命前夜，所有法西斯主義的敵人，工人的工會，共黨，政黨——社會黨，共和黨，加多力黨，民主黨，和自由黨，都不活動了。總罷工被打倒於八月，革命再也不受這種工具的阻撓，因為工人再也不敢離開他們的工作，跑出街上來。對付『護憲罷工工人』的流血報復手段，終於打破了工人的戰鬥精

神。

當莫氏在米蘭揚起革命的黑旗時，法西斯蒂的專家及專門工人的輪替者，迅速地奪得國家的技術機關的戰畧地點。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全意大利都在二十萬黑衣團軍事佔領之下。警察，國家警察，以及皇家衛隊，都不能恢復秩序了。凡在警察擬把黑衣團趕開的處所，他們都被機關槍的掃射抵拒住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四委員，俾安岐(Bianchi)、巴爾波，提味趣(de Vecchi)，提波諾(d. Bonno)，掌管着革命的進行，依着莫氏所詳細定下的計畫。佩魯查，為革命的大本營，四委員即從此處發布命令。五萬人勝集於羅馬坎判納，準備進軍羅馬。黑衣團軍隊圍攻羅馬，高呼「國王萬歲」，羅馬不僅是政府所在地，兼是國王所在地。莫氏的忠於國王，當他率領他的革命軍進攻時候，是很近的事，可是從立憲國王的觀點看來，這種忠心，是比一個解除了武裝的政府的忠心為可貴。當內閣決定呈上一個建立全意的包圍狀態的命令，以供國王簽字時候，聽說國王曾拒絕簽字。確實情形如何，沒人知道，但一定的是，包圍

狀態是宣布了，但半日後又收回了。國王如已簽字，半日工夫確實太短，如真未簽字，則半日也嫌太長。

實際上，法西斯在進軍羅馬以前，在三年有系統的革命策略的全部進程中，早已奪取了政權。進軍羅馬的革命，不過推翻政府。在一九二二年，法西斯之奪取政權，不能以包圍狀態避免，也不能以宣布莫氏爲叛徒，或以任何種的武力抵抗阻止。佐力蒂說，「莫索里尼給我一個教訓：一個國家所須防範的，不是一個革命的計畫，是其策畧。」他微笑承認他並不能以這種教訓得到利益。

第八章 一個冒牌的迪克

推多——希脫拉

第八章 一個冒牌的迪克推多——希脫拉

不信希脫拉主義的危險的人們，譏刺地說，德意志非意大利。這不如說，希脫拉的策畧非莫索里尼的策畧，來得確切。近來我在德國直接考察所謂希脫拉的危險，常有幾次人家問我，希脫拉可不可認為德意志的莫索里尼。我記得西門先生 (Mr. Simon)，福琅克賀德報 Frankfurter Zeitung 的社長，把這個問題問我時，我曾答他說，意大利不會容忍一個希脫拉，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如此，就以後也如此。我的答語似乎曾使西門先生駭異。他讓談話斷了去。

實在希脫拉只是模倣莫索里尼而不像的可笑表現。他像意大利某種崇拜希臘波盧他 (Panharch) 的人們一樣，浸漬於雄辯術修辭學和文學之中，他像歐洲差不多所有國家中的國家主義者一樣，對於莫索里尼認識很淺，他認到莫氏只是憎撒一流的人，穿起大禮服，戴着高帽，飽喉過尼采和巴累斯 (Barres) 的著作，很知道福耳德 (Fou-

rd)的觀念，泰羅(Taylor)的學說，兼是一個屬於工業、政治、和道德的標準化的黨人。他這個自負而愚鈍的奧國人，具一雙無情而多疑的眼睛；以其殘忍的野心，及其乖戾的計畫，像所有奧國人一樣，許有某種弱點，合於做古羅馬的英雄和意大利文化復興運動；但他，可笑的相當聰明，知道威瑪爾(Weimar)的德國，決不能任由一個渺小的奧國上部的資本家，假裝為一個薩拉(Sulla)，一個愷撒，或一個中世紀雇傭軍官者支配。他的敵人有的暗示說，他好跑到幕尼克(Munich)博物院裏，把文化復興時代的雇傭軍官的半身像擁抱。雖則他也染有這種審美性——這是夢想做迪克推多的人們的特點——但那種說話總不能使人相信。讓我們來說公平話吧。他喜歡學莫索尼，可是他這種學法，是像一個北方人，一個德國人，相信自己能假裝為一個南方人，一個拉丁人的一樣。他相信莫索尼可移置於德國條件之下，成為新派的（這層縱使立意作為一種諷刺，也是辦不到）•他的理想的英雄，是穿上奧國阿爾卑山的太羅人(Tyrolese)衣裳的愷撒。奇怪的是，威瑪爾的德國的天氣，對於一種模倣莫索

尼而不像的可笑傢伙，意大利人也會覺得滑稽的，竟會這麼適宜。

威爾德脫 (Wilde) 畫莫索里尼的半身像，畫成一種羅馬皇帝，額部給教皇的聖潔髮帶束着，這個像，希脫拉完全不似；格累祭哦西 (Grassio) 塑莫索里尼的騎馬像，這像統治着波羅那 Bologna 競技場 (波羅那爲十五世紀一騎士，對於一種良馬也是太重的)，和希脫拉也無相類處；希脫拉是個柏藍哪 (Braunau) 地方的奧人，他的敵人有的畫他的像，這樣的像，他也不似。

『希脫拉，』赫斯氏 (Frederick Hirth) 寫道，赫氏是前德外長史脫列斯曼的一個很大的讚美者，所以對於這個國家社會主義黨領袖不是完全公平的，『希脫拉有尋常巴哇利亞人 (Bavarian) 或奧國上鄙人的體格。他是這部分世界的男人的典型。你只要跑到奧國的柏藍哪，或林斯 (Linz) 地方，或跑到巴哇利亞的帕梭 (Passau) 或蘭普胡特 (Landshut) 地方隨便那一間店鋪或咖啡館去，便見所有店夥和所有侍者都像希脫拉。』

他的敵人說，希氏雖不應誤認爲是柏藍哪或蘭咨胡特的店夥或侍者，然而他個人成功的秘訣——他這個具有智力平凡的德國資本家的一切體格上特質的人——仍不外是他的雄辯術，他的高貴，熱誠，而活潑的雄辯術。

說希氏能把一個鐵的紀律施於萬千的有理性的人們——他們都是從經過四年大戰鍛鍊的退伍軍人中徵募而來——光是由於雄辯術，這個批評是不當的。說他能游說若干百萬的選民來擁護一個關於政治，社會，經濟的計畫，這計畫本身就是他雄辯術的一部，這個責備也是欠公平的。究竟他個人成功的秘訣，是由於他的言辭或他的計畫，我們不管。對於叛變者，不應以他們的口才，或他們的計畫，只應以他們的革命策略來判斷。所以問題是，威瑪爾的德國是否真已受希脫拉的革命的恫嚇；和這個極有口才的叛變者，希望攫取聯邦政權，而對德人施其個人獨裁制，究竟他的革命策略是什麼。

國家社會主義黨的軍事組織，是仿照意大利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間革命以前的

法西斯革命組織的。希脫拉的神經中樞的豹狀組織，已遍播於全德各城鎮，大本營却在慕尼黑。國社黨的衝鋒隊，從退伍軍人中徵募得來，依軍事路線而組織，為該黨革命的骨幹。在一個知道怎樣運用他們的領袖手裏，他們很可以成為聯邦的嚴重威脅。他們的軍官是前帝國時代的軍官，武器有手槍，手榴彈，短棒（貯藏軍火，來復槍，機關槍，和戰壕臼砲等的軍需庫，在巴哇利亞，來因蘭Rhineland和東部邊省Eastern Frontier，遍地都散布著），他們組成一個全副武裝而全受過革命行動訓練的軍事單位。這個衝鋒隊，屈伏於一個鐵的紀律之下，給他們的領袖——他自誇為不會錯誤，在他黨內運用一種鐵面無情的獨裁權力——的暴君意志壓迫着，並不是德國叛民全體的軍隊，只是希脫拉個人野心的盲目工具了。

這些在歐戰時身經百戰的老兵，夢想進軍去克服聯邦，在鐵十字旗幟之下為祖國的自由而戰，現在倒覺得自己身分貶降，只被一個乖戾的說話流利的政客所利用，以遂其野心計畫和私人利益。他這人的唯一革命概念的形式只是和共黨赤衛軍作一個半

常的郊外小戰，和禮拜日穿着最好衣服的工人或挨餓失業工人，作無窮的不光榮的衝突，或取選舉方式把聯邦克服，同時在大城市郊外遙遠之地開幾槍示威，藉資擁護。

在哥尼斯堡(Koenigsburg)、司徒嘉德(Stutgart)、法蘭克福(Frankfort)、科樂(Cologne)、杜塞爾多夫(Dusseldorf)、厄森(Essen)、這些地方，希脫拉衝鋒隊軍官，都會對我自承說，他們覺得他們是降到一個革命領袖的家奴式衛隊的地位了，這個領袖，用警察方法，對他自己的黨徒施其詭計，將來建立他對德國人民的獨裁制，他也要用這個警察方法。在國社黨內部，自由意思，個人尊嚴，智力和教育，都被希氏以那種愚昧的獸性的嫉忌——第三等迪克推多的特徵——所迫害。希脫拉雖是奧人，究還不夠聰明，他不能了解耶穌所用的某種訓練公式，現在就在耶穌的信徒中也全然不能適用，要把牠們用於一個黨內，其工作步驟是為德國人民的國家自由而奮鬥的黨內，倒是危險的事。為自由名義而戰的戰爭，決非眼光不離地的軍人所能制勝。

希脫拉不僅用警察方法，習慣性的祕密恐嚇，和假仁假義，來貶抑其黨人的地位，兼且其革命策畧，也足使他們身分降低的。自史脫列斯曼死後，希脫拉的雄辯，愈成優伶式的，恐嚇性的，可是他的革命策畧，却慢慢進展為把奪取政權的問題提到國會裏去解決。這種進展的最初徵象，見於一九二三年。自一九二三年希脫拉，卡爾（Kahr），盧登多爾夫（Ludendorff）在慕尼克的政變失敗後，所有希脫拉的革命暴行，都取得了修辭學的方式：國社黨衝鋒隊漸變為「國王希脫拉」的保王青年隊（*Carls melots*註一），武裝而馴良的東西。他們的領袖逐漸減小暴力的使用。他怕聽槍砲之聲。但是希氏的黨真正危機的到來，還是在史脫列斯曼死後的事。只有這個偉大的反對者，能使希氏不得不公正行事，不敢用欺騙手段來幹革命。史氏是不怕希氏的；史氏是個愛和平的人，對於暴烈手段並不完全反對。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廿三日工業家會議席上，史氏演說，宣言迪克推多的手段如果環境需要，他會毫不猶豫地採用。在一九二二三年，希氏的衝鋒隊，還沒有成為國王希脫拉的保王青年隊，或伏侍一個善於辭令

的機會主義者的家奴式的集團，還是一枝相信自己是爲祖國自由而戰的革命軍隊。史氏一死，希氏便有了放棄暴烈策畧的機會，結果他的衝鋒隊在黨裏失却了大部勢力。

衝鋒隊是真正的敵人。希脫最害怕的，是他自己黨內的極端派。要使用暴力，他們才見力量。希氏的作戰的軍隊要是成爲太強了，他便倒霉了：那時很有發生一個革命的可能，但決不會擁希氏爲迪克推多。

國社黨革命所缺乏的並不是一枝軍隊，是一個領袖。衝鋒隊昨天還相信自己是爲古服聯邦而戰，現，却開始瞧見，和共黨工人械鬥和用槍互擊，並非奪取政權的方法。希脫拉說，近來在國社黨內的暴動，是由於幾個下屬的野心受挫；究其實，是起於軍隊對於希氏的無能深致不滿。他把奪取政權的問題推到積極的叛變範圍去的能力，一天似一天減少了。

希氏黨內的極端派，批判他爲一個假偽的叛徒，一個機會主義者，一個「守法律者」(Man of law)，自以爲能用言辭，軍隊游行示威，和對國會的恫嚇勒索，造成

革命，這個批判並沒有錯。自他光榮的政治勝利，大約一百個他的黨員當選為國會議員以來，他黨內便發展了一個反對派，這個反對派，拒絕希氏的機會主義者的策畧，日漸明顯的傾向於積極的叛變，以爲解決克服政權問題的手段。希氏并被指摘爲勇氣不夠，不敢正視革命策畧的結果，和害怕革命。衝鋒隊的一個隊長，在柏林告訴我，希氏是一個不能游泳的慳儉，站在一條太深而不能徒步涉過的魯比侃河(Rubin)岸上。他對他的黨人不好，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他恐怕他們要強迫他幹，恐怕極端派，衝鋒隊，性急者，要迫他走上叛變之路。他所時常掛心的，似乎只有兩件事，一件是保護自己以免於黨內左派的攻擊，一件是壓服他的衝鋒隊，使成爲實現他自己計畫的工具。像所有徬徨於妥協和積極叛變之間的叛徒一樣，希氏有時又不得不給極端派以一個慰安：像命一切國社黨議員退出國會，便是這個表現。可是他的讓步，決不會使他忘記他革命的機會主義的主要目的——政權的合法的攬得。無疑的，他捨棄暴力，放棄反叛活動，和避免對於政府的武力攻擊時候，他對於他黨人的革命精神，又常

常隔得更遠了；無疑的，國社黨在國會場中所得的次次勝利，都給希氏在革命場中失了去。同時希氏覺得更有把握的是，擁護他的選民的不斷增加，和取得下中階級的大半數對於他的政綱的皈依。用此法，他希望把一個叛變者應幹的危險性工作放棄，而實行一個煽動家的較安全的工作。

真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當前的危機，很可以叫做「社會民主化」(Social-democratisation)的進程。這個緩慢的進化，是向着合法，向着政治鬥爭的合法形式和方法跑的。國家社會主義黨，在變成一個可怖的有力的選民組織的過程中，是一個革命黨。國家社會主義黨，是一種國民同盟 National Bloc，認到過去用械鬥得來的成績，為幼稚無經驗的錯誤表現，其實這個成績可使黨蒙惡名，可是決不會得不到有利的結果。希氏的部下都是德國愛國主義的救世軍 (Salvation Army)，他們不能有一個比希氏更有價值的領袖。因為德人不能認真看重莫索里尼，德國的愛國者自會接受這個倣效莫氏而不像的可笑人物。德國愛國者不過是善良的德國公民的滑稽副本，這是盡

人皆知的了。

在希氏近來應允其黨內極端派的退讓條件當中，一個是，在慕尼克設立一間學校，以便給一隊隊以革命策畧的訓練。但是希氏的策畧是什麼？國社黨領袖，對於奪取政權的問題，並不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般考慮法。他顯然把工會防護國家的重要性，估價太低，他認為工會的任務，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也不是純粹的叛徒的，只是一個反動派的。他不攻擊無產階級的工會，倒去撲打工人。他追逐共產主義時，他只是追逐工人。莫索里尼的墨衣黨用以對付勞工組織的殘忍策畧，何以合義？因為該黨要把一切有組織的力量，不論性質是政治的，工會的，無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的，也不管形式是工會、合作社，報紙，工人俱樂部，勞工介紹所，或政黨，通通撲滅。同盟罷工總得設法防止，政府，國會，和無產階級的聯合戰線也得破壞。但希氏的黨人把工人當作工人而恨惡他們，這却是優氣的，犯罪的，絕對沒有道理的。一個企圖奪取民主政權的反動政權，決不能以迫害工人而跑得一尺遠的叛變之路。希氏為

使黨免於有組織的大眾的沉重壓迫起見，應對工會作有系統的澈底戰爭。德國政權的防衛責任，還沒有單獨落在國防部和警察身上，因聯邦政府的政策，是利用共產黨並衛軍的武裝隊伍和工會，來和希氏的衝鋒隊對抗。

德國政府所用以防禦希脫拉主義的危險的最好武器是罷工。一場總罷工，便足制希氏機會主義的死命。總罷工會使一城或一區的全部經濟生活陷於麻木不仁狀態，會給予擁護希氏的中產階級的利益以致命打擊。德國無產階級，曾罷過工，給予國社黨衝鋒隊以襲擊，使希氏不得不放棄其向工會進攻的法西斯派策略。現在他對於他的革命軍，一個奪取政權的光榮武器，只作為一種與共產黨郊外小戰的義勇警察隊使用。實際上，這種郊外小戰，又常常是把工人作為工人而施行的攻擊。這就是莫索里尼的革命方法在一個反動派手裏所存留的一切。

希氏對於什麼都不認真，只有給予他的機會主義以威脅的東西除外。在幾次企圖失敗後，他決意把莫索里尼對付工會的策略放棄，因為他害怕那樣子幹，會使他的衝

鋒隊在黨內的力量變弱，因而減低他們的革命任務的政治威嚴。他又很知道，那樣子幹，無產階級的反動，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宣布總罷工，總罷工却將予選民團利益以最有力的打擊。而且，資產階級的擁護，是他選舉戰畧上必不可缺的要素。他唯一目的，是在推翻聯邦議會以奪取政權。他不敢和無產階級的勞工組織的可怖力量接戰，勞工組織是有阻塞他的叛變之路的能力。他只要在選民團方面，和在合法的範圍，向聯邦政府和無產階級挑戰，而決一雌雄。個個禮拜日，在德國較大城市的郊外，希氏衝鋒隊（永遠是國社黨選民的千百萬大眾的囚徒）都跑去和共產主義赤衛隊的武裝隊伍相撲。這個無用的郊外別動隊戰爭，不僅於大工會和議會的社會民主黨有利，就於德政府，國社黨選民團，和右翼各黨，也有益處的。總要有人給共黨以教訓，使他謹慎些，謙讓些才好。

但是希氏能担保他的衝鋒隊，常常願把他們真正的革命任務放棄麼？他們的真正宗旨，原不是在工人的郊外和赤衛軍作戰，是在攫取國家政權。他們服從希氏的強暴乖戾的獨裁支配，目的並不僅在向共黨小隊進攻，以維護所有害怕布爾塞維克危險的

人們的利益，即是愛國的資產階級以至社會民主黨的利益。他們要進軍去攻克政府，議會，社會民主黨，工會，和一切阻塞叛變之路的障礙物。若是希氏本人決不……：

希氏儘管在選舉方面有銳不可當的成功，但距支配威瑪爾的德國的實際尚遙。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是未損絲毫，牠的工人大軍，國社黨革命的唯一強有力的敵人，比前勢力更見雄厚；牠屹然山立，無所減損，準備為防護德國人民的自由而戰，直至最後地步。只有機關槍還能打開希脫拉的進攻的缺口。等到明天，也許已經太遲。

有什麼可使希氏放棄其危險的機會主義的呢？他是在等候國會來把國家社會主義者的革命控制住嗎？他是怕被擯於法律保護之外的。希脫拉，莫索里尼的一個可憐的做效，揚言要做其祖國的解放者時，做出的樣子並不像一個薩拉，一個墨索利尼，一個克倫威爾(Cromwell)，一個拿破崙，或一個列寧，倒像一個法律的保護者，國家傳統的恢復者，和國家的僕人。誰都會常常提防一個迪克推多的愛國主義。這種市民的英雄的將來，決不能增加他革命的過去以榮光。像佐力蒂(Zolita)所說，「希脫拉這個

人具有一個偉大的將來在他後面的』，他已失掉這麼多的機會，如果他知道怎樣利用順利的環境，他該已把政府推翻了無數次了。儘管他的口才，他的選舉功，他的謀叛的軍隊；儘管他有他的名字不可否認的威嚴，和許多以他為一個煽動家，一個指揮羣衆者，一個強暴的無所顧忌的謀叛者，而編成的民間傳說；儘管他能把他周遭的人們的熱情激起，和把德國青年的想像和冒險精神作危險的掌管，希脫拉還不過是一個冒牌的領袖。我在莫斯科曾聽見一個希爾塞維克，他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托羅茨其革命策略之最活動的工具之一，給希脫拉下了這個奇特的裁判：『他有克倫斯基的一切好的和壞的性質，而且他也像克倫斯基一樣，只是一個婦人。』

希脫拉的智力實在是十分女性的：他的心，他的野心，甚至他的意志，都一點不帶男性。他是個軟弱的男子，以暴力為掩護，藉以隱藏他的能力缺乏，他的意外失敗，他的病態的自我主義，和他的笨拙的驕傲。一個幾乎為所有迪克推多同具的性質，這個性質也就是他們因事論人的樣子的特徵，便是他們的嫉妬心。迪克推多制不僅是

一個政府的體制，並且是在各方面，無論政治、道德、智力等方面的嫉妬心最完全的形式。像所有迪克推多一樣，希氏受他的感情的指導，比受他心意指導的多得多。他對他最老的黨員，和對衝鋒隊的態度——他們在革命開始就追隨他，和他共患難，共屈辱，和他一同擔當危險，共同入獄，他們原是他的光榮，他的力量——只能以嫉妬心解釋。這層只有不知道迪克推多的真性——他們暴烈而懦怯的心理——的人們，才會驚異。希氏嫉妬那些幫助他使他成爲德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人物之一的人們。他害怕他們的驕傲，他們的能力，和他們的戰鬥精神——他們無畏的，無所容心的熱誠，這個熱誠是使希氏的衝鋒隊成爲危險，有力的武器的。他用盡他所有的殘忍手段，來裁抑他們的驕傲，壓倒他們的自由意志，隱蔽他們個別的勞績，和使他的黨人變爲剝奪了一切尊嚴的穿制服的僕人。希氏像所有迪克推多一樣，只愛那些他能輕視的人們。他的野心，是要借德國自由，光榮，和勢力的名義，終能有一天把整個德國民族貶抑壓低，使成爲一個奴隸之國。

在希氏的機會主義者策畧上，在他對於革命暴力的厭惡上，在他對於各種形式的個人自由和尊嚴的憎恨上，有種混亂的模稜的，和變態性慾的東西。在一般國家史上，當大不幸的時刻——在戰爭、異族侵畧，或天災以後，常有一異能者出，來強行其意志、野心，和殘酷；他替所有失掉了的自由，權勢，和幸福，來向全國人民「施一種女人式的報仇」。在歐洲各國史上，現在却輪到德國的分了：希脫拉便是德國所應得的女人和迪克推多。希氏的女性的一面，便足解釋其所以成功，所以能支配羣衆，所以能鼓動德國青年熱誠的緣故。在普通德民看來，希氏是純潔的，苦行的，是行動的一個神祕解釋者，是一種聖人。人家並不以他爲一個叛變者而讚美他。「沒有一個女人的故事是和他的名字合在一起的，」替他作傳的人們說。這不如改口說，做迪克推多的人們，一般說來，是沒有一個男人的故事，和他們的名字並在一起的。

個個迪克推多的生活上，都有時刻會暴露他的力量之暗澹的，病態的，和性慾的深度；這些時刻，就是暴露他人格的整個女性部分的危機。在一個領袖和他的徒屬的

關係上，這些危機，極常取反叛的方式。迪克推多覺到那些他曾貶指氣使的人們要反來支配他的威脅時，他便用熱烈的力量來制裁他的黨徒的反叛以自衛；這就是他內在的女人的自衛。克倫威爾，列寧，和莫索里尼，都曾有過這樣的時刻。克倫威爾毫不遲疑地用火和劍，來壓服平等主義者（Levelers）的反叛，這些平等主義者在英國擁護一種十七世紀的共產主義。列寧對於喀琅斯塔得（Kronstadt）的暴動水手，毫無憐憫。莫索里尼，厲對付佛羅倫斯的黑衣黨，他們的叛變延長了一年，直至革命前夜。希氏還沒有碰到他的衝鋒隊中的廣播的叛亂，這是可驚異的事。希氏的戰鬥的騎兵中隊行伍中的局部暴動，已遍布德國，這些或不過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衝突的最初徵象。革命進程的機會主義，是自取其罰的一種罪惡。做一個革命軍的領袖而不敢負革命責任的迪克推多，必然不幸。藉詭計和妥協之賜，他也許能夠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但由妥協得來的迪克推多制，只是半迪克推多制決不能長久。只有革命暴力能使迪克推多制合法化；革命就是此制的最牢固的基礎。希氏的計畫，或者是藉國會而妥協來達

柄政目的。如果他要消滅他的軍隊的叛變於無形，他所能做到的是，把他們的注意力從奪取政權那兒移開，不再把他們的革命熱情釘在國內政治上，倒固着於對外事件上。德國東部邊陲的問題，不會有一個時期是希氏雄辯術的主要論題嗎？德國的將來，或許依靠國會的妥協，而不依靠革命，這是件有意義的事。一個不敢以革命行動攫取政權的迪克推多，決不能威脅西歐，西歐是準備不惜以任何犧牲保護其自由的。

(註一)法國的『保王青年隊』(Camelots du Roi)是法國『行動報』所領導的運動之下的有組織的青年。

變亂與革命技術

尾聲

德國現在的事態，由知道德國人民對於公民尊嚴常是多麼看重的人們看來，一定似乎離奇。誰也許要認到威瑪爾的德國是難於救藥了，她的統治階級，布爾喬亞，和知識階級，是完全腐化了，墮落了，如果誰以爲他們是願意不奮鬥而接受希脫拉本人都不敢強制施行的迪克推多制的話。迪克推多制並不是由人接受的，是要由人負擔的。縱用一個革命來強制執行，也只是在拚命抵抗以後，才能使人屈服。說俄國資產階級並不抵抗布爾塞維克，這是荒謬的話。

講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事，我始終反對人們說克倫斯基無能力保護國家，以抵抗赤衛軍的反叛。像所有自由和民主的政府情形一樣，警察方法是克倫斯基政府所有唯一防護國家的武器。但是這個防護國家的自由派技術，過去現在對於共黨革命的技術，都是無力抵擋。牠對於法西斯黨的革命技術也是無力抵擋。而且如果說意大利的自

由派政府，工會，和立憲政黨並不企圖自衛，以抵抗莫氏的革命策畧，也是笑話。意大利國內爭奪政權之戰曾鬧了四年，所流的血也比德國所流的多得多。不問是列寧，是莫索里尼，都不能不經苦戰，而施行其迪克推多制。有什麼力量，什麼壓迫，可使德國的統治階級，布爾喬亞，和知識階級，來接受一種迪克推多制，一種不用革命行動強迫他們服從的迪克推多制？不論他們對於凡爾賽和約的反抗精神或他們擬定戰後政治經濟的再生中起來的願望，都不能充分證明他們對於一個希脫拉的迪克推多制有傾向可能的態度為合理。在戰敗的所有災難中，在凡爾賽和約的所有結果中，其能降於德國人民的最大災禍莫過於公民自由權的失去。接受希脫拉的迪克推多制而不抵抗的一個德國，被這應一個二等的莫索里尼奴隸的一個德國，決不能在西歐自由國家當中心保全其所有權利。這確是德國布爾喬亞所能忍受的最低點，非萬不得已，決不至此。

德民對於國家問題的一般態度，決不能像有的人那樣，歸其咎於近代歐洲自由思想的衰落。德國布爾喬亞的道德的和智力的狀況，並不和別處一樣。如果要相信歐洲

布爾喬亞再也不能保護其自由權，和歐洲的將來只有公民做奴隸之一途，便必須先承認一種很嚴重的衰落。可是假如德國布爾喬亞的道德和智力狀況真是不和旁的國家的一樣，假如全歐人民對於自由的虔敬真有程度的差異，德國當前的政府問題也一樣是歐洲其他國家的政府問題。政府的問題，不僅是權威的問題，也是自由的問題。如果警察力量確實不足保護政府，以抵抗共產黨或法西斯黨的攻擊可能時，政府能夠或應當採用什麼手段而不危害人民的自由呢？我們是要在這些關係上，來把幾乎個個國家的政府自衛問題考慮。

現在的情況，不論右翼或左翼的黨魁的野心，都有很大成功的機會。各國政府所建議或採用以打破任何可能的革命企圖的方法，這麼的不充分；革命的危險，許多歐洲的國家都應加以最認真的考查。現代國家的特性，及其複雜精縝的機能，和所要牠解決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的嚴重，使國家成爲人民希望和恐懼的風雨表的指標，這更增加國家自衛途中的障礙。現代國家易受革命的危險，其程度實較一般所認識

者爲甚。說什麼就令保護國家的寬大方法是不復適用，叛變者方面也常常表示其對於近代革命技術真正要件的無知，這樣反對的話也是徒然。縱使現在的叛變者真是有許多不知道怎樣利用順利的環境以奪取政權，革命的危險也確實依然存在。

在秩序基於自由的國家，輿論應不忘記一個革命的可能。現在情況的歐洲，處處都有這個可能，不管牠是個自由的組織優良的國家——或十八世紀時所謂「有警衛的」國家，「有警衛的」的字樣現在也還適用——或是個擾攘不寧的國家。

一九二〇年我在華沙時，外交團差不多天天都在羅馬教皇嫩西峨（Papa Nuncio）的公館開會，來評論波蘭的形勢，波蘭那時是被托羅茨基的紅軍所蹂躪，國內的派別所分割。這樣的會我參加過一次。當時在英國公使藍波爾德爵士，和那時做駐華沙的教皇嫩西峨，現爲教皇庇護第十一的刺提大人之間，對於革命性質和危險，有一場很起勁而最不含宗教意味的討論。

真是三生有幸，我聽見了未來的教皇，在世界諸先進國的外交代表之前，擁護托

羅萊基的近代革命學說，來反對一個英公使的理論。藍波爾德爵士宣言，波蘭是在一種極混亂的狀況中，革命必然要隨時爆發，絕無避免可能，所以外交團應趕快離開華沙。刺提大人回答說，波蘭誠然遍地大亂，可是依他看來，這不一定會引起革命，所以他想，退出波京將是一個錯誤，尤其是因為革命的危險，不見得波蘭比歐洲其他任何國家為迫切。他結語說，他個人就是決不離開華沙的。英國公使答說，在一個政府強固的文明國家裏頭，革命危險決不存在；革命只從混亂中產生。刺提大人無意中維護了托羅萊基的學說，堅持說，革命可發生於一個有強固組織和警衛的文明國家，像英國，恰和可發生於一個被無政府主義者所蹂躪，被互相反對的政黨所搖撼，被一個敵軍所侵畧的國家，像當時的波蘭一樣。『哦，決不！』藍波爾德叫說。他似乎被這個毀謗之辭，說革命可發生於英國，激惱了，傷了感情，就和英國王后維多利亞聽見墨爾本公爵（Lord Melbourne）最初報告給她，說內閣有政變可能時，一樣的惱怒不悅。

本書目的，並非以震駭和藍波爾德爵士抱同樣意見的人們；也不是在討論叛變者

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計畫；只是表明克服和防護國家的問題，並非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技術問題；并表明國家自衛的藝術和奪取國家的藝術受同樣原則的支配；適於革命的境况，不必而是屬於一種政治社會秩序的，也不依靠國家一般的情況。無疑這種表明，要使西歐地位最穩固，警衛最完善的國家內的自由派人們，感到不安，就基於這種不安，一個愛自由者所這應自然會感受的不安，才使我願意把現代國家可以怎樣推翻和怎樣防護的技術說明。沙士比亞的波令布魯克 (Boingbroke) 赫勒福德 (Hereford) 公爵，說，「他們不愛毒藥，却需要毒藥，」一個愛自由者也許是如此。



甲第23號

版所
權有

變亂與革命技術

1933年7月初版

著者 馬刺帕爾脫

譯者 古有成

發行者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104號
國際書局
南京成賢街107號

實價精裝一元二角
平裝八角

#17
71325

